

海纳百川 2004 年 11 月号

目录

慕容文成： 若不能和平统一， 就应理智地认同台独	1
慕容文成： 浅谈共产专制， 民主和台独	5
横 眉： “带着钱去做贼” 论精英都在党内	8
锺 舟： “摸石头” 随想	10
原 野： 台湾独立与中国民主化	12
wing： 林思云： 今日北朝鲜	15
芦 笛： 仇恨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八. 一五感言	20
盛 雪： 中共与国家恐怖主义（二）	24
盛 雪： 中共与国家恐怖主义（三）	28
草庵居士： 治病还是救命？ 病入膏肓的中国金融证券业	32
秦 戈： 布什连任後美国的政治走向和对中美关系	37
云 儿： 说几句林思云先生的小评张纯如	43
林思云： 也谈云儿评论本人对张纯如女士的看法	48
芦 笛： 也说中国人为何要求日本道歉	52
郑若思： 反对妖魔化日本不等于为日本护短——... ..	55
芦 笛： 恩将仇报与作法自毙——丑陋的大陆人之十	57
郑若思： 我看张纯如《南京大屠杀》 读天一黑网	61
HGC： 【成败之鉴党国要人志中共首脑 4 】	67
燕南人： 《赵紫阳一怒斩刁民》	70

钟不悔：百年後评说邓小平	72
鲁 肃：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一）	75
芦 笛：阿拉法特之死	77
L S：走向儒家的三个犹太人	80
bystander：知识分子还是知识贩子？	82
湘 君：信仰，是道德之本	84
云 儿：鲁迅如何误人子弟？	86
盛 雪：远华案黑幕导读	89
武汉蒋品超：家园	93
暮 雪：曾经的故事	95
幽 灵：流露的真谛	96
克里斯琴：夜晚的精灵	97
逸 峰：侠女英名万世垂	99
贝苏尼：剪刀下流淌的诗意 安徒生的剪纸作品	100

若不能和平统一，就应理智地认同台独

慕容文成

近年来海内外舆论都认为台湾必定走向独立并指出陈水扁已经制定了台独时间表。海内外华人社会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浪潮汹涌澎湃使台海局势逐步升级。中共实权者江泽民也在公然叫嚣：台海必有一战。

和平统一台湾是否还有最后一线希望？一旦若干年内台湾当局突然制宪建国或修宪变相宣布独立，中共所谓的对台“必有一战”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恶果？若和平统一彻底无望，是否应该坦然认同台独？这一切都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不可凭意气行事！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思潮无疑是导致台海以至整个中华民族走向灾难的引发剂。

眼下，在中国大陆，和平统一台湾的提议早已被官民双方彻底封杀。凡主张放弃武力统一台湾者皆被冠以汉奸卖国贼之名。和平统一的呼声嘎然而止。战争的阴云笼罩在台海的上空。

众所周知，中国过去百年来所失去领土的面积远远不止一个台湾省，中共对收复外蒙和江东六十四屯从来不提，狂打台独牌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意图。

半个世纪前中共打着马列主义救中国的招牌骗取大陆人民支持其打内战，一举攫取了对大陆的统治权。此后五十五年间中共却做尽了伤天害理灭绝人伦之事，已经丧尽民心。中共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大陆人民逐渐扬弃。近二十年来由于中共顽固抵制政治改革和政治制度民主化使经济发展的同时所产生的贪污腐败现象等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大陆人民对中共政权的失望和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中共统治者对此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

中共为转移大陆人民积蓄已久的对中共的不满情绪使其一党专制得以延命，最大限度地利用台湾问题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为专制统治保驾护航。中共又借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文化为名给大陆人民灌输中华思想的糟粕—大一统思想，使民族主义成为中共麻痹大陆人民思想意识的精神鸦片。

然而，民族主义狂热竟如燎原之火，发展到中共难以控制的局面。中共在民族主义的牵制下一步步朝着台海战争的边缘迈进。玩火者必自焚。中共若不就此悬崖勒马，必将遭致战争狂人希特勒同样的结局。

中共宣称，中国政府为和平统一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其实不然，在台湾已经实现了政治制度高度民主化的今天，中共却仍然顽固地推行一党专制，使两岸政治制度上的差距日益扩大。和平统一祖国成为更加渺茫。若无中共当道，大陆人民在一个民选政府的领导下不可能几十年来毫无作为，痛失和平统一的良机。与大陆同文同宗的台湾人民也不可能不响应大陆人民对和平统一的真情诉求。

中国大陆实现了民主化，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环境自然水到渠成。然而一有人主张民主化中共就会不择手段地加以镇压，因为民主化意味着中共将失去王权，降格为中共自己曾不屑一顾的下层“贱民”。极端自私自利的中共独裁者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弃一党一己私利实比登天还难。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宁愿与美日对决也不愿以实现大陆民主化换取台海和平的最根本原因。

香港回归后，中共一面呼吁台湾人民接受“一国两制”一面却肆无忌惮地干涉香港的立法和选举，招致台湾人民对中共推行的“一国两制”产生了极大反感。民进党斥之以鼻，国民党也不为之所动。

台湾人民为何不接受中共的“一国两制”？台湾人民从中共在香港的所作所为看清“一国两制”只不过是中共顽固坚持一党专制的一块遮羞布而已。凡中共向台湾许诺的台湾人民都有，不用中共来赐给。与其被置于中共为所欲为的“一国”之下，台湾人民理所当然要选择“两国两制”离中共越远越好。中共为此恼羞成怒竟公然威胁：宁要台湾不长草，誓死也要台湾岛。但台海战争爆发之日必定是中共政权垮台之时！

中共建政后的血腥暴政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镇压六四民运，残酷迫害法轮功等宗教人士的中共的残暴本性进一步地暴露在世人面前。过去二十多年间中共多次摆出和平统一台湾的姿态，无一不是虚伪的统战口号。无论过去现在中共对和平统一可谓毫无诚意。

笔者注意到，按着中共最近主张的和平统一条件：中共对现有体制不作任何调整，统一后中共仍享有皇权。然而，中华民国的称号要被抹消；台湾要降格为中共的“一省”或特区；台湾人民要成为正式的中国公民；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要降格为中共的特区行政长官或省长。

这些看起来只是“名分”之类的事并非小事，都是牵连着台湾人民切身利益和命运的重大原则性问题。中共所主张的和平统一不过是简单地要求台湾人民放弃现有合法身份和民主主义理念向中共俯首称臣而已。这样的和平统一实际上是兵法所云“不战而屈人之兵”或以大兼并小。凭中共的现有军事实力绝无可能实现。在目前两岸势均力敌的情势下，为实现和平统一中共必须坦承中华民国的合法性，以平等的地位对待台湾。台湾人民所持有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理念必须在和平统一后的国家得到广泛的认同和体现。

大陆若是一个民主式的体制和平统一还有可商量的余地。在中共一党专制下冒然与大陆和平统一就必然要沦为中共统治下的臣民。这个选择与台湾人民的政治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国号可以商量”亦是欺人之谈。中共即使采用中华民国作为国号，仍然可以挂羊头卖狗肉继续独裁统治。中共所谓的和平统一对台湾人民毫无益处可言。除非弱智者才会上当受骗！

中共的一党专制使大陆成为一个在政治制度上有严重弊端的国家。与这样的政权搞和平统一将面临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大陆必须首先实现民主化才能打消台湾人民对一党专制的种种顾虑，使台湾人民确信实现和平统一后的中国将是一个人民可以充分享有自由，民主，平等的国家。

纵观历史，台湾是中共五十年前以内战的方式从中国打出来的一个政治实体。与大陆政权形成“一边一国”是不争的事实。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合并的途径无非两条路：

一是和平统一；二是战争。“不统不独”是过渡状态不是最终结局。虽然中共万分期待台湾把“不统不独”的现状维持下去，但这种想法只是中共的一厢情愿而已。

选择战争对中共来说并非有利甚至可能成为中共政权的死穴。核战中共必然速亡，使十三亿大陆人民成为中共的殉葬品。中华民族亡国灭种。与美国在海上空中较量，中共的实力有限必定退守境内，大陆将成为第二个南联盟或伊拉克。大陆近三十年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将荡然无存。中国即使不分裂也要倒退到北朝鲜同样的困境。日本等周边其他国家将从中坐收渔翁之利。中共将面临四面楚歌，独裁统治不可能再维持长久。

中共与其冒然发动战争，不如再次坐下寻求和平统一的途径。和平统一显然是中共有求于湾而不是台湾有求于中共，因此中共必须率先为和平统一铺路。具体应分为十大方面：（一）撤除所有部署在台海的飞弹；（二）承认台湾为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总统的合法地位；（三）协助台湾加入联合国和WHO等世界组织；（四）率先与台湾建交并支持台湾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五）积极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领域与台湾进行平等互利的交流；（六）促进两岸尽快实现“三通”；（七）在政治制度方面坦承大陆的落后从而开放党禁实现全国大选；（八）尽快实现两岸领导人的互访以协商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九）就和平统一两岸同时举办公投；（十）统一后实施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全国大选使台湾人民获得与大陆人民平等的参政权。上述十项建议可视之为两岸和平统一的草案。

大陆的民主化是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试图靠花钱买通美国政府向台湾施压是徒劳无益的，不如向台湾人民释放善意，以真情说服感化台湾人民共同走向祖国和平统一。中共自身若不承诺放弃一党专制脱胎换骨弃恶从善，就不要指望台湾人民会响应和平统一。浪费大量民脂民膏向俄罗斯购买劣等武器装备战等资助潜在战略对手实现现代化。打消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尽快实现大陆民主化为和平统一造势。

有狂热民族主义者在叫嚣：如果美国派兵阻止我们武统，我们就毅然“核平”统一台湾。美国拥有的“核”难道不是中国的几百倍吗？投射能力不是远远超过中国吗？民族主义者怎么会视而不见？世界谁会相信中共敢率先向美国使用核武器？中共难道不惧怕亡国灭种吗？

美国知道中共动用核武的底线。美国会奉陪中共打常规战打到底。倘若中共胆敢以动用核武阻止美国干预台海，后果将不堪设想。届时台湾统一不统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与大陆人民所期待的统一台湾是为了造福两岸人民和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最初宗旨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以笔者之见，中国大陆还远远没有为和平统一尽最大的努力拿出最大的诚意！

靠打常规战来统一台湾中共必败。靠核武中国必然走向全盘灭亡。中共若不想认同台独除了和平统一的方式以外别无选择。而为达成和平统一之目的中共除了毅然放弃一己私利顺从民意实现大陆民主化之外别无他路。大陆民主化的进程如此缓慢，台湾人民继续等待的时日已经不多。

中共须知，任何违背民意的政权不可能恒久维持下去，权力终究要回到人民手中。世界各国莫不如是。中共应该审时度势，适应世界日益走向民主化的格局，把权力及时地归还给人民以免于一旦被人民推翻之时遭到严正的审判和彻底的清算！

若台湾近期宣布独立，和平统一的最后希望也将随之破灭。中共与其悍然发动战争使台海两岸疮痍满目，血流成河莫不如坦然认同台湾的独立。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大陆的全部利益因台海战争的失败而丧失殆尽。不论向台独开战还是认同台独，中共都将面临着政权垮台的结局。然而，认同台独虽然使中共不体面地下台却有利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大局。

中共认同台独后将面临着大陆人民对中共的一片谴责之声和民族主义怒火。中共必须拿出足够勇气承认中共的自私自利是导致两岸平统一失败的最大原因，走下历史舞台以此向大陆人民谢罪。中共下台后权力将回归人民手中。民选的大陆政府将努力说服大陆人民息事宁人理智地认同台湾独立的既成事实，使台湾大陆两国人民都能在和平的环境中致力于建设好自己的国家。

台湾回归祖国固然是十三亿大陆人民的宿愿。台湾对中国大陆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也远非其他省份所能相比。即便如此，大陆人民也决不会同意中共拿出大陆的全部本钱靠武统换取一台湾孤岛的亏本生意。中共统治泱泱十三亿大国数十年来从没下功夫致力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却主要精力放在维持一党专制上面。今天台湾将自然走向制宪独立绝对是合情合理的举动，必将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同情。笔者仅以此文正告中共统治者在台湾问题要广听贤言三思而后行！

2004年11月2日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浅谈共产专制，民主和台独

慕容文成

按 照过去数千年世界特别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模式来衡量，中国共产党用数千万条人命夺取了国民党用血换来的江山，继承了中国的大统亦是名正言顺无可非议的。因为这样是符合中国数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的建国理念“成则王侯败则贼”。令人叹息却是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满清已经结束近百年的今天，当代中国人的建国理念仍旧是停在百年之前没有变。

回顾整个世界百年的历史，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民主主义的浪潮就开始兴起在世界各地，势不可挡。人类业已意识到在全世界必须建立一个更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以保障人权价值得到普遍的尊重，自由，民主，平等和法制得到最大限度的实施。这一世界性的潮流为封建独裁专制的正统性和殖民统治的延续敲响了丧钟。

然而，作为后起的新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国家，德国和日本等国却不肯罢手，以致后来在二战中世界上形成了以英美为主体的民主主义和德日意为轴心国的法西斯主义的两大阵营。两大阵营对决的结果，民主主义阵营的胜利决定了民主主义不可阻挡地成为建立世界新秩序和新国家的政治理念。故此，按照民主主义的建国理念，二战之后在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和血腥中窃取政权所建立的中共政权，越共政权，北韩共产政权和东欧各共产主义体制无疑是悖离民主主义理念的非法政权。

中共政权的非法性，从共产主义教义本身就是悖离民主主义理念的这一点亦可得到证实。共产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在教义中就一贯主张采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手法来夺取政权并且建立共产党一党永远专政独裁的国家政权。列宁和斯大林在二十世纪初期实践这个教义，斩尽杀绝了俄国的旧贵族和庄园主在白骨堆上建立起第一个苏维埃红色政权。此后斯大林把又这个教义推广到当时灾难深重盗贼四起的中华民国，使中国亿万民众从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之中，至今仍在苦斗中挣扎。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中国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斯大林的混有中国血统的儿子。中国人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后来中国共产党窃取人民的权利建国之后的暴政和一切所作所为，让其老子斯大林在黄泉之下也倍感自愧不如。几十年来常常有人叹息“共产党为什么始终不能放弃暴力离开血腥？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尊重民众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放弃一党专制独裁？”。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共产主义的教义本是如此，放弃暴力革命和共产专制，共产主义的教义就不能称之为共产主义教义了，就变成了大卫·李嘉图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这对毛泽东这种满怀封建帝王野心的人来说，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只有打着共产主义的红色招牌喊着共产主义能解放劳苦大众和全人类的口号才能鼓动起许多民众的激情使之甘愿来作建立共产专制政权的炮灰和铺路石。

共产党成立早期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暴行和共产政权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都是以此为诱饵鼓动民众的激情和利用民众对当时政府社会种种不满的急躁情绪来获取民众的支持和参与。共产政权建国后所发起的历次臭名昭著的政治风暴“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也都是出自一辙的群众运动。而在共产党成立初期当时的中国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军阀比比皆是，共产党想夺取政权控制整个中国上没有苏俄的扶持下没有民众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何况是白手起家打天下。靠采用以往中国数千年延续下来的寻常手段来建立封建王朝不仅是行不通而且一点也不得人心。袁世凯这样大权在握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前仅仅用八十三天就做他的皇帝梦。

共产主义的教义既然是以暴力革命和共产专制为宗旨的教义，就不可能容纳民主主义，一切自由和人权。共产党政权统治中国五十年血腥黑暗的历史铁证如山充分显示，共产党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给民众行使自由民主的权力，也不会允许任何自由选举和多党制。在共产专制下的人民永远是共产党踏在脚下的粪土。除非共产体制象在苏联在东欧那样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的体制。因为共产主义的教义本是如此。

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所说的要“翻两番”的指标，可是政治制度改革，政治自由化和合理化却丝毫没有前进一步。奇怪吗？不奇怪！因为共产专制政权本身就是政治制度改革和政治自由化合理化的最大障碍，亦是滋生贪官污吏的最肥沃最适宜的土壤。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等西方民主主义国家都存在一些贪官污吏，但是有哪一个国家会象当今的中国呈现了一派“无官不贪，不贪不官”的景象。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因为从共产专制的土壤中不断滋生出无数的贪官污吏，以致于共产专制下的大陆的中国人都是贪官污吏的后备役。

在拥有泱泱十三亿人口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国家领导人和省市县各级自治体的行政长官都是通过黑箱作业来实现的，第一代共产专制者不仅让自己一生一世享用从民众窃取而来的权力，而且绞尽脑汁愚弄民众让专制政权在共产贵族阶层中世代交替相承，不致失落。

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却是大陆民众在对整个国家贪官污吏横行的局面发泄着强烈不满情绪的同时，却没有多少人真正能认清共产暴政的本质和永久性，甚至有许多人被共产专制一时开明的假象所迷惑，继续发表言论为共产专制献媚和歌功颂德并且对六四民运本身和民运人士横加辱骂恶言攻击。这些人的理由是民运人士出卖国格人格充当西方国家的走狗洋奴并反对和诽谤中国来为换取组织经费和生活费用。敝人的观点是首先必须肯定六四民运和以往每一次中国民众在专制暴政之下为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所作出的努力是一样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的。那些不汗颜自己没有参与却恶言攻击诽谤，咒诅参与的人士才是真正的人格低下加上愚昧无知。民运人士是值得民众尊敬和效法的因为他们为民众的福祉，权力和利益作出了个人的重大牺牲。其次民运人士是人不是神而且性情和我们一样是在中国这个封建和共产专制的土地上诞生成长起来的。经历了在共产暴政下从“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历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争斗，每一位大陆中国人的人格谁也不会比其他人好到那里。因此不要借用民运人士的人格的好坏来否定六四民运自身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定位和不可磨灭的价值。

再次应当正本清源是“反共”不等於“反华”和“不爱国”，同样为共产专制暴政

歌功颂德的举动也不意味着“爱国爱中华和救国救民”反倒是误国误民之举。进一步来讲大陆民众自己没有任何选举权不能为自身作主，却喊叫着要为在海峡彼岸已经作了自己主人的台湾民众来当家作主，此举既可笑又可悲！

九七香港回归时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曾对世界豪言壮语地许诺，保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载不变。可是仅仅五载刚过，“一国两制”就几乎变成了共产专制。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鸟儿谁也不愿意被囚在牢笼里，清澈的河水中翱游的鱼儿谁也不愿意被抛入污浊不堪的臭泥塘，同样生活在自由天堂里的人谁也不愿意被统一在共产专制的暴政之下。

大陆的中国同胞应当认认真真地替自己着想着想吧！不要再叫喊了也不要再辱骂了也不要再文攻武吓了，自己生活在那专制暴政之下不觉屈辱，还要强迫人家台湾民众来一同受苦受难吗？共产党的专制政权理所当然是造成台湾得而复失和仍在分离的千古罪人！

2004-11-8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带着钱去做贼” 论精英都在党内

横眉

文革刚结束不久，老爸和他的战友都陆续得到平反及恢复了工作。互相取得联系后，特别是其中一些劫后重逢，几乎九死一生的几位老朋友就常常相约喝酒，尽诉衷肠。好象要把那段互相不知生死、天各一方的时光追补回来。

那时候不太兴上馆子，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吃。这样我们这些后辈就有了机会混上桌子，一边跟着吃喝，一边听他们侃大山，说他们当年参加共产党的故事。这些老头儿都能喝，往往菜没上齐几杯好酒就下了肚。有天，一位平时沉默寡言的王伯伯喝多了点，带着醉意，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当年我参加革命，就好比带着钱去做贼啊”。我们都听得大眼瞪小眼，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旁边的几位老头儿都笑了，其中一位伯伯向我们解释说，你们这王伯伯那时家里是南洋富商，父母很有钱。他参加革命后不仅没有报酬，组织上还经常要他从家里拿大笔钱出来接济同志，包括作为营救被捕同志时要行贿的资金等。但那时革命者不但不能公开而且是非法的，随时有被抓捕杀头的可能。躲躲藏藏地跟做贼差不多，而做这种贼是没有钱偷的，还要倒贴。可不是带着钱去做贼吗？我们听了也哄然大笑，笑的是在那“火红的年代”，象“革命”这样神圣的名词居然和“做贼”联系在一起，实在是太滑稽了。

后来又听他们说起另一位伯伯的故事。那位伯伯家里是大地主，由于党组织经常缺乏购买军火等必需的经费。所以这位伯伯只要一知道家里要送钱去城里钱庄存，就马上把路线、时间告诉党组织，组织上就派人在半路上扮强盗打劫，屡屡得手。弄得他父母十分惊诧，不明白强盗何以聪明如斯。直到有一次，党组织急需一笔资金，来不及等到下次半路上打劫。情急之下，这位伯伯只好蒙上脸亲自带着同志们上家里来抢，由于这伙“抢劫犯”对家里藏钱的地方太熟悉，他母亲留上了神，终于被她从领头的强盗身形中认出了这个不肖子，大声喝骂起来。这位伯伯“恶行”败露后，带着“抢”来的钱与同伙慌不择路地狼狈逃窜，从此再也不敢回家。他父母直到去世也没有原谅他，真成了生离死别。我们听了又是哈哈大笑，怎么也不能想象那位曾负责过公安工作的伯伯竟然做过“强盗”！

往事如烟俱往矣，如今每当看到、听到中共党内一桩桩触目惊心、金额越来越大、官级越来越高、人数越来越多的腐败案件；再回想起那两位伯伯的故事，却再也笑不出来，只觉得十分郁闷和心寒。中共夺得政权前，参加革命是要坐牢杀头的。穷人参加革命还能说是为了分得一亩三分地，为了可以夺取富人的财产。但是，象那两位前辈那样出身富裕家庭的、甚至是国民党高官家庭的青年参加革命的也大有人在。例如蒋介石的心腹、国民党中常委陈布雷的女儿女婿，华北剿总司令、上将傅作义的女儿，东北军司令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曾任中共海军副司令员，文革中自杀）、曾协助上海首任副市长潘汉年做多年地下工作，后来成为他夫人的金城银行大老板的千金小姐（与潘汉年一

起坐牢流放近三十年)等许多人都投身了革命…他们大多在海外读过书,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所以回国后都同情、支持当时主张民主、反对独裁的中共,从而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和家庭。

这些人原本已属于当时社会上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他们自身的条件和家庭背景令他们可以轻易过上优裕的生活。他们根本不需要通过夺取政权来得到这一切。而他们选择革命参加中共,却正是要推翻那个可令他们拥有财富、地位的政权。还使自己身陷险境、成为“强盗”、“贼”、“叛逆”,随时会丢掉性命、连累家人。可悲的是,革命成功后,他们反而多次受到打击,如陈布雷的女婿于反右中打成右派并被流放,陈的女儿在被迫离婚后,又在文革中被整得跳楼自杀。浑不象在今天,加入中共的人是可以升官、发财、享有特权、福泽家人子女,而且可以比还在贫苦中的人民先富了起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引用过关于入党是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已成了笑话!

抚案喟然长叹之余,不禁想问问,这些前辈们当年放弃自己已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是为了追求一种什么理念?他们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还是为了给自己捞更多的钱财?今天,他们曾为之努力奋斗过的目标达到了吗?相比起现在这些多如牛毛、只知道把人民财产往家里搬、搞得鸡犬升天的中共贪官;他们又是什么理念?如果说中国的精英都在党内的话,谁才是真正的精英?今天的中共里又有几个人配称为精英?还有多少个肯带着钱去做“贼”、回家去做“强盗”的精英?

上帝啊!请赐我们中国更多的这样为中国人民、为民主事业而献身的“贼”和“强盗”罢!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摸石头”随想

锺舟

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路线斗争，据说是“贯穿了我党的发展史”。我毕生与党团无缘，连共青团（以前叫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大门都不曾踏进过，更遑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因而，对党史关心得极少。从一些描写中共党内“路线斗争”的回忆录和零星文章中，看到了这“党内路线斗争”，还真是十分的残酷。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中共党内历史上规模最大、斗争最为残酷的“两条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是随着毛主席的逝世，“四人帮”的粉碎而宣告结束的。“四人帮”能得以粉碎，实在是因为毛主席的逝世。如果毛主席尚在人世，“四人帮”还能有多少阳寿，想来没人能说得准。——文革到底从何时算是结束，以我之见，还有待研究近代历史的专家们去界定。

短命的华国锋政权，似乎只能算是从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邓小平主政的过渡桥梁。“名正言顺”历来是最有名的中国特产之一，“名不正，言不顺”是历来做大事业人们的大忌讳。于是乎，花了经年的时间，来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到基本上把“两个凡是”驳了下去之后，邓小平方堂堂正正的出台主政。——“正名”式的论战，颇像主角登台之前净场的“闹台”锣鼓。

邓小平出台主政，面临着党内邓力群们“姓无、姓资”的“革命理论”纠缠，面临多方社会人士，长期习惯于“两条路线斗争”思维方式的刁难，真要从理论上论证许许多多意识形态的是非问题，不知还要几年的功夫。

在这千头万绪之际，不愧为掌门人的邓小平，以其绝顶内功，用“四两拨千斤”的招术，简简单单地解说一句：“摸着石头过河”。这样，就把所有以往所做的、今后要做的许许多多事，统统归纳在“过河”时“摸石头”的过程。

要到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彼岸，“过河”时不得不万分小心。为了不被淹死和不被河水冲走，“摸着石头过河”是既可探出河水深浅，遇到风浪又可抱着石头避免灭定之灾。最重要的是，轻轻松松、简单一句“摸着石头过河”，宣告了“路线斗争”的结束。——“摸着石头过河”，谁都不知道“摸着石头”时会有什么路线，哪里还有“路线斗争”？你还能说什么路线斗争？！“摸着石头过河”，就此结束了党内的“路线斗争”。至于，对岸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模样？等过了河，到了彼岸您自会看得清楚。高，实在是高！伟哉！邓公。

前些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鼓舞之下，一时间，诸多商人——无论是黄肤黑发的正宗华夏子弟，还是碧眼金毛的非我族类，都涌向中国大陆，寻觅商机。在中国大陆寻觅商机，本身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时间久了，您会发现，跟国营企业做生意，特别的累。重重难关，需要您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毅力去攻克；层层手续，您

得具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坚定决心。更重要的是，您先得学听那“传音入密”要紧内功。“锣鼓听声，听话听音”，如果不解那妙不可言的“弦外之音”，那么，您就看着人家摸石头吧，几时算了，说不好。

许多老中、老外商人，由于不解个中奥妙，一个个鼻青眼肿的爬回到出发地点。很有些朋友向我“请教”，为什么有许多人，总是光“摸石头”而“不过河”？我告诉这些哥儿们，大约有三种“摸石头”的人：一种是“摸石头”要过“河”的；另一种是作“摸石头”状，“摸”给上面看的；还有一种，只“摸石头”根本就不打算“过河”，在“摸石头”的过程中寻欢作乐的。——此辈颇得“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之神韵。

我所遇到过印象最为深刻的事儿，是对方在毁约之后，冠冕堂皇地解说道：“开放不久，我们没有经验，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难道，明知前面没有石头、会淹死人，还要我们再朝前去送死不成？！”这毁约的理由，竟然用上了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

时至今日，记忆犹新，这些哥儿们，还真能发展“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台湾独立与中国民主化

原野

玉 共再次合作曾是中国民主化最快捷最稳妥的途径和可选项之一。

从上个世纪初以降，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二支主要政治力量一是国民党，一是共产党，近百年来，中国人对国家现代化目标的追求，主要是在这二党之间的互动中展开，大批的志士仁人为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抛头领洒热血不屈不挠的奋斗，也主要在这二党中展现，中华民族的命运也随着这两个党的合作与斗争而起伏。

国共的第一次合作，完成了北伐，结束了中国军阀混战分裂的局面。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成了二战中的战胜国。遗憾的是当时二党都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大义，而坚持自己的一党之私利，最后导致共产党占有大陆，国民党占有台湾而势不两立的分裂局面。

经过几十年的折腾，共产党才发现按照其理想建立起来的天国，即不能强国又不能富民，甚至还威胁到了共产党自己的生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和改革开放，中国的历史上又出现了新的契机，我们曾经有理由期待国共的第三次合作，从而建立一个实行多党制的民主化的共和国。这决不是平空想象，共产党改革开放所需要的理论和经验，国民党的台湾就有现成的，今天大量的台资，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涌入大陆就是证明。国民党要反攻大陆，靠军事力量是不可能的，但是用民主和自由的力量是完全可能的。我们曾经以极大的热情期待着台湾民主化的成功，以期对中国的民主化起到示范和催化作用。

而且，国共的第三次合作也是实现中国民主化最便捷最稳妥的方式，很多人在讨论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问题上，担心找不到一个与之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出现无政府状态，导致社会动乱。中国国民党就有可能成为这样一种政治力量，国民党不但有在台湾的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更有在大陆几十年奋斗的民众基础，只要政治气候许可，在大陆恢复国民党的活动是不困难的。在大陆出现两党和平竞争的政治局面，对中国和平稳定的过渡到民主社会是十分有利的。

东西德的和平民主统一给大陆和台湾的和平民主统一提供了成功的示范，但这需要一个民族政治上的成熟，需要政治家的高度政治智慧才能完成。可惜的是中华民族在政治上还没有成熟到这种程度，中国的政治家也缺乏远见和政治智慧，一再的使得这种大好的历史机遇与中国人擦肩而过。

随着李登辉的搞垮国民党实现台湾独立计划的一步成功实施，到今天以陈水扁的再次当选为标志，中国国民党已被打倒在地了，这第三次的国共合作也就成了泡影，中国民主化的最佳途径就被堵死了。一个百年大党，曾抵抗住了日本鬼子倾全国之力的入侵，但却没能抵挡住李登辉这个二鬼子的小小阴谋，令我辈不禁扼腕长叹。

连自己祖先的文化也不能相容，还能容得了多元文化和多元政治？

大陆和台湾都需要民主化，在大陆，民主化的步伐因为共产党的积重难返，是十分艰难和缓慢的，但形势毕竟在向好的方面转变，在台湾，民主化的步伐就要快的多，如果两岸形成良性互动，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就能真正的形成双赢的局面。在民主化转型期中，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解放台湾”和“反攻大陆”都已时过境迁，成了过时的政治话语，无人相信。在大陆的民主化过程中不会对台湾的安全构成威胁，民主化了的大陆就更不会威胁到台湾人的利益，大陆人也绝不会去共台湾人的产，正相反，大陆给台湾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市场，对台湾的经济提供巨大的动力。这对台湾民主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却在搞“外省人”，“本土人”，把台湾社会撕裂开来，制造台湾内部的矛盾，把大陆来的新娘当成怀疑对象来对待，其待遇还不如外籍劳工。搞戒急用忍，不让台湾人把钱投资到最该投资的地方去，却把在大陆挣来的数百亿美元去购买高精尖的武器，对准大陆人，要知道大陆的武器是要面对包括美国俄罗斯在内的整个世界的，而台湾的武器是全部对准大陆的。

民主的精义就是宽容和妥协。一个连自己祖先的文化也不能相容，而要去中国化的台独理念，还能容得了多元文化？连自己的同胞都要硬生生的撕裂分化为不同群族的台独还能容得下多元政治？今天在台北和平示威的学生被民进党的台湾当局的警察打的头破血流，与八九年六四共产党专制当局在北京的做法有什么本质区别？这些不是对民主的最大亵渎？

把中国分裂成七大块，陷中国于内乱。

分裂不是民主，中国历史证明分裂就意会着战争，就意会着社会大动乱。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不管是专制还是民主化的，都是台独不可逾越的长城。李登辉搞台独也只是手段，分裂中国为七大块，陷中国于内乱，将一个即将崛起的民主的中国消弥在内战的血泊中，为日本人张目才是其目的。在中国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进程中，日本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出手，给中国的现代化制造了巨大障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痛苦。从中日甲午战争阻止中国现代化，到抗日战争时妄想占领中国，再到李登辉这个准日本人搞台独，甚至要把中国分裂成七大块，让中国人自相残杀，分裂积弱，是日本阻止中国强大，独霸亚洲进而逞霸世界的百年阴谋的不同环节，陈水扁只是这个环节中的一颗棋子，为外人利用而不自知。这个百年阴谋虽然不是有人有意设计出来的，也是符合历史的逻辑的。直到最近日本的右翼政治家还在叫喊“中日再战”，要把中国海军在数分钟之内消灭掉。把台湾事务纳入“周边事态”来加以处理，日本现任首相多次反复参拜靖国神社，不但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还叫别人“闭嘴”。日本还用大量的金钱把已在计划中的中俄石油管道抢走，影响到中国今后的能源战略。无视于这些矛盾，不看到这些危险，中国就会再次被日本人打败。

先发制人决战于境外，中国人打中国人。

陈水扁提出“先发制人，决战于境外”，把大陆沿海的二十个主要城市列入打击对象，最近还组建了导弹部队，大力发展中程导弹，和具有远程攻击能力的武器。这不但不是民主，就连和平的原则也不要了，最近他还在与美国的记者大谈，为了台独“不惜一战”。以进攻者的姿态出现，因为他知道，两岸如果现在就真的打起来，那将是中

国的大灾难，别说中国的民主化将会遥遥无期，就连中华民族的生存权也会受到影响。台独把中华民族的前途给压上了，所以李登辉陈水扁们才能如此肆无忌惮，电视连续剧《水浒传》里的牛二，非逼着杨志在他脖子上试刀。

洪哲胜把台独理念看得高于一切，失去了正常的心智。

本人曾有幸与洪哲胜同台演讲，他甚至到《三国演义》里去找有多少个“中国”的字眼，并证明彼中国不是此中国，以此来证明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他在海外华人间的各种会议上十分活跃，在网坛上也十分活跃，到处都有他宣扬台独理念的身影和文字，其对台独理念的追求达到了一种宗教般的狂热程度，其敬业精神令人感动，但他总使我想起那些在中东地区因宗教矛盾而在街头扔石头的半大小孩，哪里有事哪里就有他，石头总是要扔的，为什么扔？产生什么效果？他不管。

对台独的追求，按民主的原则来讲无可厚非，但如果把台独的理念当成至高无上的原则来加以追求，而无视平民百姓的现实利益，就走过了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不坏，但被共产党神圣化了，就成了人间地狱。我相信洪哲胜以及大多数的追求台独的台湾人，不是象那些政治人物那样是为了分裂大陆为七大块，也不想真正与大陆为敌，他们只是想远离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如果说有一点私心，那也只是害怕贫穷的大陆瓜分了台湾的富裕。这是可以理解的，老百姓往往是单纯和盲目的，容易被政治人物的激情所煽动，这种被煽动起来的民情民意就不是真正的民主，正如文化大革命时的民意不是民主一样。如果两岸真正的发生战争，其后果是老百姓所承受不起的。李登辉可以去美国，洪先生已经在美国，可两岸的百姓怎么办？

意识形态之争，党派之争，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的事，而中华民族要长存于天地间的，我们这些人的是是非非，争争论论，不要紧，时间会摸平一切，但我们的后代要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民主理论没有国界，但民主人士是有归属的。没有历史感没有民族感的人，不是天真无知就是别有所求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林思云：今日北朝鮮

wing

少年來，北朝鮮政府一直宣稱北朝鮮是“地上的人間天堂”。可是蘇聯瓦解後，失去援助的北朝鮮陷入了饑餓的困境，目前人民的口糧供應每天只有二兩左右的玉米，還不能按時供應。現在北朝鮮餓死的人數按國家的人口比例計算恐怕比中國“自然災害”時還要多。下面讓我們從幾個側面看看今日的北朝鮮現狀。

一、徹底的造神運動

中國在文革時，毛澤東也搞過造神邊櫻 珉確—的造神邊颖绕鸾鹑粘蘆礫是小巫見大巫。毛澤東的革命經歷基本上是卻有其事，井崗山、延安等“革命聖地”也並非偽造。而金日成卻是肆無忌憚地篡改歷史，金日成的革命經歷、革命聖地基本全是無中生有捏造出來的。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4月24日在朝鮮平壤附近的萬景台出生，在1920年代，金成柱一家從朝鮮移居中國東北，因此金日成的中文十分流利。1930年代，金成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遊擊隊，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抗日遊擊隊被日軍追擊被迫逃入蘇聯境內。此後金成柱便長期住在蘇聯的遠東地區，1942年2月16日，金成柱的長男金正日在蘇聯出生的。1945年日本戰敗後，蘇軍佔領了朝鮮北半部，美軍佔領了朝鮮南半部。當時史達林看上了在蘇聯的金成柱，讓金成柱出任北朝鮮的領導人。但考慮到金成柱在朝鮮人中間毫無威信，所以讓金成柱改名為金日成，冒名頂替朝鮮人民傳說中的抗日英雄金日成。

可是北朝鮮的歷史書中，金日成被說成是中國抗日遊擊隊的領導人，並一直在中朝邊境的長白山（朝鮮稱白頭山）一帶堅持抗戰，從未去過蘇聯。金正日也是1942年在白頭山密林中的遊擊隊營地誕生的。本來朝鮮解放完全是依靠蘇聯的力量，但北朝鮮的歷史書中卻改為金日成帥朝鮮人抗日聯軍獨力趕走日本人解放了北朝鮮，與蘇聯完全沒有關係，甚至中國東北的解放也是靠金日成。朝鮮戰爭是中國軍隊的參戰和巨大犧牲，才保住了金日成政權。但現在的北朝鮮歷史書中，朝鮮戰爭是金日成獨力帥領朝鮮軍隊趕走了美國人，與中國已毫無關係。

這樣肆無忌憚地篡改歷史，使金日成從一個蘇聯的傀儡政權領導人變成了趕走日軍，趕走美軍的“戰無不勝的鋼鐵神將”。更有甚之，金日成一家也被篡改為傳奇式的英雄人物，從金日成的曾祖父開始每一代人都是抗擊外國侵略的大英雄。1980年代開始在白頭山的密林中“修復”出金正日誕生的小木屋，周圍的樹木上還“新發現”了許多當時抗日戰士們刻寫的祝賀金正日誕生的祝詞。現在“金正日誕生的小木屋”已成了北朝鮮的聖地，參拜者絡繹不絕。

北朝鮮家家必需懸挂金日成父子的畫像，而且要經常打掃，畫像上不能落有灰塵，

否則要以“不敬罪”論處。最麻煩的是刊登有金日成、金正日畫像的報紙，既不能扔，也不能亂放，一旦不小心弄髒弄破報紙上金日成、金正日畫像的就要判罪。

二、階級專政的國家

北朝鮮是一個進行徹底階級專政的國家，一個人進入社會首先碰到的就是家庭出身問題。北朝鮮的出身成分要追溯到前三代，家庭出身詳細分為51種成分。這51種成分大致可分為三大類：“核心階級”，“動搖階級”和“敵對階級”。“核心階級”包括革命家庭（長輩為革命幹部）、軍烈屬、工人、貧下中農等。“核心階級”的人數占北朝鮮現有人口2200萬的三分之一，是北朝鮮政權的支柱。“動搖階級”是指沒有誓死捍衛北朝鮮現政權決心的人，“動搖階級”約占人口的一半。“敵對階級”是指地主、資本家、反動分子、不純分子、以及在南朝鮮有親戚關係者，“敵對階級”約占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北朝鮮，家庭出身決定一個人一生的命運。“敵對階級”的家庭出身者，不能在大城市居住，不能上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只能從事一些低賤的工作。“動搖階級”的家庭出身者，雖然可以上大學，但入黨、提幹極難。在北朝鮮，報考大學首先要有中學的推薦，所以到了高中，一些家庭出身不理想的學生往往會向老師詢問：“老師，我也能上大學嗎？”。北朝鮮號稱自己是世界上“最自由平等的國家”，如果在“最”之後增加一個“不”字，也許就名副其實了。

三、陷於癱瘓的經濟

外部無法確切瞭解北朝鮮的經濟狀況，因為北朝鮮政府每年只是公佈今年的經濟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多少，完全沒有具體的數位。偶爾也對外發表一些經濟數位，比如1991年北朝鮮的政府官員對外國新聞媒介稱北朝鮮的人均產值為2460美元，但不論從那方面看北朝鮮也不象有人均產值2500美元的經濟規模。

1950年代，朝鮮從蘇聯和中國獲得大量經濟援助，工業化方面取得了相當的進展。1956年蘇聯的赫魯雪夫上臺後，對朝鮮的經濟援助激減，於是金日成更加重視中國的援助。為了取悅毛澤東，金日成緊緊追隨中國的政治、經濟運動。中國搞“大躍進”運動，朝鮮也跟著搞類似的“千里馬”運動；中國搞“人民公社”，朝鮮就跟著搞類似的“協同農場”，中國搞“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朝鮮也搞“業學大安，農業學青山裏”。1960年代中蘇爭論時，朝鮮基本支援中國的立場，1964年中印邊界衝突時，朝鮮聲明支援中國。

可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國的紅衛兵開始張貼批判金日成的大字報，稱金日成搞資本主義，揚言要逮捕金日成。朝鮮的中央通訊社也開始批評中國，中朝關係開始冷卻，中國對朝鮮的援助也隨之減少。於是朝鮮開始了“獨立自主”運動，重點是興建一支獨立的強大軍隊和獨立自主的軍事工業。北朝鮮人口不過2200萬，卻建起了一隻110萬人的軍隊，巨大的軍事支出成了北朝鮮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

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朝鮮開始批判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中朝關係漸漸惡化，朝鮮轉而奉行對中蘇等距離外交的政策。蘇聯解體後，朝鮮經濟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進入1990年代以來，由於沒有了蘇聯的援助，朝鮮經濟開始年年出現負增長。據各種消息來源推測，目前朝鮮的工廠開工率還不到40%，農業更是年年歉收，經濟已瀕臨

癱瘓。

四、物質極度匱乏的人民生活

1950、60年代，北朝鮮的人民生活還可以。1960年代初，中國的“自然災害”時期，不少在中國的朝鮮族人紛紛移居北朝鮮。進入1980年代後，由於和中蘇兩國的關係都不太好，朝鮮進入了“自力更生”時代。此後，北朝鮮的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下降，生活物質日益缺乏。人民生活水平主要以“衣、食、住、行、工作、娛樂”來衡量，以下我們就來看一下目前北朝鮮人民的衣食住行情況。

衣

在北朝鮮衣服是實行配給制，工人一年發兩套工作服，一般幹部、技術人員每三年發一套西服的布料，中級幹部兩年發一套西服的布料，中、小學校的學生大約每隔二年，在金日成生日那天贈送一套校服。由於中、小學生發育較快，隔兩年發一套的校服很快就變得太小，家長們不得不在褲子，袖子上接一塊步來加長。在朝鮮買衣服、布都要憑“工業品購物券”。當然黑市也可以買到不要購物券的衣服，不過價格很高。

鞋由於國家不免費提供，成了朝鮮人在衣著方面最大的問題。每人每年發一雙鞋的購物券，但由於鞋的質量太差，兩、三個月就穿破了，沒有辦法只好去黑市上買高價鞋。當然幹部以及幹部的子女們可以穿到較好的鞋，所以在北朝鮮只要看看腳上的鞋就可以大致判斷出一個人的身份。

食

北朝鮮從1957年開始實行糧食配給制。規定一般勞動者的口糧定量為每天700克，軍人800克，老人500克。可是1973年開始以儲備戰備糧為理由，人們的口糧定量削減了10%。1987年以準備世界青年運動會為由，宣佈人們的口糧定量暫時再削減10%。但世界青年運動會開完後，口糧定量的暫時削減卻一直持續下去。

進入1990年代，口糧定量又作了幾次修改，到1994年一般勞動者口糧定量為每天450克。1995年北朝鮮以水災為由，口糧定量減半，1996年口糧定量又削減三分之一，現在的口糧供應為每人每天100克左右。

每天100克的口糧是無法維持生命的，於是北朝鮮提出國家解決口糧的三分之一，單位解決三分之一，個人解決三分之一。單位較好的人可以從單位分到一些糧食，有錢的人還可以從黑市買高價糧。但是無錢無勢的人只好去挖野菜，吃樹皮。北朝鮮的中央電視臺則宣稱根據科學研究結果，少吃飯有利於長壽，野菜更是營養豐富，多吃有利於健康。

平壤等大城市的糧食情況還比較好一些，中小城市、偏遠地區則情況比較糟，餓死者不斷出現。雖然老百姓陷入饑餓的困境，但幹部們卻有特供，吃飯沒有問題。高幹們則過著豪華奢侈的生活。據說近來北朝鮮出現了自稱為“生活調查委員會”的盜竊集團，專門行盜富裕的幹部家庭，盜完後還要留下“生活調查委員會”的紙條，頗得老百姓的讚賞。不管該傳說是否屬實，北朝鮮的老百姓對生活富裕的官員幹部們的怨恨是毫無疑問的。

住

北朝鮮不允許有私人住宅，住房全由政府、單位提供，分五個級別。一級住房是一般老百姓住房，二級住房是一般幹部住房，三級住房是科、處級幹部住房，四級住房是局長級幹部、大學教授住房，特級住房是副部長以上高級官員住房。

住房的最大問題之一是停電。由於能源不足，平壤每年的停電次數為200次左右，而且由於電壓太低，不加裝調壓器許多家電就無法使用。為了節電，電熨斗、電爐等耗電較大的電器被禁止使用，違反者要予以處罰。

在平壤，由於怕有損於國家形象，不允許人們在臨街住宅樓的陽臺上晾曬衣服。訪問朝鮮的外國人往往會非常吃驚地詢問：“怎麼在平壤沒有看到一家晾曬衣服的？”，他們得到的回答是：“朝鮮人自古就有在家中陰乾衣服的習慣。”

行

平壤市區面積並不大，本來自行車是最方便、經濟的交通工具。但由於金日成覺得象中國那樣的自行車洪流有損於北朝鮮的形象，於是禁止在平壤市內用自行車作交通工具。到了平壤的外國人看不到一輛自行車不覺十分吃驚，他們得到的解釋是：“自行車是落後國家的交通工具，所以朝鮮用公共汽車作交通工具。”

平壤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地鐵，有軌電車，無軌電車和公共汽車。但由於運行線路和車次太少，到處可見排隊等車的人的長龍。此外由於電車質量太差，絕緣不好，座車之人要經常遭受電擊之苦。由於公共汽車不準時，擠汽車又很費力，而且經常走一半就拋錨不動了，所以坐汽車還不如步行方便，因此很多平壤人步行上下班，並戲稱徒步為乘“11路公共汽車”，步行一、二個小時上班並不稀奇。

出了平壤，自行車就比較多見了。但由於自行車價格很貴，是家庭中的傳家寶，有“甯借老婆，不借自行車”的說法。另外由於自行車盜賊很多，人們不得不使用特製的防盜鎖，而且不管住幾層樓都要把自行車扛回家中。

北朝鮮雖有一條高速公路，但車輛很少，平均20分鐘才有一輛車通過。另外由於燃料奇缺，一些地方的汽車不得不使用木炭為燃料。“木炭車”是在汽車後面裝一個燒木炭的煤氣發生爐，發生的煤氣代替汽油作為汽車燃料。

北朝鮮的長途旅行工具只有火車一種。按北朝鮮的國家面積計算，到任何地方只需乘一天火車就夠了。可是北朝鮮的火車晚點程度讓人驚訝不已，晚點一、二天算正點，晚點三、五天算正常，晚點十天也不算稀奇。所以想乘火車旅行的話，要帶足半個月的口糧。朝鮮人去火車站詢問火車什麼時間到站時，不是問幾點幾分到，而是問幾月幾號到。

工作

在北朝鮮個人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由於食品和生活用品奇缺，所以與食品和生活用品相關的食品工廠、服裝工廠、生活用品工廠、百貨商店的工作最受歡迎。汽車司機、火車票售票員更是令人眼紅的職業。

北朝鮮的單位一般上午8點上班，但7點30分就要到單位，先進行向金日成表忠心的宣誓，然後再工作。晚上7點下班，下班後要進行金日成“主體思想”的學習，然後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每人要自我檢討近來自己的缺點和不足，揭發批評別人的問題。這種

人身攻擊式的批評往往大傷同事間的感情，有時還會引發打鬥情況。到了農忙時節各單位還要派出人員到農村去“支農”勞動。

北朝鮮由於怕老百姓收聽外國廣播，北朝鮮賣的收音機全部是只能收聽朝鮮廣播電臺的無調台機構的電臺固定收音機。有些朝鮮人從中國親戚那裏得到可調電臺的收音機，必需去公安局進行收音機電台固定的改造，否則要按收聽敵臺判罪。朝鮮的電視臺每天只廣播幾小時，基本都歌頌金家父子的內容。新聞只有國內新聞，基本沒有關於外國的報道。由於北朝鮮的家庭電視機的普及率很低，所以看電視並不是北朝鮮主要的大眾娛樂活動。

北朝鮮最普及的大眾娛樂活動是看電影，電影院普及率很高，平均每人每年看10部電影左右。一部新電影放映後，要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成爲人們談論的話題。另外雜技，馬戲也是北朝鮮比較普及的娛樂活動。此外，北朝鮮每逢金日成、金正日生日等節日都要進行盛大的遊行慶祝活動，這也可以算是朝鮮的娛樂活動之一。

看了以上的內容，30歲以上的中國人一定會聯想到昔日的中國，會感到今日北朝鮮和昔日的中國有難以形容的相似之處。如果中國沒有發生使毛澤東威信掃地的文化大革命，今日的中國會不會和今日北朝鮮一樣呢？許多人奇怪北朝鮮爲什麼不搞象中國那樣的經濟改革來解決經濟困境。因爲金家父子謊撒得太大，騙人民太過火，一旦開放他們的彌天大謊必然要被戳穿。所以北朝鮮的現體制已經以失去了搞改革開放的能力，除了政變、革命、戰爭以外北朝鮮沒有可以擺脫困境的出路。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仇恨将把我们引向何方？——八. 一五感言

芦笛

据 伟大领袖的小蜜张玉凤同志回忆，他老人家垂暮之年看了部电影《难忘的战斗》。当看到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市民的夹道欢迎时，他先是忍不住抹眼泪，继而大放悲声，引得所有在场的人都嚎啕大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倒底是什麽打动了这个马上天子，竟让这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铁血人物激动得不能自己而老泪纵横？

是他那自己一手营造出来的奇迹。当初井冈山那千来号人、七八百条枪竟会发展为数百万大军，铁流滚滚，杀气腾腾，如狂飙，似疾雨，农奴戟从白山黑水卷到黎族村寨，五星旗自两淮三湘插进傣家竹楼。不管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如何，都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人间奇迹。

是什麽促成了这奇迹？是林副统帅说的“精神原子弹”。这精神原子弹的核炸药是什麽？是仇恨。“两军相逢勇者胜”，除了战略战术的高下、武器装备的优劣之外，军队士气高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所谓士气的核心，就是仇恨。林副统帅对我军建军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他在东北发明了“两忆三查”的新式整军运动。就是这种忆苦运动，使憨厚的农家子弟化作了战场上怒吼的雄狮。

因为这仇恨造成的空前奇迹，伟大领袖从此迷信上了精神原子弹。这位马上得天下的万岁爷在马上治天下，把中国建成了世上独一无二的以仇恨立国的国家。“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成了根本国策，仇恨被当成美德，残忍被视为坚强，在“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的战歌声中，全民族向着一个又一个国内外的假想敌冲锋，练就了“对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铁石心肠。

这大概算得上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观。人类一切宗教、伦理、道德的核心就是一个“爱”字，而一切社会赖以组成的纽带，也就是这个“爱”字。如果将仇恨作为民族内聚力的源泉，则社会迟早要变成关着一群斗鸡的笼子，最后只剩下满笼鸡毛，遍地鲜血，而这正是他老人家撒手西归时中国的模样。他老人家那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超级大脑忘记了一个小小的事实：原子弹只是一种大规模杀人武器，而精神原子弹释放出来的只是巨大的兽性与破坏力。

尽管邓公在伟大领袖逝世后仅两年多就毅然宣布停止“阶级斗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却已经化作了民族魂。当年有首歌唱道：“大江南北留下了您的身影，五湖四海回响着您的声音。”它说的的确是事实。如今放眼神州，何处不可见他老人家那魁梧的幽灵？听听网上高论，何时不可闻那绕梁不绝如缕的余音？在伟大领袖的言传身教下，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更善于破坏一个新世界。“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坏已经成了我们的本能冲动，仇恨则是咱们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国

际纠纷的良方。就连咱们那根深蒂固的仇日情怀，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拜他老人家之赐？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日本人欠下的累累血债深恶痛绝，因他们对往日的罪行拒不低头而气愤难平。然而我却又禁不住常常想：咱们如此仇恨“倭猪”们，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网上有人说，咱们要灭了倭国。这种豪言壮语，早在抗战军兴时就有人发过。根据叶圣陶的文章，当年曾有爱国志士贴出大标语，道是：“剿灭倭国！”“杀到东京去！”这口号的确是气壮山河，虽则后者令人想起李逵的“杀到东京去夺了鸟位”的抱负。不过时代到了今天，想必我们大多数人已经长大成人，不会再把这种“大刀向鬼子们的坦克砍去”的儿语当回事。咱们现在的抱负，不是灭了谁谁的问题，是如何避免窝里反起来、自己灭了自己的问题。

因此，看来我们恨日本人，是因为他们拒不认罪，而我们仇日，就是要达到让他们低头的目的。然而这是不是说，如果我们的仇恨多一些，日本人认罪的可能性就大一些，推诿的余地也就小一些，反之，如果我们越不怎么样仇恨他们，他们赖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在逻辑上说得过去么？如果两国处于交战状态，仇恨的强弱当然影响士气的高低，从而影响战争的结局。然而据我所知，目前两国之间似乎并不处于战争状态。相反，中国的经济建设，仰赖于日本那位大财东的正多。无论人民怎样憎恨“倭猪”，逼着政府去为此打仗的可能性比和老美翻脸的可能性还小得多——不管怎样，“倭猪”们从不对中国的人权说三道四。

既然咱们不大可能逼着政府去为咱们灭了倭国，给咱们报仇雪恨，那么光是仇恨一通，好像并不能就此吓倒了“倭猪”们。恰恰相反，仇恨总是互相传染、互相感应的。天下未有被人痛恨而不恨人者。“倭”们并不真的是“猪”，人家和咱们一样五官俱全，你道人家不知道咱们的心事么？被咱们如此仇恨，就是泥人也有个土性儿。要老倭一面恨我们，一面又向咱们赔罪，这可能吗？他们不道歉还恨咱们，咱们就自然更恨他们，如此恨来恨去，真要成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了。两个国家挤在一起，离不能离，断不能断，打不能打，和不能和，彼此越来越仇恨，这“长恨歌”越唱越响，越唱越没个完，似乎总不是个办法吧？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点政治智慧来解开这个死结？

退一步说，让我们假设“倭猪”们让我们的仇恨吓得屁滚尿流，乖乖认了错，赔了钱，那又怎样？我们的仇恨会不会就此烟消云散？我看难说。不管老倭们怎样低眉顺眼，伏低做小，如同大相国寺的泼皮见了鲁智深一般“扁扁的伏”，恐怕总还要有那么一些人“虽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而且说不定反倒要怅然若失起来。何以故？我们已经如此习惯于仇恨这种“精神食粮”，它已成了我们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心理需要。我们恨过从慈禧到蒋介石那一切人民公敌卖国贼，恨过从美帝、苏修直到越南霸权主义那一切敌国，恨过从刘文彩、黄世仁、“黑六类”直到李登辉、陈水扁那一切阶级敌人……。如果某天忽然实现世界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再也找不到某种人或事来仇恨，咱们恐怕要象做不了官的孔老二一样惶惶如也，那骤然的失重感，恐怕会让我们再也难以把握人生！

如拙作《为什么要了解日本》所说，我们对日本人的仇恨和反感，基本上是一种义

愤，但我们的仇恨竟如此强烈，不能不说其中含有不正常的因素。扪心自问，我们的仇日情怀中有没有嫉恨的成份？我们看他们时，象不象那只教会了老虎十八般武艺而被徒弟赶到树上的猫，或是那个被隔壁的暴发户买走祖传良田的破落户？再往深处想想，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自己那如此不对称的爱与恨？如果我们仇日真是因为曾有那麽多的同胞被他们杀害和糟踏，而并非因为这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仇恨异族的理由，那麽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我们对烈士、对死难者的漠不关心，对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如此残忍？

仇恨是一把两面刃，无论是义愤还是嫉恨，它们都是会伤害自己的反常心态。如果我们的仇日情怀得不到化解而越演越烈，它迟早要变成祸根。初中语文中有一篇古文是这样描述“匹夫之怒”的：“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脱了帽子光着脚用头撞地），而我们最擅长的就是这种“以头抢地”的匹夫之怒。几十年撞下来，咱们的三魂七魄已经去了两魂六魄，再撞下去只怕要魂归离恨天，上兜率宫里接着恨去。

美国有人写了本《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政治预言小说，说的是中国大乱，日本人借口保护日资，派兵在山东登陆，某个新军阀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充当“民族英雄”，以核弹攻击日本，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老实说，老芦看了这本书后只吓得冷汗直冒。莫说人家危言耸听，不信请去大陆作个民意调查，看看有多少人反对对着东京甩核弹！世上再也没有哪个民族象咱们这样轻贱人命，象咱们这样对核战争毫不在乎（这也是拜伟大领袖之赐）。中国未来不乱则已，若乱的话，那深不可测的中日仇恨必是祸胎，野心家们不去利用这巨大的政治资源才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上利用仇外情绪实现个人目的的野心家，曾经给民族带来了比异族入侵还要深重的灾难。从这个角度来看，说我们的仇日情怀是为来日预酿大难，似乎也不是毫无根据。

如此说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此忍气吞声，不管人家过去怎麽作贱咱们，现在又如何坚不认错、洋洋得意，咱们都得“相逢一笑泯恩仇”？

不是这麽说。我这里想说的，是盲目的“抽象”的仇恨不仅於事无补，而且会把我们引向灾难。如果我们真是忘不了九泉之下那死不瞑目的千万同胞，就不能光知道升虚火，发高烧，在未来让更多的同胞含恨奔向泉路；我们如果真是那麽拿死人当回事，最起码得确凿地知道当初死了多少人，是怎麽死的，死者姓甚名谁；要控诉日本鬼子的战争罪行，我们首先得知道他们干了些什麽坏事，在哪儿干的，有什麽证据；我们痛恨日本人死不认错，首先得弄明白人家一般民众是怎麽想的，我们该怎样去说服他们。右派又有些什麽借口，我们当如何用铁的证据去驳倒他们；如果我们的政府既不想彻底开罪日本财东，心里却又对旧债愤愤不平，就应该停止包办民意，将政府外交与民间交涉分开，放手让当年的受害人索赔，使人民和政府的心态或多或少恢复平衡；最主要的是，我们如果真拿当年那空前的国耻当回事，与其像某作家热衷于“抵制日货”那一类浅薄的煽情，莫如向国内的长虹集团学习，先以日为师，学会了人家的本事后造出大批物美价廉的电视机来将日货逐出市场。一句话：只要中国成了强大的国家，何愁讨不还昨日的公道！有工夫去以头抢地，不如还是将这头好好留着，用在正经用途上。

三十年代在南京，数百名中国平民乖乖地排着队跪在地下，耐心地等着十来个鬼子的“大和魂”斩向自己的颈间；四十年代在奥斯维辛，千百名犹太人秩序井然地健步走进毒气室。一个民族竟会演出这种荒谬绝伦的悲剧，不能不说是该民族极大的耻辱。然

而人家犹太民族知耻，痛定思痛，痛极生智，痛极生勇，发愤立国，硬是在强敌包围的大漠中建立和保卫了自己的家园。不知道我们这个永远不会吸取教训的民族，会不会从这个榜样里得到某种仇恨之外的启迪？

2000年8月18日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中共与国家恐怖主义（二）

盛雪

四、中国是国家恐怖主义国家

共产党在暴力恐怖理论指导下，通过暴力恐怖手段，特别是经过暴力恐怖实施的积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血腥恐怖的政权—中国国家恐怖主义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对中国人民实施了长达五十几年的恐怖统治。

联合国指出，由于国家恐怖主义事实上是政府对其本国民众实施的恐怖主义，所以被称之为：自上而下的恐怖主义。它所造成的对人权的严重践踏远远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联合国委任的研究恐怖主义的特别委员库珏女士，在2002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指出：国家恐怖主义所犯下的暴行，比其它任何恐怖主义所犯下的暴行的总和还要多得多。

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符合个人恐怖主义、集团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所有种类的恐怖主义特征。其中，国家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危害最大。

1、对社会进行全面恐怖主义统治

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是当代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它实施的是彻头彻尾的国家恐怖主义。它依靠国家机器，盗用政府权力，合法使用暴力；运用司法、警察、监狱、特务等权力系统；垄断新闻、宣传、出版、舆论所有信息管道及传媒领域；控制人们生老病死，赖以生存的所有社会资源；钳制人民心灵感受、思想观念、情感表达、行为方式的所有方面。在国家恐怖主义统治之下，人民没有选择的余地。

由于国家恐怖主义实施的恐怖是全方位的、铺天盖地的，它对人从心灵上进行扭曲，从精神上进行摧残，从尊严上进行羞辱，从思想上进行控制，从肉体上进行消灭。经历过镇反、三反五反、土改、反右、四清、文革、一打三反、四五、六四、镇压法轮功等无数次血腥恐怖大事件的中国人民，已经在铺天盖地、永无休止的恐怖主义浪潮中吓破了胆，甚至麻木了，甚至渐渐适应和接受了这种恐怖统治。

2、持续不断的制造恐怖暴力事件

近年，有许多研究和著作显示，在中国共产党五十几年的恐怖统治下，至少造成八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第一年里，就大开杀戒，上千万人在镇反中被处决。

50年代杀人如麻：

五十年代一系列的镇压行动中，被贴上“坏人”标签的人，几乎没有活路，许多地方甚至集体屠杀这样的人，造成千万人死亡。

中共党史的正式说法是，从1950年毛泽东发表「双十指示」开始的“镇反”运动，到1953年11月结束，长达三年。这次镇压的对象是所谓五个方面：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俗称「社会上的反革命」。镇压的手段是「杀、关、管」三个字，即处决一批、判刑一批、管制一批。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两个阶段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万6千1百多人，其中87万3千6百余人被判死刑。

五十年代中共究竟镇压了多少人？1955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十五省市书记会上就定了个指标：「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上说「过去杀、关、管二、三百万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在57年2月最高国务会上透露50年至52年杀了七十万反革命份子，之后三年又杀了八万。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透露过，1949至1955年有四百万人被处死（这当然只是镇反的杀人数）。国外的估计则从数百万到两千万都有。

毛泽东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下令展开的「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

六十年代苍天无泪

六十年代初，有四千万到六千万人死在共产党所推行的灭绝政策的灾荒中。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千万人头落地。

史料记载，文革中死人集中于几个时期，第一个是1966年的“红色恐怖”时期。

以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宗旨就是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六月间，恐怖暴力的打人之风开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毛泽东说“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一个月之内，在北京被打死的各类人就数以千计，后来中共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余，那就是说，至少打死了这么多。

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由于各省、市公安局的局长们还是有顾虑，他们担心于放手让学生在街上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被追究。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二日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份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爆发了杀人狂潮。「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全国在这场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中，被杀者应不下十万。

文革初期自杀者约廿万人

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上，从不曾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仅一个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就两千多名。

作家巴金回忆道：「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文革初期自杀的人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

文革期间的一年多的武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另外，死于晚期的“清队”运动人数应在五十万人以上。

遇罗克在66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写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66年8月、惨绝人寰的北京郊区大兴县屠杀事件。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另外，广西省灵山县要建立一个“没有地富阶级（分子）的社会“，文革期间共打死逼死三千二百多人，其中「四类分子」二千一百三十人。该县全家被杀绝的，粗略统计有五百二十多户……杀人还普遍伴随著抄家、拆房、没收所有财物，在经济上同时实行「专政」，使幸存者也无以为生。

七十年代变本加厉

七十年代对反革命的镇压没有丝毫手软，张志新因为对毛泽东提出质疑，被打成反革命，被处决前已经被逼成神经病，临行前被轮奸，被割破喉管。恐怖政权杀害张志新的手段让多少人午夜惊梦。

1970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70年春始的「一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在十五至二十万之间。

八十年代动用军队公然镇压

八十年代的严打，将许多无辜的青年人镇压，有统计数字显示，83年的严打镇压了一百多万人。举世震惊的八九年六.四屠杀事件，是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一次充分表现，也把它残暴展示在世人面前。一个政权，以国家的名义，动用大批正规军和坦克兵团，公然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进行杀戮。“六四”屠杀之后，马上就是镇压带来的大批人入狱和立即开始的处决。恐怖气氛像战争年代的敌占区。

九十年代铲除异己镇压法轮功

九十年代，中共政权对推动中国民主自由的民主人士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法轮功的镇压，正在造成新的成千上万冤魂。而对异议人士、宗教人士、反抗人士的镇压从来没有停止过。

蒙、维、藏被杀人数无法统计

引述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The Asia Watch）的数字，文革中，内蒙古有5万多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字比上述中共官方数字高出三倍多。据清格尔图的研究推算，

在中共统治下，有15万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达赖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死亡达120万，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万人死于饥饿，86万人死于迫害、枪杀。”

据旅居德国慕尼黑的维族学者安瓦尔于1999年在澳门召开的“一国两制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指出，根据中共官方资料：“自1990年到2000年，被中共处决以及迫害死于狱中的维族人等有700多人，被中共关押、收审的人数达56万人次。”

斯大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是个数字。没有比这句话更能代表共产党对生命和屠杀的看法了。

那种残酷的共产主义者，永远也不会把任何死亡数字和每一个具体的生命联在一起。8千万，是个多么大的数字！它相当于近4个台湾，11个香港的人口；是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丧生人数的2倍半还多。虽然这个数字只是一个概况，但它和实际死亡人数相差不会太悬殊。

持续不断地制造恐怖暴力事件，成为维护恐怖暴力统治的有效方法。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中共与国家恐怖主义（三）

盛雪

……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符合个人恐怖主义、集团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四大种类的所有恐怖主义特征。……

五、中国政府使国家恐怖主义达到极限

恐怖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效果，正是利用了人民的恐惧心理。怎么样造成恐惧心理，国家恐怖主义比起任何其它恐怖主义都更加有优势。因为它手上有国家权力，它可以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全方位地对社会和个人进行恐怖主义统治。

中国共产党政府能维持到今天，正是利用了人民的恐惧心理，推行国家恐怖主义的结果。这与其它恐怖主义分子所采取的暗杀、绑架、爆炸，在指导思想和性质上都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死于中国式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民众，已超过一亿。一般的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在进行恐怖行为的组织能力、动动物力、调动人力、组织实施的规模上，以及实施恐怖行为的经验上都比中国共产党政府低档了许多。故东南亚的恐怖分子才要来中国接受培训。

1、范围上，全方位

政治权利的剥夺、经济利益的垄断、文化信息的封锁、日常生活的控制。

政治权利的剥夺：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一个被政治全部控制的社会。早些年，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从上小学开始，你就会在政治上要求进步，要求加入红小兵；到了中学要求加入红卫兵，要求加入共青团；工作以后，更是积极要求入党，就是要主动要求加入共产党，进入这个恐怖组织，主动接受控制。我并不相信所有人都是因为理念上和共产党有高度认同才这么做的。而是因为每个人潜意识中都明白，中国社会是被共产党牢牢控制的社会，你必须要在政治上有了保障，或者有了一定的地位之后，你在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其它领域的权力才能够得到保障和提升。

曾几何时，中国人都积极靠拢党组织，自动接受管制和控制，这样做可以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其中最主要的是安全感。而不积极靠拢党组织，不把自己交给党的人，在政治上就完全失去了保障，真是什么遭遇都有可能发生。

前一阶段，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表示说，要争取资本家入党，这实际上是要政权和金钱的结合，是让一些人在政治上和经济利益上结合，给他们一种保障，实际上是一种更紧密的控制。

经济利益的垄断：共产党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包括对所有人民实行经济上的控制，主要是通过通过对经济资源的封锁及对经济机会和经济利益的控制和垄断来实现的。我们可以

看一看，在中国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是什么样的人先富起来了？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那就是太子党和整个特权阶层先富起来了。

今天的中国是不到 5 % 的人，掌握着 9 5 % 的财富，另外 9 5 % 人，在拼抢着不到 5 % 的生存资源。而近些年爆发的一个个经济大案，无一不是因为中共政权内部利益分配，或者权利斗争所引发。

文化信息的封锁：共产党对整个社会的国家恐怖主义的统治还包括在舆论、传媒、新闻、文化上的封锁。凡是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对这种封锁都会有非常直接的感受，那就是，在中国国内，整个新闻媒体没多少可看的東西。八十年代以前更不用说了，那时中国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当中，有多少是因为什么收听敌台、收藏禁书、或者只是看了当局不许看的一篇文章。许多反革命集团案都是一些年轻人处于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在一起看书讨论聚会等等。连中共高官郭沫若的儿子，也因为组织读书会被整肃而跳楼自杀。

几十年里，所有国内的报纸，头版全是一样的新闻，因为不可以有其它的新闻报导。这样，人民所知道的就是共产党需要人民知道的那些东西，人民无从得知其它的信息。我写作出版了《远华案黑幕》一书之后，因为这本书揭露了远华案许多不为人知的黑幕，中宣部立即下达紧急文件，宣布这本书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禁书，在全国收缴。有不少人因此被抓被判。

照理说，高科技的信息手段应该给整个社会提供了很多空间和机会。可是中国在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潮流下做了什么呢，中国目前有至少三十万网络警察，专责监视网络内容、阻断信息、封锁真相、关闭网页。《中国新闻周刊》对中国的网警有这样的描述：他们虽为警察，却身着便装；他们时时与犯罪嫌疑人短兵相接，却不用枪支弹药、擒拿格斗；他们没有防暴队员那样矫健的身手，却拥有一个装满尖端科技的大脑，对计算机、对网络，他们了如指掌。他们就是网络警察，全称：国际互联网安全监察专业警察，中国最年轻的警种。

中国多次封锁国内一些不同政见的网站，有些根本连政见都没有，只是当局不喜欢。中共还封锁了海外五十万个网站。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见解被秘密逮捕，北京师范大学的 2 0 岁女学生刘荻，就是因为在网上乱说话，被监禁了 1 年多，家里人不许看望，不许请律师，不许和外界接触。中国政府正在继续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国家公权力，去进行恐怖主义统治的新闻和信息封锁。

日常生活的限制：我想，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有感同身受的经历。举例说，中国实行的户口制度，把人牢牢地固定在一个地方；还有，过去几十年一直实行的票证制度，是对中国人生老病死，甚至饮食起居全方位的控制。以前我们过日子每天都必须依赖粮票、油票、肉票、布票、副食卷，那时包括花生、瓜子、火柴、卫生纸都要证。没有这些证券人怎么活呀。

实际上，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对人进行全方位的严密控制。就是说，当你不肯屈从于给你设定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你的生活状态引起官方不快的时候，官方就可以完全切断你的生存来源窒息你的生存空间。设想一下，你要想脱离那种控制，你可能几天都活不了，因为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哪也不能去。所以，这种对社会全方位的控制，应该说是国家恐怖主义统治最完美的一种体现了。

现在是不是没有了呢，现在国内城市实行暂住证，相当于从石家庄搬到北京居住要办签证。不久前一个叫孙志刚的大学生毕业后，在广州找到一个工作，他到广州去上班，当天傍晚上街忘了带暂住证，结果被强行收容，几天后在收容中心被活活打死。

2、做法上，不择手段

监视、监听、胁迫、收买、人质、酷刑、侮辱、公审、连坐、关精神病院。在心灵上进行扭曲、尊严上进行剥夺、思想上进行控制、观念上进行引导、肉体上进行消灭、行为上进行限制。

共产党在人的心灵上进行长期不间断的暗示，使人常常在自己潜意识中已经接受了一种观念，知道什么能做能说，什么不能做不能说。人心里自己已经有了一把尺子，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去配合这样一种统治方式，从而帮助恐怖主义完成了对个人精神上的控制。

另外，共产党长期在观念上对公众进行误导，在人的思想上进行限制等等。上点年纪的人都应该还记得早请示、晚汇报这些事。那时不管你是在读书，还是在工作，肯定做过思想汇报，跟领导谈心；红卫兵、共青团员、共产党员要每个礼拜过组织生活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国家恐怖主义对个人进行控制的一些很具体的手段。

也许有人会说：「喔，这些事情发生过，但并不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好，那么看看今天我们的身边吧。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政府不是仍然鼓励民众之间监视、举报、揭发这样的做法么。仍然可以看到随意监禁、逮捕、甚至绑架这样的现象么。时代变了，但是共产党统治方式的本质没有变。

包括公审制度，这不是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公审制度公审大会——是一种非常不人道，非常残暴的一种制度。而它正是对一个社会或者对人的群体进行恐怖、威吓的一种非常直接的手段。这可以说是对人的精神、心灵、人格、尊严等等，彻底击溃进行全方位控制的一种很好的示范。

公审制度是及其残酷和不人道的，何况，犯人也是人，也有人的基本尊严，他的基本人权也应该得到保护。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常年实行这样不人道的统治，让中国人习惯了这些残暴的做法。而实际上，政府这样做最主要的效果就是恐吓。

中国政府动不动就把人送进精神病院，王万星的遭遇就是例子。他 92 年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平反六四”的字条，因此被关进精神病院至今。共产党经常用人情、亲情和人性作为要挟。

对人进行肉体消灭这样的事情常年来一直在中国非常普遍。多少年以来，中国判处死刑的数字总是远远高于整个世界，常常是全球的总和。

“1995年，中国处决的人数达2千1百90人。当年全球187个国家共有2千9百人被处死，其中76%在中国。”（“国际大赦”的报告）“1996年，根据中国官方报纸的报导，有4千3百67人被判处死刑（平均每天约有一打）。全世界几年处死的人数加起来也不如中国一年处死的多。”（《纽约时报》2001年6月19日的报导）。

2001年，中国一共判处了四千五百人死刑。有时候我在想，难道中国人看待自己的命贱，不把生命当回事？或者说中国人骨子里有犯罪基因，总是有这么大范围的人

会去坑蒙拐骗、烧杀抢掠、触犯刑法。事实上，最基本的原因是政府要对整个社会进行一种恐吓的控制，用严刑酷吏来管制社会，用杀人这样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对社会进行要挟。这种手段是从建国起就一直延续下来的。这几年中国社会道德丧尽，社会矛盾激化，贫富悬殊加大，恶性事件越来越多，共产党杀人的借口也就更多了。

3、中国人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秘密逮捕在中国仍然时刻在发生。在前一个阶段，有几位海外学者回国，包括从美国回去的徐泽荣，搞文革史研究的宋永毅，都是在国内做社会调查的时候被秘密逮捕的。在国内，北京安全局2001年3月秘密绑架了北大研究生毕业的杨子立，同时被捕的还有北师大的徐伟，广播学院的张洪海，以及地质大学毕业的靳海科。他们不是民运人士，不是下岗示威抗议的工人，不是法轮功修炼者，不是上访闹事的农民，他们也没有很明确的政治诉求，没有任何行为可以被划分为政治异己份子，他们仅仅是关心社会的学者。杨子立回老家奔丧，在回来的路上就失踪了，他太太经过很长时间的打探，才知道他是被国安部秘密逮捕了。这难道不是国家恐怖主义对付人民的手段么。

我们知道，异议人士长期以来被以各种名目迫害，甚至可能被政府以嫖娼罪逮捕；很多法轮功修炼者被秘密杀害；自由知识分子被监禁或被迫流亡；下岗工人在争取自己权益的时候被逮捕下狱；包括抗税的农民，被指是非法越级上访。中央甚至还下令要坚决打击非法越级上访。他们随时遭到关押毒打遣返等等。所以，就算你不是以上的任何一种人，就算他们都和你无关，可惜你也不是安全的。在这件事情上，我想到了北京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杨子立被捕后，他太太写的一封信，他妻子说：「在这之前，我从来不关心政治，我也不关心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是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我觉得，那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直到我丈夫被秘密逮捕之后，我才意识到，实际上这样的迫害是随时随处都可能发生的，而且随时都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

所以说，这样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统治，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不管你现在是否感受到或者意识到了，它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特务国家、暴力国家、腐败国家。

(未完待续)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治病还是救命？病入膏肓的中国金融证券业

草庵居士

友情提示:

本文系专为美国某专业杂志撰写的英文文章之中文版,故请各位网友不要自行翻译及转载.

政治与经济之六十四

治病还是救命？病入膏肓的中国金融证券业

治病还是救命？或许很多人看到这样形容中国的金融证券业会很奇怪，特别是身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学者专家更会迷惑。治谁的病？救谁的命？

其实，治病与救命一词的发明权并不在我这里，这是国内学者的发明，它是对中国政府面对今日的中国金融证券业困境的真实描写。

中国的金融证券业真的病入膏肓了吗？10月22日，根据中国政府有关规定，经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同意，决定自2004年10月22日收市后委托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对辽宁省证券托管经营。据悉，辽证资金黑洞在40亿左右，央行已初步同意为这40亿埋单。信达在半年的托管经营期内主要负责处理辽证的债务债权和重组的前期工作，信达的托管期结束后，辽证将整体由另一家公司接手。辽宁证券为今年第七家被托管经营和行政接管的券商。这次爆出的40亿资金黑洞，只不过是把过去辽证所有的债务一次清算，知情人士指出，真正的亏损可能高达70亿元人民币。

而在此之前不久，新疆德隆集团的股市危机，更牵涉了高达五百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亏损，更致使中国政府不得不以政府担保和出资的方式来挽救一家私人拥有的非国有企业的上市公司，更创造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历史记录。而近期的中国股票市场大跌更是使得中国证券业危机四伏，人人自危，几乎中国的证券公司毫无例外地全部陷入了无法为继的困境。从纯粹技术角度上将，中国证券业已经是全面破产，亏损额更高达一千亿元人民币以上。这与技术角度上讲的中国银行业全面破产相互辉映，在全世界金融证券业中“亮出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大约在2001年，我曾对中国一位主管官员谈到了中国金融证券业所面临的危机，尽管在当时，中国的证券业所暴露的问题还没有银行业那样严重，但制度上的问题已经显现。但可惜的是，在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我无法得到跟更详细准确的中国证券业数据来说服这位中国高层官员，即使是到了目前仍然如此，就在不久前，一些国内学者专家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在我询问他们数据时，他们坦率地对我讲：我们也无法得到具体并准确的数据，各项研究仍然需要自己去从政府文件和报告中挖掘，然后依靠自己的判断来分析。

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中国报纸和公开的渠道整理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数据和消息。仅在2003年，中国证券公司已经整体亏损。根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55家证券公司成员年报显示，55家证券公司总体亏损4700万元，部分证券公司出现巨额亏损，如民生证券亏损4.67亿元，共有5家券商亏损超过亿元，其亏损总额达11亿元。中国证券公司的年度亏损总额（不包括委托理财业务所发生的亏损）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而到了2004年八月，中国证券业的整体亏损已经升高到了惊人的地步，而据一般估计，中国证券公司的年度亏损总额大约为一千七百亿元。而事实上，早在2003年初，中国证券业就已经集体亏损超过九百亿元人民币。已将中国证券业的全部资本金消耗完毕。开始了实际上的全面破产阶段。正如中国政府宣称的那样：“中国证券业用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社会百年的历史”。不过以我观点看，中国证券业何止完成了西方国家的百年证券史，简直是超越，至少在目前，西方证券业大部分仍没有破产，而中国证券业连西方国家证券业尚未敢完成的历史都已经完成了，这岂不是“极大的超越”？

奇怪吗？就在最近几天，我还从中国有关部门得到了一个消息，中国政府管理层已批准海南华银、大连证券、鞍山证券、北京华阳租赁公司、山西华康信托、佳木斯证券、新华证券等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其中，大连证券公司破产案已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中，尤其是前一段时间的南方、闽发等大券商动则爆出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的亏空更使得资本市场累积的风险相当高。据笔者根据中国官方不完全的公开报道估算，券商仅挪用保证金部分就高达2000多亿。以此计算，中国金融改革成本就已经高达2.54万亿元人民币。此外，以最保守的估计，中国金融业还需要注资至少1.2万亿元。两者相加，中国政府财政若要为金融业坏账埋单的话，至少需要3.7万亿元人民币。换个通俗的讲法是，全中国百姓需要每人付出2850元人民币来挽救中国金融业。

中国百姓怎么就会那么的不幸？其实，中国百姓的不幸早就发生了。从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其悲哀的开始。自中国开始实行股票市场的那天到2004年10月，中国共发行股票融资9000亿，征收印花税累计为3000亿元，券商获得的佣金约为2500亿，合计一万五千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的股民在股票市场上投资了一万五千亿元人民币。但他们获得的是什么呢？请各位不要吃惊，尽管他们投资了一万五千亿元人民币，但他们获得的回报却只有700多亿的上市公司分红。两者差额为14000多亿元，其中的绝大部分为股民的亏损值。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目前中国的股票市场总价值也不过是一万五千亿元人民币，而且其中的三分之二是不流通股，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六千万股民几乎都是亏损的一塌糊涂，中国证券市场的基础几乎不复存在，在在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中，除去欺诈就是极度的投机和赌博，根本就没有规则和法律的概念。

违法，欺诈在今日的中国证券业中几乎是一个人人皆知的行为准则，去年6月，证监会派交易所对各大券商发出摸底调查，结果发现券商国债违规回购规模达200亿。半年之后，在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和停止一切国债业务之后，中国监管层发现南方证券在上交所欠库50亿，因而在今年2月25日决定让中国证券登记公司再次对券商违规国债回购进行摸底。这次的结果显示，规模已经到达1000亿元了。半年时间，增长400%。今年上半年的财务报表表明，自营仓位普遍较重是券商出现较大账面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截至上半年，最先公布财务报表的40家券商自营证券总额为293亿元，其中大多数与年初相比仓位变化都不大。在今年二季度股市与国债联袂高台跳水过程中，这些券商损失惨重。其中，海通证券自营证券跌价损失就达到3.17亿元，申银万国自营证券跌价损失1.75亿元，

国泰君安和广东证券分别为1.33亿元和1亿元。有关测算显示，上半年亏损券商在自营业务产生的亏损比总收入还多，中间值达到-129%，实际上成为它业务亏损的最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刚刚开展的证券委托理财业务也是今年券商的重灾区。初步估计，券商委托理财规模大概在1000亿元左右。一般地，券商进行委托理财时对客户允诺的保底收益至少是6%，高的甚至达到15%。这意味着，即使券商投资市场的资金能够做到在今年二季度下跌的行情中全身而退的话，其亏损也将达到200亿元。依笔者根据不完全的公开资料估算，今年上半年中国券商委托理财的亏损规模实际上可能超过四百亿元人民币，中国券商已经面临着整体崩溃，特别是九月份以来的中国股票市场大跌，其损失更有可能超过五百亿元人民币。

或许有人会问：中国证券市场缺乏法律和规则，券商非法挪用客户资金，但仍然有着大量的券商资金来源不明，那些维持券商的巨大资金是从那里来的呢？

其实，这很简单。在海外的金融人士和学者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当看到了中国政府的有关法律和政策时就以为中国的一切都是法律化了，都是制度化了，和西方的金融体系一致了。实际上却不然。尽管在近年来，中国政府严令银行违规资金进入市场，但由于体制的原因，证券机构与银行业始终存在着“血融于水”的不法关系，券商的大量资金依然是通过各种途径来自于银行。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部门，无意不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以维护“稳定”发展经济为名，大肆为所欲为地违反法律。券商从银行获得资金的最主要渠道是同业拆借市场。数据表明，截至2004年3月31日，券商从各类银行，融入短期资金规模达2222亿元，占资金拆借总量的八成以上。券商从银行获得资金的另外一条途径则是人行的再贷款。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人行在处理证券公司托管关闭问题上，一直起着“最后救护员”的作用。从2002年起，人行先后向多家问题券商发放了再贷款，以帮助它们度过难关，中国政府不断地使用政府信用和公共资金来挽救违法的券商，同时也不断地用各种手段掠夺中国百姓的财富。而事实上，这种做法效果极差，不仅纵容了不法券商，而且日益加大中国的金融改革成本，而最终由中国全体百姓承担损失。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向鞍山证券和新华证券发放的15亿和14.5亿再贷款，已经随着它们的破产而化为乌有。而向其他证券公司如南方证券和闽发证券等发放的百亿元人民币再贷款（仅中国政府为接管南方证券这个烂摊子，同时调拨的备用资金就高达80个亿），以目前的现状看，其收回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一百多亿元人民币的新增坏帐已经形成。

券商无法五天，中国上市公司和政府管理部门同样是无法无天。不久前，中国财经人士张卫星先生状告中国国资委就是一例。中国政府故意纵容上市公司以大吃小，违法乱纪。中国上市电广传媒以股抵债就充分暴露了中国政府自己违法乱纪，欺诈骗取百姓投资的真实面目。就在张卫星先生根据中国法律控告之后，中国法院竟然驳回了起诉，其理由竟然是“国有股“已被注销”了。而根据中国目前的公司法规定：“第一百八十六条。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九十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减少资本后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按以上中国公司法的规定，这个操作起码要走以下程序：股东大会通过减资决议后，才能公告，而公告后九十天届满，在没有其他债权人异议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而中国的司法机构及国资委，上市公司竟然公然藐视法律，为了利益集团的利益连一快遮羞布都不要了。这是如何的无耻和堕落。

当一个国家公然践踏法律，将百姓利益视为儿戏，那么，这个国家还有什么信用和尊严？同样，一个万亿元人民币的行业之所以仅用十多年的时间就从兴旺走向了灭亡，这其中的原因难道还不清楚吗？

曾经有人面对中国的证券市场曾经这样说：中国政府面临着是治病？还是救命的难题。在中国内部曾有人以中国国情为理由指责西方的证券理论和经验，但中国真的与世界不同吗？难道我们因为中国的国情就需要将前人的理论和经验全部推翻而另起炉灶吗？记得有位中国官员曾说：“中国不需要因为国情而另外发明一个轮子。”从某种程度上讲，我非常赞同这位中国官员的观点，中国需要的是改造自己，而不是以国情为理由放弃前人的经验。在中国，不是西方经济理论实行不了，而是中国缺乏自我改造，缺乏合理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

治病，这对中国证券业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但关键是治病需要先治理中国的政治体制，需要健全法律，首先要中国政府先遵守法律，而不是为了政党利益而肆意践踏法律。唯有如此，中国的证券业才能走出困境，但可惜的是，这不是中国政府的选择。

救命，这显然是目前中国政府最重要的选择，首先，我们从目前中国政府饥不择食地在中国股票市场全面大跌的时候推出“银行基金可以进入股票市场”，社保基金可以进入股票市场”这个行政措施来看，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未来的长远利益。众所周知，即使是在美国和欧洲这些法律健全，监管严格的国家里，银行基金进入股票市场也是有着严格的限制。而在美国，对社保基金进入股票市场更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和限制。百姓将手中的资金选择到了银行，其目的就有区别与投资高风险的股票市场，求的是低风险。而中国一旦混淆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这两类不同性质的企业之后，中国百姓还有自己的安全感吗？为了当前的稳定，为了政党利益和少数集团的利益，今天的中国政府可以不考虑未来，可以放弃未来。这就是如今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创新”，这就是维护社会稳定。

事实上，自从中国开办股票市场之初，其目标就盯在了百姓的居民储蓄之上，中国证券市场的功能大致可以这样来描述：先是某些地方权力机构通过股市向全社会转嫁当地国有企业的危机；垄断资本利用股市洗劫社会财富；然后是中央政府看到了利益之后，与地方政府进行权利博弈，企图分食，在后来，政府各个部门几利益集团积极参与，形成一个公开的庄家，公然进行欺诈和掠夺。而中小投资者对股市的参与客观上成了上述两种实质功能的掩护，他们更多充当的是证明股市合法性的花瓶。在国有银行和国家财政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中国证券市场成为为国有企业缓解危机的最好资金来源。事实上我们看到，大型国有企业目前已经成为股市圈钱大军中的绝对主力，从中石化到宝钢，再到招商银行，这些寡头式的大鳄已经将中国股市变成了他们最好的饕餮场所。虽然这一切都是打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时髦旗号进行的，但其通过股市缓解财务困境的本质一望便知。在今天，圈钱更成为了中国企业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千疮百孔的国有银行也准备拼命挤上中国资本市场这艘风雨飘摇的大船，这可能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不能承受之重，很有可能资本市场救不了银行，还把自己给弄沉了。在中国，证券

市场的惟一功能只能是一一毫无约束地透支中国社会的明天。

10月17日，新华社报道“有关部门就收购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作出解释”。该文对各券商托管过程中发布的个人债权收购行为做出了解释，称个人债务将由有关部门打折收购，(10万元以下全额收购，10万元以上部分按九折收购)，收购方凭此参加金融机构资产清偿。尽管新华社的解释并未明示事情原委，但明眼人一望便知，目前进行的托管背后是中央银行对高危券商个人债务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在决定付出这一成本后，早已透支的券商再无理由继续维持。中国的证券业真正地面临着一次火与血的洗礼。尽管中央政府再次动用社会公共资金来“救命”，但笔者不知道中国证券业的未来会是怎样。根据笔者几年的观察，中国政府动用社会公共资金挽救中国银行业的结果是坏帐继续增加，丝毫没有改善中国银行业的本质。而这次对中国证券业的“救命”行动又能有多少效果呢？

我又记起了一位中国经济学者的一个论断：中国的经济改革的矛盾正在向上集中。

中国百姓是否能躲避这个向上集中的灾难呢？面对这个严重的问题，笔者不知道中国政府会如何处理，但我们会拭目以待。

治病还是救命？病入膏肓的中国金融证券业。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布什连任後美国的政治走向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秦戈

受人关注的2004年美国大选已尘埃落定。短暂的喧嚣过后，世界很快恢复了平时的样子。坦率地讲，对这次美国大选，美国以外的国家和人民显然没有了象对2000年大选那样的热情，大多数人持一种“无所谓，爱谁谁”的冷漠态度。然而美国毕竟还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对世界未来走向的影响力是不容低估的。因此，有必要基于此次大选的过程和结果，对布什连任对未来世界大势的影响这一问题，做一些理性思考。在笔者看来，这类思考大概主要集中于下几个方面。

一、对伊拉克战争

从国际社会关心此次大选的角度看，伊拉克问题当属首要。这是因为正是在对伊出兵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立场，把世界分成了“联盟”和“非联盟”两大群体，用布什的话来说就是世界各国要么是“美国的朋友”要么就必然是“美国的敌人”。这种非白即黑的划分标准，比较典型也比较传神地反映了当今美国的主流意识，即西方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布什与克里的最大区别可能就是在对这一意识的认同程度上。正是这股主流意识，支持着布什的领袖地位。

假想此次克里上台，新政府有可能轻装上阵，与老欧洲国家修好；只要克里稍放身段，双方可以借坡下驴，使伊拉克问题的解决有可能重新回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桌面上。果真到那时，基本上所有国家只能是从现实的“大局”出发，忘记前嫌，在联合国的大旗下，大家一起来给美国总统擦屁股了。

而可幸（或不幸）的是这次布什又继任了。从布什新保守主义的思维逻辑出发，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没有别的什么退路，只能沿着目前这条黑道走下去了。联军们已经以民主的名义已杀死了10多万伊拉克人，彻底破坏了伊拉克的基础设施和生产与生活条件，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资源，更可怕的是据说杀害和流放了17000的伊拉克顶尖科学家，使这个曾几何时中东最富有的石油大国和最强大的军事强国，成为今日万劫不复的残园。世人不禁要问：何时终战撤兵？还需要失去多少人（包括美英士兵）的生命才可以“民主”了呢？，布什、布莱尔们到底要从伊战中得到干什么？

对伊战争从来就没有明确的目的。开战三年以来，战争的发动者或慷慨撒谎欺骗世人，或反复无常诡密多变，或玩弄文字文过饰非。这就不能不使人们怀疑这场战争的目的和初衷，并起来反对这场非正义的战争。虽然布什布莱尔们还在硬撑者，但越来越多的人已不再相信这些政客们的谎言。被美英拉来以拼凑“国际社会”的几个喽罗小国看来实在顶不住其国内的政治压力了，不时嚷嚷着要撤军。看来，伊拉克这个烂摊子也就只能留给美英兄弟了。既然伊拉克这盘菜是美英两国自己点自己吃的，那么买单的事也就只能由他们自己来看着办了。

把这场战争的诱因看成是仅仅为了争夺伊拉克石油资源的看法其实是肤浅的。其实，这场战争是美极右势力为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施该战略的第一步。在冷战结束和“苏东波事件”后，除了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伊斯兰国家从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上自然就变成了西方基督教原教主义者的头号敌人。所有这两类国家都属于被修理之列；只不过愚蠢的萨达母在这节骨眼上被美国所误导发动了侵略科威特的战争，把战火引向了自身。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方式加重了伊斯兰极端组织对美国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偏颇的中东政策的不满，引发了911悲剧的发生，从而激发了布什们十字军东征式的加倍报复行为-伊拉克战争。

所以，所谓的“大杀伤性武器”“反恐”以及“民主制度”之说，都是狼要吃羊时的借口而已。这场战争到了21世纪就一定要爆发，除非萨达母愿意仰仗美国人的鼻息，俯首称臣。

二 反恐问题

正如BBC近日的节目“恶梦的力量(Power of Nightmares)”中所说的，当代的恐怖组织网是由两个极端理想主义势力共同培育出来的，这两股势力就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和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它们怀着不同的梦幻，各自追求着相互对立的理想世界。而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为这两股对立的极端势力提供了合作的契机。华盛顿出钱出枪提供训练，培育出了包括本拉登在内的伊斯兰穆家孩弟(MUJAHIDEEN)来砍来自“魔鬼帝国”的苏联士兵的头，并取得了冷战最后的胜利。所始料不及的是这只残忍的老虎，既可吃人，也可伤己；911就是养虎遗患的例证。911向世人警示了恐怖组织的残忍。恐怖活动在打破了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所描绘的“美国梦”的同时，也为布什们新保守主义的大行其道提供了社会基础。

反恐之于布什是否如有些人所言的那样，“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要作出这样的结论似乎还言之稍早；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反恐在把布什再一次推上了总统宝座的同时，也把美国和世界带入了一个长夜里的恶梦，一个充满恐怖的“迪斯尼”。

以残害无辜者的生命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恐怖行为是和平时期全人类的大敌，必以迎头痛击之。但若不以事实为根据不以国际法理为准绳，而以莫须有的罪名和更为恐怖的手段来反恐，用一种原教主义去反另一种原教主义，其结果就象用沾满癌细胞的两只大手去摘除一个小的恶性肿瘤一样，只能使癌细胞加速扩散，病情加快恶化。

大量事实表明，自从九一一事件以来，美英挟反恐以令天下，从一己的利益出发，肆意践踏国际法和道德价值，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对外肆意发动侵略战争，对内实施以反恐为名、以种族宗教歧视为主要特征的恣意搜捕关押所谓的“疑似恐怖份子”的国家非常措施。仅以英国为例：自9·11以来在本土已拘捕了664名所谓的“恐怖分子”（主要是阿拉伯和印巴族裔的穆斯林人）。而到目前为止的调查表明，除了其中三名与恐怖组织有过某种联系外，没有证据显示其余的661被押者有任何恐怖活动的嫌疑（见BBC11月3日晚的记录片）。这种把以一连串的幻想和假设链为基础所推出的结论和以演员加特技所炮制出来的“证据”强加于人的所谓“反恐”，其性质几近于蓄意谋杀。而美国在这方面比英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个《爱国者法案》的实质就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合法地侵犯公民权利的典型。正是这些卑劣的国家恐怖行径，使得越来越多的理性者开始反思恐怖的根源、反恐的有效途径等问题，也使得世界其他地区的人

们开始对西方的政客和美国所兜售的“民主制度”产生了失望甚至幻灭的感觉。

经过了三年多的“以战争手段，撇开联合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反恐，一方面，布什布莱尔们开始不断地告诉世人，这个世界比以前安全了；而另一方面，官方和媒体都在讲，今天恐怖活动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大，其手段越来越多样化，给人以恐越反越多的印象。一方面，反恐者似乎看每个大胡子的阿拉伯人都是嫌疑犯，每个房舍都象是恐怖组织的蛰居处（SLEEP CELL）；而另一方面，“45分钟时效说”和“肮脏弹威力说”都已被专业人士和科学家证明是美英政府用来吓人的谎言。

本土上的反恐已成了这样一种情形：一些人被恶梦说所吓，杯弓蛇影，惶惶不可终日，到了几近与自己的身影作战的地步；而另一些人已习惯了频繁的“狼来了”的谎言，已不再为之所动。对一些政客而言却言这是一场零-和游戏；不管怎样，这场反恐毫赌还是要坚持下去的，哪怕以欺骗的手段和沉重的代价。

反恐已达到了今天的范围和力度，其中多大程度上来自恐怖活动的真实威胁，多大程度来自于布什布莱尔们所炮制的政治欺骗，值得世人去重新审视和深思。

今天，优越的美国人再一次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了信誓旦旦的反恐总统布什，那么布什在他未来的四年中就一定要展示一番他“魔高一丈”的武功，哪怕是战一通风车也在所不辞；再不济也不能让可爱的美国选民们有被欺骗的感觉。

然而，处处树敌的最后结果很有可能是“求魔得魔”。佛经说，佛自心作，教由魔主；法国启蒙学派哲学家孟德斯鸠早在18世纪就说过，人若想尽办法要使别人怕他，结果必先使人恨他。一味的怨怨相报，只能播下更多仇恨的种子。用下流的手段对那些俘虏和无辜者从肉体、心理和信仰文化上的侮辱和摧残，用武力去强行抢占别人的资源，用消灭科学家的办法去永久性地限制他人科学文化的发展，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用这样的路子兜售自己的“民主”，其结果必然创造出更多的恐怖份子。胆小如兔子者逼急了也会咬人，更别说他们是巴比伦文明的后人；这么浅显直白的道理难道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和50%的美国人真就搞不懂？

这次布什在国际社会一片反对的处境中取得了连任，而布什的支持者多来自于白人基督教基本教义派（宗教票）、高收入群体（富人票）和多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年人（道德票），这些人形成了今天美国社会的（微弱）主流；而年轻，受教育程度高，思想开放、崇尚自由民主人权，具独立思考能力的一群人的思想却成了非主流意识。这一事实说明了当今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宗教狂热、反智主义的基础上的，显示出美国社会正处于一种病态，在朝着一种人们理性和个性丧失的民粹主义的畸形发展。霸权主义意识的恶性膨胀，使得相当多的美国人拒绝忠告，拒绝去思考诸如为什么那些穆斯林极端主义教义派如此恨美国以至于不惜抛妻弃子作牺牲品而不断发动对美国的袭击这样一类简单问题。新保守主义者正是利用了这种思潮，想打谁只需对其全力魔化，然后就可以想打谁就打谁，一个接一个不停地打下去。

有迹象显示布什已蠢蠢欲动，欲把战火引向伊朗或叙利亚。但目前伊拉克战事绵延无穷期，世界反战情绪越来越高涨，迫使即使铁杆联盟如布莱尔政府者估计不原再次卷入如此不得人心的战争；美国双重标准的中东政策，不断刺激着广大伊斯兰信众业已非常敏感的宗教神经，怀疑布什“十字军”打伊的真正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若小布什们还要一意孤行，对伊朗或叙利亚或朝鲜作为下一个目标而再起战端的话，那无异于引火

烧身，其结果不会比越战结果好到哪里去。

三国内经济问题

过去四年里小布什力争从老布什92年落选中汲取教训，已使出了浑身解数来发展国内经济，但效果却是乏善可陈。美国政府的财政由2000财年盈余曾高达2370亿美元，大幅度减少到现在的23000亿美元赤字。为遏制赤字的恶化，美财政部长斯诺不得不于10月14日宣布政府将从当天开始暂时停止向联邦政府雇员退休基金注入新的资金。竞选时所提出的诸如减税啊、创造就业机会啊等口号，不过就是些竞选的漂亮言辞。一方面要减税，一方面还要支付大额的战争费用，增加福利教育卫生等社会保障，这钱从何而来？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本身的基因就决定了它更代表极少数（大财团大商行大军火商）人的利益，更能为这些人谋取利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类利益的受用者。

面对目前如此多的带有基础性的社会经济问题，譬如持续的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大量工作机会的丧失，油价的不断攀高使的老百姓基本生活成本的上升，使得白宫的任何经济政策都难以直接凑效。美国未来四年的总体经济增长如何还有待于视世界经济大势的变化，谁也暂时难以估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就业机会不会增加，财政赤字将继续上升，下层收入群体的情况将恶化。

四中美关系

中国和美国在过去几年来的磕磕碰碰中已基本摸清了对方的底线，认识日渐成熟关系趋于稳定。表现在这次选战中双方都没有与往日那样把向中国发狠话作为筹码为自己捞取资本。中国的官方媒体也低调对待这次大选，这是基于如下的认识：无论最后谁当选，中美关系和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都应该不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这是由美国的本质和利益所决定的。

1) 台海问题。

中美间最棘手的问题是台湾问题。为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绝不会轻易丢掉台湾这枚棋子；但美国又不可能象对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那样地冒然对华动武。因为美国除了对韩战、越战的深刻记忆外，中国总体国力特别是军力的上升，国际法理和世界舆论的向背诸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所表现出的在必要时不惜一战的决心（这是民族大义并不取决于谁来入主中南海），这一点白宫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其实，在「台湾」问题上，克里与布什不会有本质上的差异，最多也只是言辞上的不同。在美国国会仍然掌握在共和党手中的情况下，假使克里当选且有意调整在台海问题上的现行政策，其空间也会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他的决策权力严重受制于由共和党中的极右派主宰的国会。交手几个回合后，最后的结果还是不得不退回到传统的模糊政策上去。

连任后布什与法德之间因伊拉克战争而出现的裂痕不会在短期内得以弥和；美军在伊拉克战争已陷入抵抗战的泥潭而难以脱身；本拉登的幽灵也总是在白宫总统的视野里时隐时现挥之不去；美国内有多于50%的民众不支持或反对战争；加之如前所说的美国财政赤字和国际社会反战情绪的不断快速增长，所有这些使得美国公众和国家财政预算对在短期内再发动一次入侵他国的军事行动的承受能力大大地下降了。即使对狼之如骨的朝鲜、伊朗和叙利亚，布什估计在第二任期内都不敢轻起战端。面对日益现代化日益强

大的中国军力，很难想象美国会为台海问题就敢冒然动手。选战前一周鲍威尔访华时的言论就以透露出了有关政策方面的变化。所以，中国政府寄希望于自己的实力，美国有迹象向中国视善，而台湾当局有些失落后的恐慌，台湾问题在未来四年不大可能发生大的变化。

2) 贸易人权问题

任何贸易制裁手段都是把双刃剑；如上所说，美国在过去几年以来面临着许多严重的经济问题。所幸有从亚洲流入的廉价原材料和消费品，才使得许多处于中底层的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感到大幅度的降低，也使得美国企业在油价飙升的环境下还能降低成本并保持生产的继续发展势头。另一方面，中国这个人口大国伴之以高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为美国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大市场；中国对美制产品和劳务的需求从深海鱼油到IT软件，从送孩子去读书到花大价钱向美国购买技术专利，除了美国限制对华出口的外，可谓面面俱到，包购包销。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几年里中国为稳定美国人民的消费水平和生产发展作出了可观的贡献。所以中美之间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上的争议，布什只能继续他现行的政策，必要时搞点摩擦来造造声势，已安民告示，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在这方面共和党要比民主党保守的多，连毛泽东生前都说更愿意与西方的右派打交道，理由也在于此。

欧洲国家和美国多年来都有关注中国人权的习惯。但两者关心的初衷和目的有所不同：前者多出于对文化和人文的关心，多出于自由文化人的理想主义的成分，而美国多出于其推行全球霸权主义的需要。

3) 在国际事务上对中国的需要

在此次大选国际社会对美国政府特别是布什本人的反感情绪得到了充分的暴露，这不仅是在那些亚非拉的穷国，即使在欧洲国家，甚至英国这样美国的铁哥们中，大多数人对布什的反感，和对以强凌弱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的美式民主的失望，溢于言表。

美国日趋孤立的国际处境下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霸主的作用范围和作用力度。尽管布什政府花了10亿美元致力于改善其形象，但收效甚微。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特别是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和作用，美国是难以低估的；中国军事实力的日益崛起的军事大国地位意味者与中国为敌的代价太高，这一点美国也是清楚的。中国着力于高科技的发展和国际交往中的多边化和多元化，使得美国在过去屡屡得手的“卡脖子”手法日渐式微。无论是在伊拉克问题，朝鲜问题，世界贸易和区域安全问题上，还是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美国也是有求于中国的携手合作的。

祸兮福兮所依，福兮祸兮所伏。布什的连任和共和党的全面取胜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新保守势力将有了更大的民意空间去利用之；然而美国式的价值观却使世人空前的失望和寒心，并引起了人们的严重质疑。美国人所谓的道德，不是世界的和平，不是为子孙后代节约资源，不是追求民族间国家间的平等互利和睦相处，而是以反堕胎、反同性恋婚姻等为特征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以这种哲学思想为基础而发动的以反穆斯林基本教义为特征的恐怖主义的战争，实质上与发生在近1000年前的十字军东侵却有非常的

相似之处。在一些自由派人士担心中国青年人中民族主义上升的同时，他们也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美国这种典型的民粹主义的膨胀。

强国并非一定是文明之邦。综观历史上那些曾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帝国们的衰败甚至消失，都是由于强大使人自我膨胀，进而疯狂，而最后则自我退出历史舞台。强奴总归灰飞烟灭，能留下来为子孙所骄傲的正是那些“兴灭国，继绝世”“有容乃大”，“礼运大同”等博大精深宽容平等的属于人类社会共有的文化智慧和文明遗产，不是那种挑起文化之间的互相敌视，弱肉强食，把人类引向战争悲剧的丛林法则。而强悍富有的美国帝国目前最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文明的思想内涵。

2004-11-09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说几句林思云先生的小评张纯如

云儿

读到老芦的《让世界知道——悼张纯如女士》，才知道林思云先生又有评论张纯如的大作问世。特意到楼下看了看，不禁摇头。感觉老芦的“毒眼”真是厉害，多年以前关于林先生诡辩的评论，“并不是他思维粗疏，而是刻意为之”，也是我读他评论的感觉。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一书问世至今，林先生写了多篇评论，想来是读过这本书，很熟悉其内容的了。然而林先生评论给我的印象却是，他要么是没有读过张纯如的书，根本不了解其内容就信口开河；要么就是故意不提张纯如书中列举的事实，以断章取义的方式误导读者。

下面是一个例子：

张有关日本的叙述C：“在德国，如果教师在历史课上删去大屠杀部分，将是违法行为，而日本人在几十年来一直把课本中南京大屠杀的材料有系统地清除得一干二净。他们从博物馆拿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销毁原始的资料，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痕迹。”

张女士显然从来没有看过日本的课本。我亲眼看过好几种日本的中学课本，里面都有关于“南京事件”或“南京大屠杀”的介绍。也正是因为日本的课本有这样的内容，后来才有右翼提出要修改教科书。日本NHK拍摄的历史系列片《20世纪的映像》，也提到了南京大屠杀的问题。

林思云所引张纯如的话，翻译不够准确。英文原文是the Japanese have for decades systematically purged reference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 from their textbooks. 意即，“日本人有系统地将南京大屠杀的材料剔除出教科书，达几十年”。林先生的引文，多了“清除得一干二净”几个字，让人以为目前的日本教科书完全不提南京大屠杀，这不是张纯如的意思。在她的书里面，张就明白指出，1982年以后，日本人再也不能在教科书中忽略南京大屠杀了。

那么，日本人是否在几十年间从教科书中剔除南京大屠杀呢？

张纯如在她书里面为此提供了证据。林思云先生批驳张纯如的时候，显然忘了告诉我们一件事——张书第十章专门辟了一个整小节，花了五页的篇幅，介绍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来龙去脉。

她提到，在20世纪60-70年代，相当长的时间，由于官方审查限制，日本教科书极少提及南京大屠杀。60年代，当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在自己编著的教科书送审文本中，提到南京大屠杀等史实的时候，日本文部省却要求他改写其中关于屠杀的描述，删除有关日军强奸妇女的说法。理由是，不能让读者以为日军单方面屠杀中国人，而强暴妇女各时

代战争都有，不能单提日军如何，等等。家永三郎不服，向法院控诉文部省，打了30多年的官司。

家永诉讼唤起了更多人关注教科书问题。终于，到了1982年，历史来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日本文部省对送审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的大量修改，招致了亚洲国家的广泛抗议。当时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谈话，承认了错误，许诺改正，并且把要照顾同邻近亚洲国家关系这一精神作为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的基准之一，即所谓“邻近国家条款”。从这以后，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问题，才进入了绝大多数教科书之中。

林思云批张纯如，绝口不提张书对教科书问题历史源流的叙述，不提六七十年日本官方要求把南京大屠杀从教科书中删除或加以改写的史实，却以90年代以后他所看到的日本教科书状况，去否认张纯如关于几十年间日本曾力图将南京大屠杀剔除出教科书的说法。我觉得这属于地地道道的诡辩，会误导那些没有读过张书的人。

林思云的其他评论，大抵属于这种类型。他说张没有提供证据的地方，其实在张书里都有证据。感觉上，林先生象是假设他的读者都没有读过张的书，开口的时候忒大胆了一些。

附录：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中关于教科书问题的章节

THE TEXTBOOK CONTROVERSY

Perhaps one of the most sinister aspects of the malaise in Japanese education is the deliberate obstruction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bout World War II through textbook censorship.

Almost from birth, Japanese children fight for footholds in the slippery pyramid of education, striving to reach the tip, which is admission to Todai, or Tokyo University. There are cram elementary schools to get into the right high school, where kids study from 9:00 P.M. to 6:00 A.M.; cram preparatory kindergartens to ensure admission into the right elementary school; even exclusive maternity wards that guarantee babies a ticket into the right nursery school.

But despite the "examination hell" for which the Japanese are famous, what do their schoolchildren learn about World War II?

Very little, as it turns out. The entire Japanese education system suffers from selective amnesia, for not until 1994 were Japanese schoolchildren taught that Hirohito's army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s of at least 20 million Allied soldiers and Asian civilians during World War II. In the early 1990s a newspaper article quoted a Japanese high school teacher who claimed that his students were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Japan had been at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thing they wanted to know was who won.

How does this happen? All textbooks used in Japan's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must first be approved by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ritics in Japan note that social studies textbooks come under the heaviest scrutiny. For example, in 1977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duced a section on World War II within a standard history book of several hundred pages to only six pages, which consisted mainly of pictures of the American firebombing of Tokyo, a picture of the ruins of Hiroshima, and a tally of Japan's war dead. The text neglected to mention the casualties on the other side, Japanese war atrocities, or the forced evacuations of Chinese and Korean prisoners to labor camps in Japan.

Much of this censorship might have gone unchallenged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efforts of one brave crusader. In 1965 the Japanese historian Ienaga Saburo sue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his lawsuit was the beginning of a legal battle that would span three decades and gain the backing of thousands of sympathetic Japanese followers.

Those who have met Ienaga are struck by his frailty. The bald octogenarian historian trembles when he walks and his voice is hardly louder than a whisper. But underneath a powerful will is at work.

The Ministry interfered with Ienaga's attempts to document the Nanking massacre for schoolchildren. For example, in his textbook manuscript Ienaga wrote: "Immediately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Nanking, the Japanese Army killed numerous Chinese soldiers and citizens. This incident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Nanking Massacre." The examiner commented: "Readers might interpret this description as meaning that the Japanese Army unilaterally massacred Chinese immediately after the occupation. This passage should be revised so that it is not interpreted in such a way."

Finally, over Ienaga's protests, the passage was changed to: "While battling the fierce resistance of the Chinese armed forces, the Japanese Army occupied Nanking and killed numerous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This incident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Nanking Massacre." That statement may have satisfied textbook censors as a compromise between Ienaga's argument and the ministry's position on the massacre. Unfortunately, the statement is simply not true, because it implies that the massacre occurred in the heat of battle.

The examiner demanded that Ienaga delete his description of the Rape itself, claiming that "the violation of women is something that has happened on every battlefield in every era of human history. This is not an issue that needs to be taken up with respect to the Japanese Army in particular."

Even the word aggression was deemed taboo. "Aggression," the censors wrote, "is a term that contains negative ethical connotation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lso bristled at Ienaga's efforts to condemn Japanese wartime behavior. It took offense at the following passage: "The war was glorified as a 'holy war' and the Japanese Army's defeat and their brutal acts on the battlefield were completely concealed. As a result, the majorit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were not able to learn the truth and they were placed in a position where they had no choice but to cooperate enthusiastically in this reckless wa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deleted this passage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expressions

"the Japanese Army's brutal acts" and "this reckless war" were "unilateral criticism of Japan's position and actions" during World War II.

In 1970, when he actually won his case (Sugimoto Ryokichi, the judge for the Tokyo district court, ruled that the screening of textbooks should not go beyond correction of factual and typographical errors), extremists fired off death threats to the defense attorneys, the judge, and Ienaga himself, while thugs kept the scholar awake by banging pots and pans outside his home and screaming slogans. The police had to escort Ienaga and his counsel in and out of court through a secret door.

With the exception of an award that Ienaga received in 1948 (when, he admits, he was "politically tone deaf"), he has been consistently ignored by the official committees that dole out national prizes in history. The historian has won, nevertheless, a place in history itself. The tremendous publicity that Ienaga receives for his efforts arouses foreign protests that force change upon the highly conservativ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y the 1980s years of lawsuits and political activism were beginning to pay off. In 1982 the distor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Rape of Nanking in Japanese high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had become such a hot issue in Japan that it created an international diplomatic crisis. All four of Japan's major national newspapers carried headlines on the subject. Chinese and Korean officials also filed formal protests, accusing the Japanese of trying to obliterate from memory the history of their aggression to lay the basis for reviving militarism i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e Japanese textbook examination council, however, tried to defend itself by telling reporters: "It was not fair to describe the Nanking atrocity in three to five lines while mentioning Soviet or American atrocities against the Japanese in only one line or two."

In the end, the publicity from the textbook controversy accomplished two things. One was the dismissal of Japan's education minister, Fujio Masayuki, who had rigorously defended the ministry's policy of whitewashing World War II history. The second was a heightened awareness inside the ministry that the Nanking massacre was something they could no longer ignore. Before Fujio's dismissal,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Defense of Japan had prepared a right-wing history textbook that summed up the Nanking massacre in this manner: "The battle of Nanking was extremely severe. China has asked Japan to reflect regarding casualties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army and civilians." But after Fujio's dismissal,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wrote the passage to read: "The battle in Nanking was extremely severe. After Nanking fell,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Japanese army killed and wounded many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thus drawing international criticism."

Of course, the issue of textbook censorship is far from over. Rather than denying the massacre outright, some officials in Japan now focus on minimizing its scale. In 1991 screeners at the ministry ordered textbook authors to eliminate all reference to the numbers of Chinese killed during the Rape of Nanking because authorities believed there

was insufficient evidence to verify those numbers. Three years later the ministry even forced a textbook author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killings by Japanese soldiers during one day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from twenty-five thousand to fifteen thousand people.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textbook cited a diary account that twenty-five thousand captives were "put away" in a single day. But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ministry, the textbook publisher backed down and shortened a quotation from the diary so that it read: "The Sasaki unit disposed of 15,000 people."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也谈云儿评论本人对张纯如女士的看法

林思云

首先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张纯如女士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导言，并不是我翻译的，而是摘自中国大陆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资料来自网上）。该书标明的作者是张纯如，孙英春等，尽管张纯如和孙英春是并列的作者，考虑到张纯如的中文水平，我想大概是以孙英春为主翻译的吧。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中文版是张纯如亲自承认的正式版本。

下面我就谈谈云儿提出的问题。

第一，云儿指出该书中的一段话“日本人在几十年来一直把课本中南京大屠杀的材料有系统地清除得一干二净”的英文原文，然后云儿说“但这显然不是张纯如的意思”。

我对云儿说“但这显然不是张纯如的意思”，感到很吃惊。我引用的这本书的第一作者恰恰就是张纯如本人，因此这本书中每一句话，都应该代表张纯如本人的意思。云儿凭什么说：“这显然不是张纯如的意思”？

再者purged这个词，翻译成中文有很多译法，我认为翻译成“清除得一干二净”，并没有太大问题。尽管云儿给出了另外一种翻译方法，但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清除得一干二净”肯定是翻译错误，或肯定不是张纯如的本意的情况下，我宁可相信张纯如本人为第一作者的书中的译法更反映了张纯如的本意。

第二，云儿说该书中的“失业的威胁”是翻译错误，应该译为“危及事业前途”。我觉得career-threatening翻译为“失业的威胁”并非太离谱，所以在云儿指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以前，我还是宁可相信张纯如本人为第一作者的书中的译法。

云儿指出该书从英文翻译为中文，有不忠实于原文的地方，这话不错。但我提醒云儿，在中文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同样也会出现不忠实于原文的地方。云儿关于翻译的疑问，恰恰又证明我前面说的：搞历史研究不看原文，仅仅依靠译文是很危险的。由于张纯如看不懂中文和日文的原文，仅仅靠翻译成英文的资料搞南京大屠杀研究，会不会把一些资料在翻译成英文时的翻译错误，当成事实了呢？

第三，云儿说【为了证明张纯如之言“毫无根据”，林先生非常小心地将张纯如的话一切两半，隐瞒了张纯如所提出的事实根据，包括紧接着林先生引文后的一句话：“1990年(疑为1989年之误—云注)，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均说，日本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一定责任。他因此被一名枪手射中胸部，差点死掉。”】

云儿把这件事情理解错了。我略去张纯如的这段话，是因为她这段叙述的错误太多，我要引用时，必须加以长篇的说明更正。既然云儿说我“隐瞒了张纯如所提出的事实根据”，我也只好不怕麻烦，详细讲一讲此事。

首先张纯如把广岛市长本岛均遇刺的时间搞错了。在序言中，张纯如说：“1990年，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均说，日本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一定责任。他因此被一名枪手射中胸部，差点死掉。”而在同一本书的第10章，张纯如又说：“1989年1月7日，一个右翼狂热分子从背后向本岛均开了枪。子弹打穿了他的肺部，但这位市长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张纯如在自己写的同一本书中，对这件事件的发生时间都搞乱了，所以云儿也不得不专门为她作注【疑为1989年之误—云注】。可惜云儿好心的“注”错了，本岛均遇刺的时间发生在1990年1月18日，并不是说的张纯如说的1989年1月7日。这样一件简单事件的发生时间都搞错了，可见张纯如写作的态度不很认真。

然而张纯如的书中不仅仅在这一处搞错时间，类似的时间错误相当多，特别明显的时间错误就有：张说日本的江户时代开始于16世纪（实际上江户时代开始于17世纪）；张说孙中山1911年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实际上孙中山是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张说国民党1928年定都南京（实际上国民党于1927年定都南京）；张说南京陷落的日期是1937年12月12日（实际是12月13日）……。日本有人特地罗列出张纯如书中的90处常识性的错误（上述的本岛均事件的时间错误还不包括在内）。

再说本岛均遇刺的事情吧。张纯如又把这个事件的前后关系搞错了，张说：“1990年，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均说，日本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一定责任。他因此被一名枪手射中胸部，差点死掉。”

事实上，本岛均关于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发言不是在1990年说的，而是在1988年12月7日说的。他的遇刺是在1年多后的1990年1月18日，因此这与他对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发言，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在日本，社会党、共产党人经常同样地公开扬言要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而日本共产党更是把废除天皇制写入他们的党章（最近有变化），也没有听说社会党、共产党人经常遇刺。

本岛均遇刺其实另有隐情。刺杀本岛均的是一个在长崎市的名叫“正气塾”的右翼团体。1986年“正气塾”主办的刊物创刊时，长崎市长本岛均亲自前去祝贺，不仅发言鼓励，而且赠送了花环，可见当年本岛均与“正气塾”的关系不一般。因此有人推测，后来本岛均的天皇战争责任发言，让“正气塾”的人感到本岛均背叛了他们，所以进行报复。

另外，政治家遇刺的事件，在西方国家也是屡屡发生，并不能作为“恐怖”的证据。比如美国总统肯尼迪、里根都曾经遇刺，这并不能因此说美国是一个恐怖的国家。从本岛均遇刺事件来证明日本是一个“恐怖的国家”，并没有任何说服力。

张纯如还说：“日本恐怖的气氛阻止了关于南京暴行的公开的和学术上的讨论，进一步压制着人们对事件真相的了解。”她的这一看法是有问题的，日本并不存在什么“恐怖的气氛”，人们可以自由地谈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关于这点郑若思先生已有专文，我这里补充一点，请大家看看日本权威的大百科全书是怎样解释南京大屠杀的。

附录

云儿：再说林思云先生的小评张纯如

老马在楼下，续弹林思云先生的论调，指控张纯如说了“日本人在几十年来一直把课本中南京大屠杀的材料有系统地清除得一干二净”的话。其实查张纯如原著，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the Japanese have for decades systematically purged reference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 from their textbooks，意即“日本人有系统地将南京大屠杀的材料剔除出教科书，达几十年。”老马和林先生引用的文字，多出了“清除得一干二净”几个字，让人以为目前的日本教科书完全不提南京大屠杀。但这显然不是张纯如的意思。在她的书里面，张就明白指出，1982年以后，日本人再也不能在教科书中忽略南京大屠杀了，改而在死难者人数上作种种限制。

张的书还指出一个史实：在这以前的很长时间，日本文部省力图将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剔除出教科书。这是张纯如说那句话的基本依据，而林先生却故意不提，于是他就可以指控张的话“毫无根据”了。

林先生的评张纯如文章，用的基本上都是类似的手法。下面再举一例：

张有关日本的叙述A：“日本恐怖的气氛阻止了关于南京暴行的公开的和学术上的讨论，进一步压制着人们对事件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他可能会，也一直会受到失业的威胁，甚至生命威胁。”

对于张的这段话，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明白她的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第一，日本不存在什么“恐怖的气氛”，尽管不时有右翼人士示威游行，但这在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国家是很正常的事，和“恐怖的气氛”毫无关系；第二，我没有听说过有一个日本人，因为表明了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而遭到失业的迫害。张女士本人也没有例举出一个实例，来证实确实有日本因为表达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看法而遭到失业的迫害。

林先生在这里所引用的译文，其中“失业的威胁”，又是不准确的翻译。

查张的原话是：to express one's true opinions about the Sino-Japanese War could be—and continues to be—career-threatening, and even life-threatening，意思是“表达个人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在以前和现在，都可能危及事业前途，甚至危及生命”。这里的career-threatening，不是“失业威胁”，而是指危及事业，比如从政者的政治前途等等。

辨明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林思云先生指责张纯如的第二点，完全建立在英文理解错误和翻译错误之上，赖不到张纯如身上，不能由她负责。

那么，张纯如所言，在日本，表达个人关于中日战争的观点，可能危及事业前途甚至生命，有没有事实根据呢？

为了证明张纯如之言“毫无根据”，林先生非常小心地将张纯如的话一切两半，隐瞒了张纯如所提出的事实根据，包括紧接着林先生引文后的一句话：“1990年(疑为1989年之误—云注)，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均说，日本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一定责任。他因此被一名枪手射中胸部，差点死掉。”

在张书第十章中，对于这一事件，还有更进一步的叙述：

“自民党员们不仅撤销了他在该组织中的顾问资格，还成功地说服了县知事拒绝同市长进行政治上的合作。右翼组织甚至声称要杀死本岛均。1988年12月19日，24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开着30辆配有高音喇叭的卡车，在长崎市游行，叫嚣着要把本岛均的死作为对他的“神圣的惩罚”。两天后，在长崎游行的团体增加到62个，装着高音喇叭的卡车增加到82辆。来自无数保守组织的代表，包括靖国神社团体赛的代表，都呼吁弹劾本岛均。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病逝世，此后不到两周，一个右翼狂热分子从背后向本岛均开了枪。子弹打穿了他的肺部，但这位市长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很清楚，本岛均的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威胁。我想，即使林先生拾出日本的“民主和言论自由”来，恐怕也不能认定这些事件“是很正常的事”，不会造成任何“恐怖的气氛”，甚至“和‘恐怖的气氛’毫无关系”吧？

其实，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气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比如今年因在漫画《国家燃烧》中，描绘“南京大屠杀”场面而遭到激愤抗议的本宫宏志，他所感觉到的高压气氛，象林先生这样倾向性极强的人，就不一定能感觉得到。我尊重林先生对于日本的感受，也希望林先生不要轻率地否定别人的感受。要批张纯如，就堂堂正正地把对方论点论据都摆出来，尽可能不要隐瞒证据断章取义以误导读者。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也说中国人为何要求日本道歉

芦笛

今天老怪说，中国人之所以要求日本道歉，乃是心理不平衡，这不平衡的原因无非是两条，第一，日本不是中国打败的；第二，日本人远比咱们有出息，财大气粗，所以咱们心里当然不自在。这两条合在一起就是那“不平衡”，非得让人家道歉了，体现出该“练死”的“小日本”确实低咱们一头，这平衡才能恢复。

老怪说的当然有点道理，有点很深刻的道理，有点非常耐人寻味的道理。不过，似乎不完全是他说的这么回事。

用法国来对比立刻就可以发现这理论站不住脚。众所周知，毋庸置疑，德国不是法国打败的。比起中国来，法国在二战期间的表现要更窝囊一万倍。法国只是在早期抵抗过德国，但立刻就投降了，维希政权不但听任德国占领法国的大片地区，而且还在北非与英国交战，而该政府可是获得大部分法国人民拥护的。诺曼地登陆前，流亡海外坚持抵抗的戴高乐被人民一致谴责为法奸。法国解放完全是靠盟军的武力，戴高乐不过是率领了一点象征性的部队进入巴黎而已。

法德差距虽然没有中日那么大，但德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日子比法国人好过多了，这大概老怪最清楚吧。

可从来就没听说法国人纠缠著德国人要求道歉。相反，两国关系大概是自立国以来史无前例的好，您说“怪理论”站得住脚站不住脚？

老怪说的很有道理，中国人对日本人主要还是个心理不平衡的问题。但这不平衡的因素很多，嫉妒的成分当然存在，但不是唯一的因素。主要原因，在我看来，还是“Justice has not been done”的普遍感觉。

苏联人不要求德国道歉（其实这不是事实，苏德建交公报上首先就是这条，只是人家没有闹成全民运动而已），那是因为人家没有咱们这个“正义尚未伸张”的感觉。相反，苏联红军打入德国后，把可以找到的女性全都奸了，东德给炸成了一片瓦砾场，纳粹官员绞死的绞死，坐牢的坐牢，接下来又把东波兰并入苏联，把普鲁士的土地挖了一大块拿去赔波兰，让波兰全国从东向西平移了两百公里。做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气不顺的？

法国虽然没这么狗皮倒灶，但一枪没放还白捡了个“战胜国”，不但把亚尔萨斯—洛林再度割让回来，还长期派兵占领西德和柏林的三分之一。比起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的投入来，这产出也该够让他们气顺了吧？

最主要的还是德国人的态度。纳粹战争罪行、特别是对犹太人实行的种族灭绝罪行在全世界曝光后，德国全民在世界面前给打断了精神的脊梁骨，那沉痛悔罪的态度，让哪怕是态度最激烈的复仇主义者见到也要消了气。

日本人这么做了么？

中国虽非战胜日本的主力，却是参战最早、受害最烈、牺牲最大、最有资格要求日本赔偿损失的国家。然而在日本投降后，唯一的报酬就是收回了本来就是咱们的领土——台湾，此外一无所获，连派兵占领日本的资格都没有。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毁灭了不计其数的财产，最后国共两党却为了打击对方，争相豁免战争赔款，您让百姓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去？

最可气的还是我反复说的那条：日本的战争罪犯基本没有得到惩罚，日本的战争罪行基本没在全世界范围内披露。不但美国处于冷战需要包庇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就连国共两党都为了打击国内政敌竞相媚日，比赛谁更能包庇纵容民族世仇，甚至国土争端都有本事装聋作哑，连民间索赔、保钓运动都有本事压制。上次日本天皇去访问中国，中共居然把那些民间索赔志士控制起来，让他们无法前去示威。这种丢脸烂事，也只有那个下贱烂污卖国政府才干得出来。

Peacemaker 网友问我50、60年代中国人对日本战争罪行是否有所了解，问得我只有苦笑。中国的外交从来是为内政服务的，而中国的关键内政只有一个：镇压政敌，维持统治。教育和宣传从来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目的的。

50年代宣传涉及到的外国基本只有两家：苏联老大哥和美国野心狼。前者是上帝，是祖宗，是洋爸爸，“老大哥”，“亲爱的父亲斯大林”，后者是魔鬼，是孙子，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建国”之后不久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类似“去纳粹化运动”的“去英美化”。所有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都必须自我“吕正操”娘，沉痛检讨英美的罪恶影响和“亲美、崇美、恐美”思想。

60年代洋爸爸、老大哥逐渐变成了“苏修新沙皇”、“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最终在70年代初取代美帝变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但宣传焦点还是这两家外国。日本根本就连配角都不算，唯一的用途便是充当哈老怪的师兄丁老怪（参见金庸《天龙八部》）手中的“腐尸毒”。

换言之，日本是我党用来妖魔化国内外政敌的化妆油彩。对国内政敌（哪怕是该敌已经被赶下海也罢），日本人据说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后台——所谓“敌（日）、伪（汪）、顽（国府）合流”。主要反面角色还是蒋介石。

我作为“杂学旁收”、兴趣广博的中学生，对八年抗战的了解就下面这么些：

一、唯一抗战的军队就是8路军和新4军，抗击着日军武力的百分之五六十，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具体数字记不住了，请去看朱德《论解放区战场》）。

二、八年抗战，中国军队只打了这么几个仗：平型关战役、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机场，百团大战。

三、八年中，蒋介石似乎就干了两件事：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淹死了无数人民；跑到峨嵋山享福，然后下山摘桃子。

四、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是日本战败关键。在很长时间内，我都不知道美国原来也是交战国而且是主要交战国。第一次知道美国原来也是交战国，乃是在高中时看了许立群编的历史书（不是教科书），上面提到“美国在日本投降前夕扔下两颗原子弹，以此骗

取功劳”的短短的一句话。此前虽然在不同场合看到“太平洋战争”一语，但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因为从来没有解释介绍。该词出现时多半是说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战线拉长，兵力单薄，英勇的八路军、新四军如何如何趁机反攻、收复失地云云。

在妖魔化外敌时，日本的主要用途先是抹黑美国，后抹黑苏联。50年代报上提到日本，似乎只有这么几条内容：美国扶植日本战犯岸信介；美国日本安保条约是针对中国人民的战争同盟；日本人民奋起反抗美国侵略（我到现在还记得《人民画报》上的日本示威群众打出的标语：“米原子动力潜舰寄港阻”，其中夹杂的假名当然略而不计）；日本人民沉痛追悼被丧心病狂的美帝用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疯狂屠杀了的无辜平民。

60年代，除了“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歌颂虚构出来的“中日友谊”之外，日本从中国报纸上消失了很长时间，后期才出现。当时日本只有一件唯此为大的事，便是向苏修新沙皇索回北方四岛。这P事被政府反复地大剂量地高密度地重复，以致于那拗口的地名竟然成了我的永久记忆：国后，齿舞、择捉、色丹。

这就是一个50、60年代接受中小学教育的人获得的有关日本的全部信息，其中没有国府领导的所有重大战役包括台儿庄大捷，没有赴缅远征军的浴血苦战，也没有只言片语的对日本战争罪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披露和谴责。本人这方面的信息，全是从家长那儿获得的。是他们从小培养了我的仇日情怀。我在60年代后期开始觉醒，在地下读书运动中获得的信息，证明他们的教育是justifiable的。

由于苦主与老美的合力包庇，使日本战争罪犯根本没有得到惩罚，战争罪行没有得到清算，战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苦难从未得到赔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还不知感激，还要疯狂翻案，就连某些中国人也跟著说什么“日本以将士鲜血从俄国人手中抢回了满洲，所以当然有权进入满洲”、“日本入侵中国大陆无非是重复西方列强干过的事”、“日本人领导的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正义不但没有得到伸张，罪犯还如此嚣张，请问天下有哪个受害人能咽下这口气去？道歉乃是最低的要求了。

在我看来，中日民族仇恨是中国政府（包括国共两党先后执政的政府）夥同日本全民酿造出来的苦酒，责任在中国卖国政府和日本人民身上，赖不到中国人民头上来。这毛病如果不根治，必然在日后要形成大患，再度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别忘了，中国是于今世上拥有核武器的唯一野蛮国家。核武器很可能在未来变成某个政治大流氓迎合暴民复仇心理、“练死小日本”的哗众取宠工具。

不幸的是，似乎没有哪个中国人有那眼光看到这一点，而许多在日华人通过为日本右派呐喊，正在为这仇恨火上加油。这才是最可悲的事，因为他们与居住其他国家的海外华人不同，是中日交恶首当其冲的受害人。不过这也不是在日华人特有的毛病，不遗余力地煽起国人对所在国的仇恨，似乎就是咱们这些海外赤佬的共同使命。比起可恶的美国帮来，可怜的日本帮算是好多了。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反对妖魔化日本不等于为日本护短—答张三网友

郑若思

张网的批评，使我想到前天罗雀格格给我的贴子：“老郑啊，在日本的华人处境就是尴尬！”这次关于张纯如著书的争论使我深有体会，即使是在这个号称“中文网上最好的政治论坛”，在一群既有高学历、也有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当中，想要实事求是地谈论日本问题也是相当不易的。楼下有位过去还算话语投机的网友，还没看我说的不是事实，先说我的“立场”有问题，真令我啼笑皆非。

之所以如此，第一说明日本改善国际形象的努力还不到家，第二说明整个华人世界对日本现实的了解非常片面，那么作为了解日本的华人想要传达日本的信息，我认为一要有分证据说一分话，二要严格区分哪些是日本的客观状况，哪些是日本人的观点。三要既反对妖魔化日本，也绝不要为日本护短。

张网提出要多用数据来说明问题的建议很好，我以后也会注意这点。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光用一个数据是无法说明整体问题的。例如你说的右翼教科书的采用率，固然说明日本社会目前并不愿接纳这样的历史观，但是小林善纪全面阐述右翼史观的漫画《战争论》发行几十万册，又该如何解释呢？右翼分子的草根活动比学院派更活跃，的确使我感到很忧虑—当读着《战争论》长大的孩子成了父母之后，他们还会像今天这些读着《南京之路》（本多胜一著）长大的父母一样，到教委门口静坐抵制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吗？

在没有得到确实的证据之前，不能说日本政府有一个具体计划，按部就班地抹去教科书中日本不光彩的历史，但是日本政坛有相当一部份保守政治家对右翼的极端民族主义历史观抱着强烈共鸣。我觉得修改具体的史实记载，远没有“每个民族都可以按自己的需要解释历史”的观点那么危险。现任外务大臣町村信孝就是这样一个赞成此观点的保守政客，他任文部大臣期间，右翼教科书通过了审定，虽然文部省表示了这种审定并不代表同意教科书中的内容，但是你能说，这是完全没有官方背景的吗？

张网关于德国极右翼的文章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所以我把它转到海川。我不了解德国的情况，但我认为日本有几个特点恐怕是德国没有的，一是靖国神社与日本国家主义的传统渊源，使它不是一座单纯的纪念设施；二是日本政界左派势力大退潮，永田町（国会所在地）几乎是保守派的天下，连日本人都说，国会的势力均衡失调了；三是保守派中在执政理念上奉行现实主义，而在世界观、历史观上与极右翼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的人越来越多了。请张网对比一下德国的情况，这样我们可以看得全面些。

张网谈到的中曾根康弘确实是保守派政客中的识时务者，他在历史观上与极右翼区别不大，但是他明白维系日中友好关系的重要性，也明白开明政治家执掌中国对中国以及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在看到胡耀邦面临危机的时刻决定中止参拜靖国神社，后来他在

回忆录中强调“这是顾及老朋友胡耀邦的政治生命”，说明他是一个明智的政客，所谓“中日友好奠基人”，也就是对他务实精神的评价而已。可惜，日本政坛上像中曾根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少，而像小泉这样的民粹主义者越来越有市场，所以我认为，日本的保守派如果继续这个过程，日本右倾化的趋势将日益明显。

具体到张纯如的《被遗忘的大屠杀》，我觉得桂铭网友的话很有分量。他说：“日本电子产品做工精良，可是我仍然买到次品。日本人注重卫生，我还是在饭店的盘子里看到过苍蝇。可是，我并不认为这些影响日本产品精良、仔细卫生的整体声誉。三菱汽车在中国的召回维修服务，远远赶不上他们在美国和日本的服务。但我还是认为，日本的服务很好。我不能因为一两个事件的瑕疵，就下笼统否定结论。”

目前我们能够看到张著的不足，仅仅是她对日本现实的表述偏颇，以及有一张照片的说明有疑点，其余的“种族优越感”只能算观点之争。这些能用来当作整体否定这本书的依据吗？既然我们反对中国人因为几个买春客、几辆故障车妖魔化日本，那么就不应以双重标准来看张纯如的工作，即使要质疑她在史实部份的叙述，也要以亲自查阅到的原始档案为凭，直接使用日本右翼学者书中的举证是不可靠的，也是违反学术研究规范的。

我肯定张纯如为追究历史真相所付出的努力，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她的书中有不全面的地方，只能说明她的研究不够细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和妖魔化日本的逻辑是一样的。我固然反对把情感带入考证，但是任何人都是有情感的，研究者、作家都不会例外，只是有人控制得好，有的人控制得不好。控制不好，不能说是什么罪过。

有些网友以“做假”、“骗子”之类大帽子上纲上线，无益于维系讨论的理性气氛，反而会使你的真话、实话都失去说服力，给那些偏激的人提供反攻的子弹。

至于把张纯如的工作做下去，当然首先是扎扎实实的史学考证工作，在此基础上建立信史，使其成为全人类的集体记忆。我不认为张的一些感性描述主观上有宣扬民族仇恨的倾向，但是认为片面的描写不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日本。不懂日语的张女士关于现实日本的信息来源，很有可能是传媒的片面报道，应该追究这些煽情性的报道（如东史郎案）的责任。

我非常赞赏您的如下论述：即使不是支持反日，对反日的容忍、对妖魔化的谅解，在事实上支持了日本的极右翼，助长了中国威胁论。妖魔化日本，和妖魔化中国一样，就是在鼓吹法西斯，是中国、也是日本今天和明天的危险所在，这样的倾向，决不是因为历史问题作为借口，就可以予以宽容的。

但是我不同意把这些情况归咎于张女士的书。我们不妨调查一下《被遗忘的大屠杀》中文版究竟发行了多少册？仇日反日的积极分子们是否读过《被遗忘的大屠杀》，是否因为读了这本书才对日本有刻骨仇恨。君不见，连有些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锄奸队，根本没有看过张纯如的书，而且也没有去看书的愿望吗？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恩将仇报与作法自毙——丑陋的大陆人之十

芦笛

据 说咱们这个国家是两千年的礼仪之邦，讲究的是“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诗经》上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之句，民间有“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谚语。然而老芦自懂事起，见到的却是：“爱人赠我金项链，回她什麼——赤练蛇。”

中共在历次残民运动中怎样无情整肃那些当年在他们患难时施以援手、甚至救了他们性命的恩人们，请有兴趣的读者去看丁抒先生的《阳谋》。这里只提一例：老毛当年在江西害了恶性疟疾，全靠傅连璋大夫救了命。文革中傅大夫被整到发昏章第十一，上书给伟大领袖，提及当年忠心救主的功劳，跪求赐下丹书铁卷，放他一条生路。可惜“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伟大领袖那为金钟罩铁布衫重重包裹的心胸里，又岂有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容身之处？傅大夫终于饮恨吞声，泪尽以血，凄凄惨惨地死掉了。

个人恩怨且不去说它，这里只说国家大事。当年日寇入侵，为二十多年内战所苦的中国虽奋起抗暴，却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国府打得倾家荡产，王牌师一个接一个覆灭，东南膏腴之地尽失，只剩下地瘠民贫的西南数省。眼看国家灭亡祸不旋踵，幸亏老美出来打抱不平。陈纳德“飞虎队”志愿来华参战，碧血洒在中国的长空。美国政府更向日本先实行部份禁运，后实行全面禁运，解禁的条件是日本撤出中国，恢复“九一八”前的状况，最终导致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人把金钱雨点般洒在中国：他们在西南修下许多飞机场，修下“史迪威公路”，开辟“驼峰航线”，从印度架来输油管，装备训练了数十个中国师，“克林”奶粉、美国金条源源注入中国市场，才好不容易保住了咱们的小半壁河山。

日本行将覆灭，罗斯福不顾丘吉尔的反对，力主扶持中国取代日本形成远东的强国，为此把蒋介石请到开罗去参加“四强会议”，同意在战后归还中国的东北、澎湖、台湾，继任的杜鲁门请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发起筹建，让中国当了具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投降后，杜鲁门派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争端，向蒋介石施压，想让中国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并允诺提供巨额援助帮助中国进行战后的重建。甚至当国府溃败，共军渡江在即，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没有随同苏联大使撤退到广州去，而是冒著危险留在南京，与黄华等高级共干接头，想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只是因为毛悍然决定“一边倒”，决定不急于与西方国家建交，司徒雷登才无限惆怅地怏怏离去。即使如此，美国仍公开表示不援助国府，耐心地等待著与中共建交的时机。如果不是中共派兵入朝，美国也不会与中共为敌。美国之于中国，可谓恩重于山，就是对中共也堪称仁至义尽。

中共一上台却一头扎进民族世仇苏联的怀抱里，与往昔的恩人则不共戴天。“思想

改造运动”，批的是“亲美、崇美、恐美”，凡是受了美国教育的知识分子，哪怕是受了美国留学生如胡适的影响的人，都得跟美国划清莫须有的界线。什麼脏水都泼到了老美的身上，就连个救死扶伤的协和医院都成了揭批对象。六十年代的《羊城晚报》还在揭发该医院的“白衣魔鬼”的罪恶：用过量的X射线照射儿童的头部导致溃烂，用育婴堂的孤儿做活体实验，盗走中国猿人的头骨化石，甚至偷走“国父”孙中山的肝脏……。（遗憾的是，二十多年后当协和医院改回旧名并迫不及待地与美国主子再度勾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起来去追回流失的国宝，包括孙大总统的龙肝凤胆。）

与此同时，老毛却压不住他对斯大林的“恋父情结”。尽管作为一个大国元首，他本人在莫斯科受到的冷遇，在国际外交史上还从无先例，他却不但没有拂袖而去，为国、为民、也为他自己保住一点起码的尊严，反而签下了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为区区一笔高利贷，不惜卖掉中国新疆的矿产资源以及东北的中东铁路和旅顺港。韩战爆发后，明明原来说好由苏联提供空军掩护并提供军火，由中国提供炮灰，事到临头斯大林却赖了帐。为了证明他是斯大林的忠实儿子，老毛硬是下令共军在没有空军掩护之下提著三八大盖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内政上，亲苏、崇苏、恐苏成了国策。全国各地高挂的斯大林画像比毛像还大。“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号召响彻云天，“反苏”成了划“右派”的一条主要标准。毛在中央会议上宣布：凡与苏联专家发生争端，中方要“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中央帝国”的皇帝卑躬屈膝到这个地步，端的是直追石敬瑭。

赫鲁晓夫上台后终止了对华帝国主义政策，放弃了对新疆矿产、中东铁路、旅顺港的特权，给予优厚贷款，派出大批专家援建数十个大型工业项目和工程，以现代化武器装备共军，甚至向中国提供导弹和核武器的绝密。老毛去苏联开会，赫鲁晓夫把他奉为上宾，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中最好的套房里，在各国工人党共产党中享受最高待遇。然而只因为赫鲁晓夫冒犯了他契爷（注：粤语“干爹”）斯大林，老毛就与人家反脸成仇。当赫鲁晓夫为了取悦他提出了成立中苏联合舰队的建议，他却大发雷霆，指控对方意图控制中国，弄得赫氏如堕五里雾中。赫鲁晓夫来华时，老毛竟在游泳池里接待他，以此回报人家在莫斯科对他的盛情款待。弄到最后，在老毛口里，赫鲁晓夫不但成了骗了老马和老列的兽医，还成了饿死数千万中国人民的催命无常。就连被老毛清洗的政敌刘少奇，也要被贴上个“中国赫鲁晓夫”的标签，好让他遗臭万年。

老毛这种以恩报仇、以仇报恩、不受抬举、喜欢虐待的奇怪心理，是心理学家的研究课题，没有老芦置喙的余地。不过这种毛病在大陆人似乎不算罕见。老美给中国的好处，还不只是上文列举的那些。七十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准备对中国进行全面核打击。当时中国是世界“反帝反殖尖兵”，伟大领袖刚刚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零声明”，倾全国之力援助越、寮、柬人民的反美武装斗争。对这样一个结仇数十年的大敌，美国就算不跟著苏联趁火打劫，至少可以作壁上观。然而当苏联试探美国政府的反应时，尼克松却怒气冲冲地拒绝了，声言美国决不会坐视。有美国核力量的吓阻，苏联人才不敢轻举妄动。在中国行将从地图上彻底抹去的千钧一发之际，是老美又一次救了全体中国人的性命。

邓小平实行对外开放后，美国又提供了数量最大的奖学金，接纳了最多的中国学者，为中国培养训练了最多的跨世纪人才和学科带头人。如果说因为中共隐瞒歪曲编造

历史，一般大陆人不知道真相，那麽至少最后这一桩好事是有目共睹的。人家并没有欠中国一分钱，没义务掏自己的腰包为中国培养学者专家，更没有义务为中国的人权问题打抱不平，完全可以象日本人那样一声不吭，埋头发财。

然而慷慨的美国人又一次把热脸贴在中国人的冷屁股上。在大陆人心目中，美国永远是亡我之心不死的那只美帝野心狼。他们在人权问题上找中国政府的岔子，是无事生非，成心给咱们难看，是遏制压迫中国的借口；他们花钱招收中国留学生，是为了组建颠覆中国政府、把中国变成美国殖民地的第五纵队；他们发给学者工作许可、绿卡、甚至护照，是为了给国内的白人找几个种族歧视的对象，省得他们拳头痒痒没事儿干，净找政府的麻烦。中国的事就有那麽奇怪：煽动盲目仇恨的书竟比爱情小说还好卖。几个无知混混胡编出一本《中国可以说“不”》竟能轰动一时，洛阳为之纸贵，到现在“神射手琥”先生还在当圣经引用。

中国当然可以说“不”：可以在三、四十年代接受援助时向陈纳德将军、史迪威将军、魏德迈将军、谢伟思先生说不，可以在签署《开罗宣言》时向罗斯福总统说不，可以在成立联合国时向杜鲁门总统说不，可以在国共谈判时向马歇尔将军说不，可以在大军过江时向司徒雷登大使说不，可以在面临全民核毁灭时向尼克松总统说不，可以向托福、GRE 考试中心说不，可以向美国使领馆签证官员说不，可以向美国移民归化署说不，可以向雇佣自己的美国公司、大学、研究所说不……历史慷慨地给了、并还在给著我们这麽多说“不”的机会，我们却只当机立断地说了两次，真是合九州之铁，不能为此错也！

恩将仇报的对象又何止是美国苏联。想当初六四屠城让全世界的观众大大地开了一番眼界，从此知道世上竟会有某种下流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是专门用来杀自己的老百姓的。犹记某家电视台播放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铁蹄踏踏山河动，帅旗飘飘日月昭，铁流滚滚，所向披靡地驶入长安街的镜头时，解说员向无幸蒙受中华教化的孤陋寡闻的西方夷鬼们耐心地解释道：“这是一场战争，一个政府征服自己的人民；这是一次入侵，一只军队占领自己的首都。”煌煌毛酋业，树立甚宏达。“五”千年的专杀自己人的煌煌华夏文明，总算在全世界的荧屏上大大地露了一回脸，使无知的鬼子们从此记住了“天安门”、“长安街”这些拗口的地名。记得一个蛮女曾问我，长安街是不是“永久和平街”的意思，在得到证实后，她瞪圆了本来就大的蛮眼，半晌才喃喃自语：“真难以置信！真难以置信！这是怎样的讽刺！怎样的黑色幽默啊！”

全世界目瞪口呆之余，一致同意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国际外交史上，道义感又一次压倒了现实利益的考虑。当时的中国可谓内外交困：政治上党内分裂，人民对党满腔仇恨；经济上被陈云的“鸟笼经济”搞得一片凋敝，物价飞涨，更到了外债的还债高峰期；国际上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驻外使馆人员被“敌军围困万千重”，日坐愁城，连门都不敢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幸得港台同胞施以援手。同是华人，同是那口千年酱缸里泡出来的积年黑大头（声明：此处绝无影射非洲美国人之意），屠杀自家同胞在他们已是见惯不惊。任凭风浪起，稳坐港澳台，黑云压城城欲摧，浮尸向洋金元来。西方商人裹足不前之日，便是台商港商趁机抢滩之时。大量的台、港资本趁虚而入，潮水般涌入福建和珠江三角洲，为濒临咽气的大陆经济输血度气，催谷添膘，滋阴壮阳，延年益寿。有了原始资本的驱动，中共才好不容易度过险关，先推动经济起飞，

后又在理财高手朱熔基的调理下成功实现软着陆，使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

病好打太医。台湾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此时不卸磨杀驴，更待何时？台湾凤凰们下下来的那些金子蛋，正好用来买“苏愷”歼击机和驱逐舰收拾他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天道好还，毫厘不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党恩深重，涓滴尽归。

在中国，历史只会不断重复。共产党那一套恩将仇报的把戏不是第一次耍弄了，却每一次都能把人套住。当年大陆上那些“红色资本家”们凭著与各种各样的军阀、国民党、日本人周旋的手腕，以为可以玩共产党于股掌之上。在共党还在啸聚山林之时就慷慨输将，资以大批金钱、西药等等，以为这点恩惠就可以买来日后的平安。等到中共执政，他们才无限痛苦地发现原来共爷并不亚于得了钱还撕票的绑匪，让他们倾家荡产之余还要把“黑六类”的帽子给狠狠扣上，把他们斗个七死八活再交给群众监督改造。老芦看著如今香港那些款爷们跟我党要人眉来眼去，不知怎的常常会替他们捏一把汗。

不用说，作为大陆人，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我当然希望港台商人到大陆投资的越多越好，好让家乡的人民早日脱贫致富；另一方面，我却又免不了对台湾商人今日面临的窘境心怀三分不应有的幸灾乐祸。有时老芦会想起古代的一首民歌，那是一个不听劝阻硬要渡河而被溺死的人的寡妇唱的：

“公无渡河，公终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2000年4月29日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我看张纯如《南京大屠杀》 读天一黑网友的贴子有感

郑若愚

张 纯如女士不幸去世后的一个星期，互联网上爆发了一场颂张和贬张的争论。颂张者，称其为人权斗士，为还原历史真相做出杰出贡献；贬张者责之宣扬仇恨，招摇撞骗。本坛“批林整风运动”如火如荼，众多议论中，窃以为天一黑网友的意见最为中肯，他说：“我想，张也是在感情中极为坚持的人，她可能达心底里对日本人厌恶仇恨。至于这些情绪，对她作品的价值有多大影响，那必须，直接地，指出她文章数据的错误。”

我反对由于张纯如书中的某些错误就硬加上“骗子”罪名的做法，因为再优秀的学者也有出错的时候；也反对把质疑张纯如的某些措辞和观点等同于“与日本右翼一鼻孔出气”，反对“谁敢质疑张纯如就打倒谁”的党同伐异，因为任何学说只有经得起质疑，才能确立其历史地位。

无奈，要令人信服地指出张女士书中有关史实数据的错误，除非是专业研究者，掌握有来自第三者的原始资料，可惜对大多数华人（包括我自己）来说，南京大屠杀更大的意义上是个“符号”，是被压迫民族屈辱历史的象征，而“倒底是怎么回事”好像并不重要，真正不重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恰恰是中国人自身，因而在网上的诸多议论中，也就少见从纯学术的角度，而不是从自身的经历和好恶对张纯如的著作进行评价的声音。

也正因为中国人在传统上对个体生命消逝的冷漠，才会出现中国人多年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回击日本右翼，只能空喊“东京大屠杀”来解气的尴尬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纯如写出《南京大屠杀》，无论有多少值得商榷之处，至少告诉世界，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华人）都对个体生命的无辜死亡无动于衷。

张纯如在书中流露出的仇恨情绪，来自战争中的日军之所作所为。这种仇恨如果仅针对日本的暴行本身，不要说中国人怀有共鸣，就是正直善良的日本人都能够理解。但遗憾的是在关于日本现状的描写中，张纯如显然仅仅凭借一些间接的资料，甚至借助自己的想象来补充没有进行田野工作的缺陷，出现数处瑕疵。对当代日本缺乏了解的读者当然很难觉察，但是生活在日本的网友就立即感到某些描述与日本的实际出入甚多，这即使不是造假，也是应该指出的错误，因为这些错误客观上影响了整个作品的公信力。难道中国人出的问题中国人不去纠正，还要文过饰非，等着日本右翼来看笑话不成吗？

在指出张纯如的几处有违事实的记述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日本的教科书制度。日本中学教科书没有统一教材，而是由七家（2000年以后才增加由右翼学者操控的扶桑社，增加到八家）出版社组织学者班子自行编写，然后由文部省审批。各学校使用哪

个版本，由各校自行决定。除扶桑社以外的教科书是怎样谈到南京大屠杀的呢？

这七个版本的教科书都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

其中，东京书籍出版社的记述为“日军占领首都南京，当时有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约20万中国人遭到杀害（南京大屠杀）。”

教育出版社配上图片，写着“日军占领上海和中国首都南京，很多中国民众被夺去生命，生活遭到破坏，占领南京时，日军大量屠杀俘虏、放下武器的士兵以及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居民，进行了掠夺和暴行。”该书栏外注明“一般认为该事件的牺牲者为二十万人，但是中国方面认为包括阵亡者在内有三十万人以上。另外，1941年起，日军对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作战。日军的行径遭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但是日本国民直到战败才第一次知道这样的事实。

关于南京大屠杀死亡者：

七家出版社都写到“一般市民遭到杀害”或“俘虏和一般市民遭到杀害”。

关于死亡者人数：

大阪书籍、清水书院、教育出版、日本文教出版四家出版社：“十数万人，中国称三十万人”。

东京书籍、日本书籍：“二十万人”。

帝国书院：无人数。

三光作战：大阪书籍、日本书籍、清水书院、教育出版、日本文教五社。

从这个情况来看，如果张纯如原著的意思像云儿网友说的那样，意为“1982年以后，日本人再也不能在教科书中忽略南京大屠杀了，改而在死难者人数上作种种限制。”，是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如果真要证明“日本人有系统地将南京大屠杀的材料剔除出教科书，达几十年。”，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却不能言之成理，我的看法是，正是由于将南京大屠杀从课本中删去有困难，日本官方才默许右翼教科书出笼，让它把其他的教科书“平衡掉”。另外，铁木网友指出purge就是“清除得一干二净”，本人英文修养欠佳，不作评论，如果确实如此，张的论述则是违背事实的。

下面我还要谈一谈在日本谈论和研究南京大屠杀是否危险，是否面临恐怖威胁的问题。

张纯如在该书第十章中说：“他们（指日本人一笔者注）从博物馆拿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销毁原始的资料，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痕迹。”

我不知张女士指的是哪一家博物馆。日本的战争博物馆不多，除了靖国神社的游就馆完全为军国主义张目，不必去说以外，所谓宣扬“被害者意识”的广岛、长崎原爆资料馆和冲绳战资料馆都有关于日本加害责任的展板，其中就有南京大屠杀的内容。

至于“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痕迹”，也是言过其实的论述。现举几例：

一、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所写《中国之旅》（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一共发行了一百万册，这在一亿人口的国家是什么数字？即使是右倾化的今天，该书还在日本的

书店出售，没有任何人去禁止。

二、数年前一名日本中学生前往南京调查，与遇害者遗属对话，将此内容写成演讲稿，还入围日本放送协会的全国青年演讲比赛优秀奖。

三、日本电视台播放的所有有关二战的历史纪录片或人物传记片，都没有回避南京大屠杀。

四、日本战败纪念日的专题片里，时常出现连线南京的现场报道，主持人曾谈到“几十年前日军曾经在该地屠杀中国平民”。

五、非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论著（张女士的除外）可以在日本发行，律师可以举行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听证会，南京大屠杀当时担任日本外务省东亚司司长的石射猪太郎的日记，曾记述了帝国军人的暴行，也在日本公开出版，并被当成证实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

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九四年昭和天皇之胞弟三笠宫崇仁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亲自证实南京大屠杀以及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侵华战争时担任过中国战区参谋官的三笠宫对右翼在南京死亡人数上做文章表示不以为然，质问“那不是屠杀，请问什么才叫屠杀”？并证实“日军以刺杀活人来训练新兵”、给新兵看满洲以毒气杀中国人的电影画面等。读卖新闻还是日本比较偏右的报章，左倾的朝日新闻等报章杂志上此类报道就更多了。

张纯如说：“在日本，表达个人关于中日战争的观点，可能危及事业前途甚至生命”，她举出了长崎前市长本岛等（非本岛均）的例子。

遗憾的是，无论是张纯如还是云儿，都没搞清本岛遇袭的真实原因，不是因为他表达了对中日战争的观点，而是触犯了日本战后最大禁忌：评论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前文提到的本多胜一也是由于在裕仁热丧期间公开表明“不敬”，右翼竟然找到本多儿子就读的学校，恐吓其子。

禁止谈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固然不是直面历史的态度，但是却不等于日本人一谈到中日战争的观点，就会倒霉。既然本岛是政治家，那么我还可以举两个政治家的例子。

自民党元老野中广务曾于担任自民党干事长代理的1998年5月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献花圈，哀悼死难者。他不但没有因这一举动丢官或遇袭，反而两个月后升任自民党干事长和内阁官房长官。

民主党党魁菅直人也曾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献花，也没有丢官或遇袭，选举时依然高票当选。

单从举动来看，这二人比本岛等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战争观，为什么没有受到任何迫害？不知对这些，云儿网友该做何种解释？

张在她的书中还说，日本学术界很少有人研究南京的暴行。有人说，此事过去时间并非久远，还不值得去进行历史研究或是让历史学家去评判日本的错误。”“在日本，对南京暴行进行严肃的研究，基本上是由那些在传统的学术界之外的人进行的，比如自由撰稿人和记者等等。”

说实在，张纯如真正使我感到讶异的便是这两段话。一般来说，学者或是新闻工作

者在研究或报道某一历史问题时，最先做的事就是详尽了解先行研究的情况。张不懂日语，没到过日本，对日本现状有些误解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一个受过西方新闻训练的作家对先行研究的无知到此种地步，不免令人哑舌。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日本的南京大屠杀研究。

日本的南京大屠杀研究确如张女士所言，有两个对立的流派“承认派”和“否认派”。“否认派”在华人世界知名度甚高，暂且不提。我想谈的是以洞富雄为代表的“承认派”。这一派别的主要人物有：

洞富雄，早稻田大学教授，已故。

藤原彰一桥大学教授，已故。

本多胜一，朝日新闻资深记者。

江口圭一，爱知大学教授，已故。

吉田裕，一桥大学教授。

姬田光义，中央大学教授

石岛纪之，菲利斯女学院大学教授。

笠原十九司，都留文科大学教授

此中除本多胜一是新闻界人士以外，其余都是科班学院派出身的学者，不知张女士“由学术界以外的人进行”之说从何而来？“很少有人进行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很少”是什么概念？中国史学界拿得出这么长的名单和如此多的专业论著吗？

以下是该派别主要的著作（因篇幅所限，只列单著）

『中国の旅』本多勝一□朝日新聞社(朝日文庫)□1981年

『南京への道』本多勝一□朝日新聞社(朝日文庫)□1989年

『本多勝一集(23)南京大虐殺』本多勝一□朝日新聞社□1997年※『南京への道』増補版

『殺す側の論理』本多勝一□朝日文庫(山本七平VS本多勝一の論争)

『日中全面戦争』藤原彰□小学館

『南京の日本軍—南京大虐殺とその背景』藤原彰□大月書店□1997年

『南京大虐殺を記録した皇軍兵士たち』本多勝一□藤原彰

『決定版□南京大虐殺』洞富雄

『「まぼろし」化工作批判:南京大虐殺』洞富雄

『近代戦史の謎』洞富雄

『南京大虐殺の証明』洞富雄□朝日新聞社□1986年

『近現代史の真実は何か』洞富雄

『南京事件』笠原十九司□1997年□岩波書店□岩波新書※偽寫真で初版が回収

- 『南京難民区の百日、虐殺を見た外国人』笠原十九司□岩波書店□1995年
- 『南京事件と三光作戦—未来に生かす戦争の記憶』笠原十九司□大月書店□1999年
- 『アジアの中の日本軍—戦争責任と歴史学□歴史教育』笠原十九司□大月書店□1994年
- 『天皇の軍隊と南京事件』吉田裕□青木書店□1986年
- 『現代歴史学と戦争責任』吉田裕□青木書店□1997年
- 『中国人戦争被害者の証言』松尾章一編□皓星社□1998年
- 『中国人戦争被害者と戦後補償』松尾章一□岩波ブックレット□1998年
- 『わが南京プラトーン』〔新装版〕東史郎□青木書店□1996年
- 『天皇の軍隊』熊沢京次郎
- 『人民の沈黙』松井やより
- 『南京□広島□アウシュビッツ』黒田秀俊
- 『日中15年戦争』黒羽清隆□教育社□全3巻
- 『目撃者の南京事件、発見されたマギー牧師の日記』滝谷二郎□三交社□1992年
- 『南京虐殺と日本軍、幕府山の中国人捕虜殺害事件の真相』渡部寛□明石書店□1997年
- 『南京大虐殺と日本人の精神構造』津田道夫□社会評論社□1995年
- 『旅順虐殺事件』井上晴樹□筑摩書房□1995年
- 『戦略爆撃の思想』前田哲男□朝日新聞社□1988年
- 『日中戦争の悲劇』馬振犢□陳仲丹□林慧敏編著藤尾直正□藤尾玲子訳柳原書店(1996年)
- 『戦争と罪責』野田正彰□岩波書店□1998年
- 『わたしの見た南京事件』奥宮正武□P H P 研究所

我不知道张女士眼里什么才是严肃的研究，不知这一长串书目算不算严肃的研究？张女士的书中蜻蜓点水地谈到洞富雄、本多胜一和笠原十九司的研究，但是显然她对日本学者为证实南京大屠杀所作的努力知之甚少。

我还要说明的是，以上这些怀着人道情怀几十年进行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日本学者，并没有因他们的观点受到失业的威胁，七旬以上的都是以名誉教授身份荣退，仍在执教的没有像炮轰中宣部的北大教授焦国标那样被赶下讲坛，新闻界的本多胜一后来升任朝日新闻编辑委员，并没有像马立诚那样为了几句“对日新思维”弄得丢掉人民日报的饭碗。日本是一个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社会，同一个东京大学，有藤冈信胜那样以篡改历史为己任的教授，也有高桥哲哉那样为慰安妇鸣不平的教授；同一个京都大学，有中西辉政那样靠中国威胁论混饭的教授，也有坚持“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井上清教授。

写到这里，我依然愿意认为，张女士误读日本的现实情况是可以谅解的，因为她如

果接触的是大量经过筛选过滤的信息，自然会产生不够客观的看法。

其实，日本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论著，早已在中国翻译出版。1985年洞富雄的《南京大屠杀》就在中国付梓，2001年本多胜一的《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也有了中译本。这两人支持“三十万人之说”，可以说是中国超越国界的友人，但是在中国这两人的知名度却远远比不上东史郎。个中原因，还待各位网友去解读。

关于东史郎案，多数华人将其解读为“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典型事件。但案件的原貌是什么呢？东史郎的老战友桥本认为东史郎在书中影射他，认为东史郎捏造了桥本其人杀害中国人的情节，才把东史郎告上法庭。不管桥本是否犯下过暴行，从逻辑上也可看出，法官要判决的不是南京大屠杀是否属实，而是东史郎是否构成对桥本的名誉损害。举例而言，甲在书中说乙文革中打死老师，被乙告上法庭，法庭需要判决的是乙是否真的打死过老师，而不是文革是否一场灾难。

然而中国传媒却没有涉及东案的细节，大而化之说东史郎由于揭露南京大屠杀被告上法庭，那么谁能解释得了，法庭在明确“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的同时判决东史郎败诉是怎么回事呢？把一场民事案泛政治化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这样偏离事实的煽情能使我们离历史的正义更近吗？

最后我想引用konami网友的话作为结束语：仇恨不都是煽动起来的，但是仇恨很容易被煽动起来。其实残酷不是日本人的专利。但残酷伴随战争。作为历史学家，新闻记者等文化人，保留历史的面目，记述历史的教训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即，不让悲剧重演！如果仅仅是为了牢记阶级仇民族恨，并且在揭开这个盖子时，为了渲染气氛，连自己不确实的照片和证据都肯引用，这种心态就很让人不安。由民族仇恨引发战争是可怕的。我觉得在日网友对这一点的担忧，应该被理解，也是无可指责的。”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成败之鉴党国要人志中共首脑 4】 陈独秀特辑 1

HGC

【 编者按】

知人最难，论人则更不易。

论陈独秀之难，难就难在分析这个人的思想客观方面要求论者需要有相当的国学或汉学基础——这正如后之来者分析晚清廖平、康有为辈的政治见解，如于所谓公羊学及清代公羊学无必要了解，仅以若干文章“就事论事”，其谬难免。

西元20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及海外所谓“陈独秀专家”、“党史专家”固多矣，惜国学基础不备者也比比。

近者如高华，即一例。高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一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相关主题研究，自有其重要地位，然于品评中共人物之学识，则水准两样，徒见轻率，不值一噓之处不知凡几。举其著者，如高书增订本第346页：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得到全党公认的首屈一指的学问大家。毛泽东具有党内无人企及的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云云。

大凡对国学有基本了解而熟知中共历任首脑著述情况者，当不会轻率若此——不论是以现在的国学研究标准，还是以更早的国学研究标准，迄今为止的中共历任首脑里，以文章为证，真正“具有党内无人企及的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惟陈独秀而已！以是观之，则所谓“专家”如高华（也许是高教授的研究实在太专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尚不免信口雌黄若此，闲云野鹤如我辈又岂能不慎言于外？

无视陈独秀学养者之外，自然亦有识陈独秀之国学长才者。然识与不识，大凡论陈独秀者——不论是南京政府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总惯于结合“书生”之类词汇加以品评，如：

“綜觀陳氏一生，在民國九年以前，無論與國民黨早期人物併肩作戰，反清反軍閥；或與當時知識份子結合倡導新文化，均未超出「書生論政」的範圍，也可以說是古老中國在新舊思潮衝激之下，愛國憂時的知識份子的一種典型。”（《传记文学》杂志总第180期杂志编者《關於「陳獨秀先生座談會」的幾句話》）

似乎陈独秀这位“书生”、“学者”长于谈而短于行，则又不免失之轻率。比较而言，张国焘对于陈独秀的历史评价倒庶几近于平心之论：

“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始创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的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

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精髓。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一九一九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去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发自觉的挺身而出。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虽以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他似未加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不是个特出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

[以上引文原有张国焘自注两处，因无关宏旨，从略。]

“陈先生最注重如何展开各项实际工作。他素来不尚空谈，说干就干，”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我的回忆》第二篇）

可惜这位张特立同学后来未能承继中共大统，否则后之中共党史文宣于陈独秀之评价则或不同于一传至今之中共主流观点（这与比毛泽东影响中共党史文宣更长的周恩来等人有莫大关系）。

张国焘所及，而为专家中的浅学者流及我辈不学者流易于忽视的事实就是：

在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员里，实际政治经验最丰富的人只有陈独秀——满清末造，当陈独秀开始从事反政府的活动时，毛泽东、周恩来辈尚在学习以汉字作文。

固然，没有陈独秀，苏俄及共产国际早晚也还是会在当时的中华民国设立他们的分支机构；但没有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组织则根本不会在当时中国南北有如此迅速的发展，与此相关的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就是：

陈独秀早年的反清政治活动和民初的政治文宣经验，使他具有其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不具备的超越地域的广泛人脉关系，没有陈独秀的广泛人脉关系，共产党在中国主要的发达地区从北京到广东的发展是非常困难的（i.e. 中国共产党能在广东发展组织与扩大影响，并非本自孙中山后来的某些策略，而是首先得到了广东地方实力派陈炯明的大力支持）。

要之，陈独秀于中国共产党城市时期发展的影响，实几与朱德于局促江西一隅的中共武装发展的影响相仿佛，皆为举足轻重，无之，则中共难成大局。

为使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陈独秀、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及中华民国历史于一斑，我等特编选了此一陈独秀特辑以为有心人参考。选录内容包括：

中国共产党是谁的事业？从陈独秀书简看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

莫纪彭：我与陈独秀的交往

袁同畴：与陈独秀早年的一些接触

王觉源：我所认识的陈独秀先生

任卓宣：我与陈独秀先生

尉素秋：我对陈独秀先生的印象

蒋梦麟：我与陈独秀

陶希圣：关于独秀的三段事

记独秀

毛子水：陈先生的文字学著作与最后的政治见解（外一种）

郑学稼：陈独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

附录一种：

中华民国公民知情权管窥：以国民政府庭审通缉犯陈独秀的若干历史事实为中心（内含庭审问对）

其中，除陈独秀书简、莫纪彭、蒋梦麟文为HGC特别提供外，其他内容则选自《传记文学》总第180号「陳獨秀先生座談會」专题内容（凡不注明出处者，皆属之）及总第28、29、181号电子文本。

凡HGC“罕见奇谈”及“独立评论”读者专门提供的全球中文虚拟社区首发内容（以主要繁简体搜索软件搜索结果为准），若欲转载，请注明出处并参考HGC关于发布内容版权的声明。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赵紫阳一怒斩刁民》

燕南人

河津市地处山西省西南，位于黄河、汾河的交汇处，“商王迁都于耿”，指的就是这里。西周时为耿国，春秋时是魏国的皮氏邑，秦汉称皮氏县，北魏太平真君七年改为龙门县，北宋宣和二年改称河津县，九四年上升为县级市。

河津虽北靠吕梁、龙门二山，然大部分地区是海拔以下低洼平原，由于汾河的连年泛滥，大水冲刷，这里的农田都变成了盐碱湿地，十年九涝，河津的百姓除了卖儿卖女向陕西、河南逃难以外没有别的活路，男人也只有去吃粮当兵或许还能捡条命回来。

王宝钏的那间破瓦寒窑，如今还在薛仁贵的故里——河津县城东修仁村耸立，薛仁贵去当兵，王宝钏讨吃要饭一十八年，这个故事大概就是河津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

共产党来了以后，河津人民的生活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它仍然是全国甚至是山西省最穷的贫困县之一，半年糠，半年粮，顾了儿女就顾不上爹娘……。几十年来，这里的老百姓还没有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

河津的土地虽然低洼、贫瘠，然而地下的宝藏却异常丰富，经国家勘探，这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优质煤炭和数十亿吨铝土矿，再加上黄河、汾河丰富的水利资源，1973年中央决定在河津建设一个亚洲最大的氧化铝基地——山西铝厂！

经过十一年的筹备，84年决定打第一桩！赵紫阳总理将亲自参加开工典礼。山西省政府便组织本省大、中、小铝厂赴河津观礼。

等我们到了河津以后，开工典礼的日期一拖再拖，一改再改。总理办公室来电寻问：“什么原因”？山西省政府和基建指挥部只好如实汇报；本地村民冲击指挥部，冲击会场，冲击建筑工地，哄抢建设物资，捣毁重要设备，疯狂地进行打砸抢，已打伤政府官员，公安干警，建设工人多名，事态还再扩大，所有工作都无法进行。

山西铝厂是国家“六五”“七五”“八五”的重点项目，总投资五十多亿元，引进了九个国家、30多家外国公司的先进设备，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制止事态的发展，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赵紫阳总理于84年6月17日（准确时间已记不太清）乘直升飞机亲自赶到了河津。

赵总理就在停机的野地里听取了省政府和指挥部的汇报：“自72年至84年在筹建山西铝厂的11年间，省政府和指挥部用了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和精力购买这几百亩土地，我们早已经向他们支付了购买土地的费用，价钱还是高出了国家规定的几倍。然而这些土地由粮田变成了麦田，麦田又变成了稻田，现在稻田又变成了林场和坟地。按照国家规定，林场的一棵树要按二十年以后木材的钱付款，迁移一个坟墓的款项就高达万元，这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敲诈，请总理去看看他们的林场和坟地”。

赵总理便亲自来到了“林场”，这里的树，种的比麦子还密，赵总理一拔一个干树枝，一拔一个干树枝，都是昨天刚插上的。坟地里的坟头还真不少，刨开了，没一坟头里有棺材。

赵总理回头问：“部队的同志来了”？山西驻军首长马上跑步向前：“报告总理，63军军长奉命赶到”！“你马上给我派一个团来，保护铝厂的建设，再有敢冲击工地的，该抓的抓，该捕的捕，对武力抗拒者坚决镇压”！“是”！

军令如山！解放军可不是公安局，有三个拿铁棍想反抗的老乡被当场击毙，同时逮捕了几十个人，分别以抢劫、盗窃、行凶等罪判处重刑。这才确保山西铝厂打下了第一桩并顺利建成投产。

二十年过去了，现在山西铝厂年产值一百多亿元，上交税务二十多亿元，河津电厂、王家岭煤矿等一大批企业在河津落户安家，昔日贫穷落后的河津县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之一，农民人均收入四千多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七千多元，是山西省有名的富裕县，小康县，不少农民盖起了洋楼、别墅，一辆辆豪华的小汽车也开进了农家大院。

山西铝厂是河津人民的摇钱树，是河津人民的聚宝盆，是河津人民的光荣与骄傲！

如果当年赵紫阳总理不敢用三个刁民的血来促成山西铝厂的建设，那么今日河津人民还是在贫瘠的土地上靠天吃饭，半年糠，半年粮，顾了儿女就顾不上爹娘……。

从山西河津我想起了四川万州、汉源……，从山西铝厂我想起了三峡大霸……，仁者呼？智者呼？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百年後评说邓小平

钟不悔

8 月22日，邓小平诞辰百年，中国大陆、港澳、海外各种媒体华文一齐上阵，纪念会、诗歌、电视剧、铜像、纪录片、晚会、朝圣等等不拘一格，从中央到地方，举国上下争先恐后，其火爆前所未有的。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更在纪念大会上两次用“伟大领袖”赞美邓小平，将邓小平抬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将这场举国闹剧推到了最高潮。

胡锦涛大有盖棺定论之势地说，邓小平“充分展现了一位伟大领袖的崇高品德”，“中国各族人民为拥有邓小平同志这样伟大的领袖，感到无上光荣和无比自豪。”这是继毛泽东之后，中国重新用“伟大领袖”来称呼它的领导人。笔者认为，“伟大领袖”曾经只属于毛泽东的“专利”，那是个人崇拜的时代产物，是毛生前身后的“专利”，邓小平在世之时也从未敢想过。胡锦涛今日在邓小平离世多年後动用毛泽东的“专利”，除有对邓小平改革开放导致中共权贵後代先富起来的感恩心情，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政治动员，利用死人制约活人（江泽民）的用心昭然若揭。毫无疑问，今次重祭邓小平这面大旗，第一个得益的，是九月下旬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的胡锦涛。

邓小平评价毛泽东是三七开，评价自己是五五开，无论是三七还是五五，这举国上下的“怀念”都只是为了丰功伟绩的七或五，那么另外的三或五呢？笔者到想在这里罗嗦几句。

评价毛泽东容易，因为他带给中国和她的人民除了虚幻的强大感之外，就是从“反右”到“文革”那些没完没了的穷折腾。说他是中国希特勒、斯大林，当代秦始皇绝对是当之无愧，那几位也只不过比毛泽东早成名了几年而已，若论所作所为，这几位过气人物在毛泽东面前绝对也是要自叹不如、甘拜下风之处。事实上他老人家自己都以此为荣，他以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气吞山河的口气告诉全世界：“秦始皇‘焚书坑儒’算什么，我们杀了几十万，比他多得多。”而其鲜颜寡耻的水平，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了。

由於不象毛泽东那样长期处于领导地位，所以谨言慎行是邓小平在共产党的惨烈内斗中生存下来的必要手段。因此，只有他生命中最后十几年才是一个真正的邓小平。那么怎么评价这个真正的邓小平呢？

1. 实用主义的猫论

“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是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不信神、不信天、不信别人、也不信共产主义，只相信权力，只。也只有象他这样的人，才可能把1976年的中国带出毛泽东疯狂的“不断革命”的深渊。他绝对不会象天马行空的毛泽东那样搞“大跃进”这种荒谬透顶的事情，而会脚踏实地地干事。任何意见和建议，只有对他有用，不威胁他的权力，他都可能接受。但

其副作用是：作为实用主义者，他没有信仰，唯一奉信的就是“只要达到目的，可以无所不为，可以不择手段、不顾廉耻、不惜代价”，邓小平从政几十年中的所作所为，无不体现了他的这种流氓地痞哲学。可以说，当今中国社会道德败坏，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就是源头。

2. 双重标准，永远不认错。

我们都不必追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前期与后期的言行不一。就是在同一时期，他也是言行不一的。为了达到他的目标，他绝对会理直气壮地作假说谎。“取消干部终身制”就是他搞双重标准的典范。让他比年轻人退，自己不退。在平反冤假错案时，毛泽东搞得案子几乎全部被平反了，除了反右和“高饶”事件，两者的专案组长恰好都是邓小平，难道这是巧合？虽然邓小平在公开场合表示他的功过可以“五五”开，但我们从来也没用听到过他为任何具体事件认错。这—就是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最后一位强人，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是经济改革、政治专制、枪指挥国家和垂帘听政。这些已经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3. 没有目标的摸论

目标决定了实用主义者的言行。邓小平的目标是什么呢？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只要不丢江山。这种无目标性使得改革开放走上邪路，中共体制性的腐败邓小平也是始作俑者。他只推行经济改革而停止政治改革，导致改革无法深入，腐败蔓延全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是他的儿女运用权势先富起来，上行下效，形成全国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严重阻碍改革的继续发展；第叁，1986年打老虎胡耀邦得不到邓小平的支持，结果自己被老虎打下来，1989年学生反官倒，结果被邓小平残酷镇压，邓小平成了政治改革的绊脚石与贪污腐化的保护伞。以后的政治改革就长期停滞，有任何动静都被视为“动乱”的萌芽状态而被“消灭”。反腐败则成了打击异己、保护自己的工具。这样做的结果就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加剧，金融黑洞加深，中共用以自保的“民族主义”也日益不受掌控而刺向自己。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疏导与解决，将动摇乃至摧垮中共的统治。

4. 违宪操作，视权如命

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最聪明的人之一，邓小平当然明白民主和法制对实行“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所以他一上台就大力鼓吹民主和法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就是当年邓小平的原话。可是言犹在耳，邓小平就开始镇压民主运动了，并把民主和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以支持他行动的正当性。原因无它，只是因为一介平民魏京生在西单贴了“五个现代化”和警惕邓小平独裁的几张大字报。新的宪法刚刚出炉，邓小平就开始赋烦依法治国了，因为那样“影响工作效率”。无论是取消“四大”和罢工自由，还是“严打”，他都是先执行后修法，违法操作。把这些片段串起来。邓小平的目标也就明确了—那就是“权力”才是他最高目标。请看：高喊“取消终身制”的邓小平却公然在宪法中将军委主席写成唯一一个没有任期限限制的高级职务；在党章中取消了“军委主席必须由常委担任”的规定以达到其退而不休的目标。打倒他自己的嫡系胡耀邦和赵紫阳，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功高震主。而“到杨”就完全是为了权力，前一天杨尚昆兄弟还在为他“保驾护航”，十四大上邓

小平就突然袭击将他们赶出了权力中心。杨尚昆这才明白邓小平“南巡”是一箭双

雕，即打击了陈云在党内的影响力，又赶走了权力急剧膨胀的杨氏兄弟，保证了邓小平在党内权力中心的地位。至于江泽民，当时的邓小平根本只把他当没用的儿皇帝，没有放在心上。

5. 思想反动，历史罪人

所谓改革开放，与其说成绩显著，不如说中国被毛泽东、中共破坏得太利害，中共自己都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实际上，邓小平生平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及维护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权。《人民日报》社论引述民间言论说：「翻身不忘毛泽东，致富不忘邓小平」，前一句正确的解读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後一句的解读是拱与维护政权。说「致富」，恐怕邓小平主政後带来的只是贫富悬殊中的「少数人富起来」。邓的改善经济的措施只不过恢复中共执政前的开放和自由经济政策，把毛泽东政策导致的「经济崩溃边缘」挽救回来。归根结底，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共政权。

1989年六四，邓小平镇压学运，造成震惊中外的流血事件，开历史倒车，维护中共统治不惜与人民为敌。在这一血腥过程中，邓小平输掉了三起三落的美名，蒙受了滔滔如江河的骂声。这骂声促使他在1992年发起了第二轮经济改革，但至死不进行政治改革，因为他知道政治改革是一条亡党之路。

一个不是民主制度的专制的国家，皇帝的思想决定了国家的命运。十几年前有人评价毛泽东是：“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罪人”。本人为邓小平盖棺定论：“经济改革有功，政治改革无能，‘六、四’罪人。”屠杀人民已经是罪不可赦，而背离世界潮流、悞误政治改革，更是祸国殃民，后患无穷。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一）

鲁肃

说 起现代民主，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十七、十八世纪发生在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那么这一运动到底是被什么基本信念和思潮支持着，发展出什么新的认识，在哲学、神学、政治思想方面有哪些结果，这些结果之间有什么共同和不同呢？鲁肃不才，但也有点滴心得，写下来就教方家。

前言.

宗教改革的标志是1517年，那年路德在威登堡帖上了他的九十五条，尽管这以前就已经有很多发生在欧洲各地的类似先驱。直到十七世纪中叶，这一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不仅改变了欧洲的模样，也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历史。启蒙运动就是紧接着发生的。

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理性觉醒运动，通常被称为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教改运动之前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使欧洲全面忘记了那先前曾经有过的辉煌精神文明：使徒时代的基督教、希腊的人文理性和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教改运动完成了第一项归真，恢复了基督教的本来面目，褪去了罗马对基督教的异化。而启蒙运动则肩负起了第二项历史任务，继承希腊的理性主义，并发扬光大。第三项历史使命完成的标志，则是美国革命，和在新大陆的现代民主体制的建立，并且是和前两项密切相关的。有趣的是，败也萧何，成也萧何，中世纪由原先野蛮的现代欧洲人的祖先带来，扫荡了古代欧洲文明，但也是他们这些野蛮人的后裔，重新发现了那些文明的各方面，结合本民族的性格，从古代文明的种子，竟结交培育出从来未有的参天大树：现代文明。

启蒙运动是对这一理性复兴的外在的表述性称谓，它的根本思想是基于一种先验的信念，那就是：人具有理性，自然也具有理性，人的理性来源于自然的理性，人可以运用人自己的理性，经过正确的推导，找到真正的关于自然理性的知识，达到对包括人的思想在内的正确认识，而这些知识和认识不仅仅能够达到，也必将给人类带来幸福。

象教改运动的对象是异化了的基督教——罗马天主教一样，理性运动，即启蒙运动，要推翻的传统认识是：人是极端渺小、愚蠢、罪恶深重和不可救药的。人应该也只好忍受一切不幸，活着的唯一目的是等待最后的判决，并为了尽可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要盲目听从主教的教导以期得到帮助。人没有自己发现知识的可能，更谈不上对真理的认识了。

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是对人类理智的坚定信心，并且身体力行地开始运用人类的思维能力，积极思索了人可能得到正确知识和自身认识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也在辨析着理性自身可能的局限，而这种辨析本身也是以理性为标志，不借助外来的神力。尽管方法和结论在各个思想流派之间存在差异，但除了上面的共通点以外，还有一个继承与

希腊的共通之处是：世界自身的理性表现在其和谐、简洁和逻辑，这些不仅仅是自然的表面属性，甚至也不仅仅是根本属性，它就是自然。所谓追求对自然的理解、对自身的认识，不是搜集细小繁多和有用的具体知识，而是发现那背后的支配，而那支配，则是和谐简洁的逻辑。这一认识过程，就是达到或逼近理性之光的过程。理性之光只有唯一光源，它不是馄饨的，是有着极性的细小，但却是灿烂和无所不包的。使理性的光辉通透自我，通过自身的理性达到对自然理性的认识，不仅是人精神生活的意义，也会带来必然的好处。

然而这一切将会或应该如何发生呢，在启蒙运动的各思想家之间并不完全相同，他们在探讨这些问题过程中，表现了人类的智慧，即使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依然不仅是非常有趣，而且是极发人深省的。（如果把对这一运动的书本知识作为学问，甚至用来卖弄，则恐怕不光是好笑）

[待续]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阿拉法特之死

芦笛

最近阿拉法特去世，在全球新闻网上都成了热点，唯独咱们这个论坛反应冷淡，只有个别积极分子欢呼了几声“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可见此人在国人心中，充其量也就是个“零印象”。

这也不奇怪，老阿在国人心中，从来就是个恐怖分子，这也不假。他不说是恐怖主义的发明人，起码也把恐怖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最“辉煌”的代表作，便是70年代在西德奥运村劫持杀害以色列运动员，首次震惊文明世界。

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同时又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一个恐怖活动的祖师爷竟然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光这奇特吊诡的事实就足以让他永垂史册了。

之所以如此，是老阿并不是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恐怖分子，知道该在何时何处止步。

而这就是他和一般恐怖分子的区别：那些人是以恐怖活动当成政治斗争的唯一手段，而他只把恐怖活动当成争得谈判桌的手段。正因为他有这点见识，才会在90年代终于如愿以偿，争到了和以色列谈判的可能，并因签署和平协议，不但使PLO成了合法组织，使“巴勒斯坦共和国”的民族梦想首次有了现实可能，自己也成了其胚胎的首届民选总统，而且为此获得了诺奖。

也正是因为这点政治智慧，他才在911事件发生后立刻出来谴责幕后策划者，当此群疑满腹之时成功地洗刷了自己的嫌疑，为PLO的公关形像争来了漂亮的一分。

当然他的政治智慧也有局限，最大的错误就是拒绝签署以色列在美国压力下提出的和平计划。该计划同意交还80%的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后非法侵占的巴勒斯坦土地。此后以色列首相拉宾被刺，保守党上台，便再没这种好事了。如今以色列正在非法侵占的土地上大建移民村，看来以后要想让以色列再提出这种优惠的offer是再也没希望了。

不管怎样，客观地说，老阿应该说是巴勒斯坦的民族英雄。从该民族的角度来看，是他第一次把巴勒斯坦共和国的梦想初步变成了现实。如果不是他毕生的努力，恐怕世人连“巴勒斯坦问题”的概念都没有，而无数被驱赶出世代居住的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只能在舆论视线之外默默受难，默默死去。

令人深思的是，这种历史性民族功绩却是通过为文明人一致不齿的恐怖活动取得的！光这事实本身，就让人深思世上的“是”、“非”观念是何等地经不住推敲。

我已经说过，实验科学研究中常用的确定因果关系的手段之一，就是把那个因素除去。咱们不妨想像一下：如果没有PLO几十年如一日的恐怖活动，会有后来的停火协议

和巴勒斯坦国么？Never！

这个道理应该是成年人都能明白的：“爱哭的孩子有糖吃。”老阿正是因为参透了这一点，才把自己的民族事业从原来为世人一致漠视忽略，变为全世界瞩目的中心。恐怖活动其实是他争取世界舆论重视、唤起舆论压力、迫使对方接受自己为对等的谈判代表、承认巴勒斯坦确实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有效手段。一言以蔽之，恐怖活动就是他争“糖”的“哭”。

我知道这一定会引来积极分子的疾风暴雨。那请问，到底您为何痛恨恐怖活动？无非是因为那是滥杀无辜平民的下贱勾当，对伐？有本事冲人家的军队去，是不是？这点我完全同意，9 1 1 事件刚发生时我就是为此与思云大战的。所以，我和大家在这点上并无分歧。

有分歧的是老芦看的略比大众远一些，想的稍比积极分子多一些：

既然滥杀无辜平民该谴责，那以色列闯进人家世代居住的家园，强占人家的土地，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或是驱逐出境，或是关进gaza，甚至在贝鲁特把基督教长枪党人放进巴勒斯坦难民营，搞出了震惊全世界的大屠杀，完全把当年希特勒对付他们的那一手施加在比他们更弱的回回身上，那又算什么事阿？

难道这不是恐怖活动？它和P L O干的烂事的唯一区别，便是那是以国家实力作后盾，有计划，有步骤地全力推行的，因而也就更具规模，更有效率，更令无辜民众毫无反抗余地。借用盛雪女士的话来说，那便是“国家恐怖主义”。

纳粹和国际共运都是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发明人。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是外向的，屠杀的是异族，而后者是内向的，专门屠杀自家同胞。以色列干的烂事，无非是重复纳粹当年那套罢了。深受其害的受害人居然重复当年迫害者的旧伎，和中共的受害人搞毛共那套一样，特别让人怒气填胸。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恐怖活动首先是以色列以国家机器的实力大规模搞起来的，P L O搞的恐怖活动无非是它引出来的回应。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光谴责后者的恐怖活动，方便地忘记前者的大罪，不说是实行双重标准，起码也是崇拜实力的势利。

由此看来，恐怖活动还是要加以区分。本拉登那类丧心病狂，毫无道理烂炸外国城市，滥杀无辜平民，以此实行声东击西、推翻本国政权的莫名其妙的烂“战略”当然应该谴责。但P L O干的恐怖活动和那种烂事有本质不同，应该说是出于自卫性质——你不打进人家的家园去，还会有那些事么？这大概是每个尊重事实的人都应该同意的吧？

这当然不是说P L O就有权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学著去滥杀人家的平民，相反，这种烂事同样应该谴责。只是世界在谴责被逼铤而走险的弱者的时候，恐怕还得深自反省，想想自己是如何以势利、冷漠、姑息逼良为寇的。如果当初阿以战争中，联合国不光是通过空洞决议谴责以色列侵略，要求撤军，而是迅速由强国派出维和部队，以实力威慑以色列撤军，则后来中东也不会成为无休无止的动乱之源。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亲切教导我们：“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套用这句话，似乎可以说全世界恐怖活动的昌行是对西方大国自私自利、对第三世界人民死活漠不关心的一种惩罚。起码，它的出现反应了强国政治家们处理世界事务的方式出了

严重问题。

正视这些问题，找出病根来加以彻底根治，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的反恐措施。不去闭门思过，却像白痴小布同志那样，将自己打扮为“正义复仇天使”，幻想用强力压服反抗，就只会为恐怖事业火上加油。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走向儒家的三个犹太人

LS

西方雅典/罗马政制是‘人神之分’背景下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的组织方式。其中对神(居于奥林匹斯山上宙斯诸神)的崇拜和祭祀,是古希腊人城邦生活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即起源于每4年一次的对宙斯的祭典上所举行的体育竞赛。征服地中海的罗马人吸收了希腊人的诸神及其文化,其中受良好教育的贵族政治家对希腊哲学更为青睐,而受教育低的下层大众对外来的宗教仪式却越来越感兴趣。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在罗马广泛传播并被立为国教。

基督教源于中东犹太人信仰的犹太教,对上帝的信仰维持着犹太人作为一个族群的存在。犹太人在亡国后流亡巴比伦,后获准重返耶路撒冷,严守律法的犹太正教乃最终成型。在罗马征服耶路撒冷后的两千多年,犹太人辗转世界各地,均修习犹太经文立其信仰,保其宗族。

能够‘走出洞穴’的人是柏拉图心目中的哲人,是所谓的“受过教育的人”。在接受犹太正统教育的犹太人中出现数位哲人,以其深邃之思想,突破犹太传统,叛教出门,他们是斯宾诺莎、马克思和施特劳斯。从整体上来看,他们的共同点是走出犹太,走向儒家。

犹太教的核心是对主/上帝的信仰和上帝对犹太人的眷顾和应许,这极其类似殷商人的政治宗教观念,在商人心目中,帝/天是具有最高意义的至上神,诗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帝立子生商’,因而‘我生不有命在天’(纣王语)。及周克商,周人对‘天’的观念转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到孔子时,则明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而在荀子眼里,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种对天的认识,我称之为‘天之有文’。

因此,对犹太教的颠覆核心就是对犹太上帝/主的观念的否定,而这一步,是由斯宾诺莎完成。斯宾诺莎1632年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从西班牙逃往荷兰的犹太家庭。他的父母亲是生活颇为宽裕的商人,斯宾诺莎也因此得以进入当地的犹太神学校,学习希伯来文、犹太法典以及中世纪的犹太哲学等。在接触笛卡尔等人的著作后,渐渐脱离所谓正统的学说范围,并最终在24岁时被逐出了犹太教会堂。而斯宾诺莎改变了犹太上帝的观念,在他看来,“上帝并不是站在自然秩序以外作为第一推动者的形而上学或准科学的假设,上帝就是自然秩序。”他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神学意义上的神,即具有人格、意志、干预人间祸福的超自然的神的存在,认为作为万物本原的神就是自然,而自然本身也具有作为万物本原的神性。斯宾诺莎的上帝观念深刻影响了爱因斯坦,他把斯宾诺莎的“对神的理智的爱”,即求得对自然界和谐的理解,奉为自己生活的最高目标,此正孟子所谓‘尽心知性知天’也。古圣先贤,越过上下千年,东西万里,而如合符节。斯宾诺莎不一定知道儒家‘天’的观念,然而,哲人的心是相通的。黑格尔就曾

经明确地提出，要研究哲学，就必须首先作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正儒家所谓‘宪章文武’者也。遥想斯宾诺莎，其以一人之力而追三代之英，叛犹太千年之教，立西学不世之言，其人其学，可钦可敬。

对主/上帝观念的突破也必然带来对人的认识的改变，从神的仆人而成长为自由的人，斯宾诺莎即认为，一个人只要受制于外在的影响，他就是处于奴役状态。斯宾诺莎之后两百年，马克思的资本剥削奴役雇佣劳动者的思想，于此发端。而人类的历史也被解释为争取自由解放的历史，从奴隶雇工到自由人。这是马克思对于西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然而对于东方，他却提出亚细亚的特殊性，并认为中国是没有如希腊罗马的个人奴隶制。事实也确实如此，儒家的观念是不可能容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生杀予夺的希腊罗马个人奴隶制，‘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所谓‘人命关天’，岂能草菅人命？这正是儒家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之下，乃地也，我将其称为传统中国的‘地之有文’，华夏文明因之传承五千年而不绝。在社会组织及政治经济制度上，儒家对于大规模土地兼并的抵制，对传统的‘耕者有其田’的执着，也与批判雇佣制的马克思相去不远，隐隐有暗合之意。

儒家是天地人文的学说。人之有文，也就是对于人之异于禽兽的执着是儒家信念的标志，表现为‘孝’的观念，孝是德之本，也是儒家‘下学上达’之始。先秦之继承殷商政治宗教观念的墨家以‘兼爱’反对儒家，孟子称其为‘二本’。对此的解释，我以为，从犹太教走出来的另一哲人施特劳斯给出了一个清晰的分析，他在对旧约创世纪的阐释中认为，人对事物认识的依据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某种哲学宇宙论，也即施氏所说的自然。在这里，我们似乎又可以看到斯宾诺莎的存在，事实上，施特劳斯最早的篇章即是对斯宾诺莎的解读，这事实上已经成了从犹太教中走出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曾评价斯宾诺莎的上帝观念，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这里也可以用来说明施氏的自然观，和儒家的生生不息、活泼灵动的易理中所显现的自然还是有很大区别。也许施氏一生徘徊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与此有莫大干系。

施特劳斯在与弟子读圣贤书时，曾言由于语言的缘故，不能研习他人之经典，是为一憾。而施特劳斯以其独树一帜的政治哲学之研究，涉及西学各个方面，令西方学人颇为困惑，不解何为其政治哲学，其实中国人对之是心有戚戚，因为儒学就是如此。施氏其学致力古代经典，注重人文教育，心系政治法律，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

孟子尝言，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走出犹太/宗教的哲人如果弃绝杨朱式的个人自由主义，其归宿就必然是儒家。西学由于文明的变迁，其断续之处较为明显，而儒学，由于华夏文明的绵延不绝，从原始图腾崇拜/巫术、天/帝/神信仰/祭司到天/理，脉络清晰可辨(缺点是使很多人混一不清)。从整体上看，走出犹太教的此三位大哲，斯宾诺莎近于先秦之儒学，施特劳斯近于两汉之经学，而马克思则近于宋之理学。

想孔子当年，研习三代之经典，感‘郁郁乎之文’弃商而从周，而斯文以是传。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其言至矣。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知识分子还是知识贩子？

bystander

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向来都令人担忧，两千年来他们不断受到脊梁骨质疏松症、膝关节软化症、人格分裂症、自卑、自大、自恋情结等顽疾煎熬，至今能够挺胸抬头做人的还不多见。相对而言，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应该比较好一点，不过近年亦开始出现每况愈下的迹象。

文化史学家雅可比（Russell Jacoby）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一书中指出，激情的六十年代过去之后，知识分子对社会改革的热情瞬即冷却下来，与群众的关系亦变得愈来愈疏离。走在大街上率领群众争取公平公义的独立知识分子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藏身于象牙塔内从事纯粹学术研究的专业知识分子。

时至今日，来自学术界而又真正关心社会、仗义敢言的知识分子已经所余无几。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要算是不久前与世长辞的文学理论家扎伊尔德（Edward Said）。本身是美籍巴勒斯坦人的扎伊尔德，穷尽半生努力为巴人争取独立和合理的权益，本着的就是一份反对强权、坚持社会公义的信念。

一九九三年扎伊尔德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说时，就谈到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担当的角色。他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肩负启蒙的使命，为促进人类的知识和自由作出贡献；知识分子的个人理想必须与整体社会利益一致，在面对不公正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站到人民一边去挑战不合理的制度。

芝加哥大学高级讲师暨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在二零零一年出版的著作《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Public Intellectuals - A Study of Decline”）中，从市场供求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与雅可比和扎伊尔德截然不同的观点。波斯纳认为值得关注的问题不是有使命感的公共知识分子愈来愈少，而是滥竽充数的“次货”在市场泛滥，由此而产生令人忧虑的“劣质化”现象。

波斯纳指出，随着大学学科分工愈来愈精细，必然出现大批精而不博、对本科知识以外涉猎不广的专家学者。碍于识见所限，这些学者本来就不适宜对自己专业以外的社会议题公开发表言论。可是，在传播媒体大量涌现，对来自学术界的评论需求甚殷的情况下，学者都争相替报章杂志上撰稿，接受传媒访问，又或者亮相屏幕，希望藉以提升个人知名度。

由于市场对舆论没有严格的质量控制机制，所以很容易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波斯纳认为，如果不去认真批判这种现象，学术界最终将会失去公众的信任。因此，他严厉谴责那些喜欢权充专家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指他们为争取曝光率，经常就有争议性的议题在传媒上大放厥辞，以偏激出格、哗众取宠的言论妄图蒙混过关，混淆视

听，误导公众。

在厚达四百多页的著作中，波斯纳除了分析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的原因外，对不少声名显赫的学者亦作出了尖刻的批评。可惜的是，他的论点始终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笔者认为，在社会愈来愈趋向“低智化”，大众社会意识普遍低落的困境下，要建立一个知识分子与普罗大众共同参与、批判互动的“公共领域”，困难程度可谓不言而喻。

今天社会上一切以市场价值为主导，有理想和抱负的知识分子都只得无奈地面对现实，否则最终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意兴阑珊的有识之士不是被公营机构吸纳为技术官僚，就是被私营企业、投资基金或政党组织罗致为旗下的智囊。当社会运动和改革的土壤日渐枯竭，公民社会上的反对力量奄奄一息之际，知识分子如何能够准确估量形势、重新定位，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信仰，是道德之本

湘君

信 仰是道德之本，没有信仰的道德，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理由其实很简单。举个例子，不应撒谎，大概是每个社会都有的一条道德规范。如果这条规范只是空泛的道德，那么当一个人从撒谎中得到现实的好处，而且也知道他的谎言不会被别人识破时，他就不会去遵循这条规范，因为违背这条规范对他没有任何坏处。但如果道德背后有信仰支撑着，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事实上，许多人撒谎或者作了别的缺德事后，虽然除了自己，没有其他人知道，可还是会觉得良心不安，这良心，就与信仰挂上钩了。空泛的道德，让人面对别人，面对社会，而良心却属于自己，属于神灵。俗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这良心过不去的，正是这神明，也是自己，这个，就与信仰有关了。

信仰，不一定是宗教的，也会有世俗的，比如我们曾经有过的共产主义信仰，就属于一种世俗的信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信仰也曾经宏大而坚贞。然而，世俗的信仰有其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当信仰的目标过于遥远时，便不能吸引人，我想不会有多少人会对几千年以后才能实现的某种社会制度有兴趣；但如果信仰的目标太近，又容易幻灭，比如在中国已经建成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秉持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现实信仰，因为目的是要建立某种现实中的社会制度，最后的幻灭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信仰一旦破灭，由此信仰支持的一套道德规范也就随之土崩瓦解。

宗教，一定是信仰，宗教的信仰，却能够持久，由此支持的一套道德规范，也不那么容易瓦解。这里，以基督教为例。

基督教信仰能够在这个世界长盛不衰，除了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上的发达而导致的文化上的强悍以外，也有基督教本身的原因。首先，当代基督教教义适合当代社会，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地方很少。其次，当代基督教是一种人性的宗教，这种人性，既表现在不要求禁欲，虽然也提倡奉献，但却是比较人道的奉献等等，更表现在其教义基础，是出于人性自私的本能，那就是个人的得救，基督教的一切观念都是以个人得救为基础的，其着眼点在个人。

过去我们有过一种所谓的共产主义道德，这样的道德，毋宁说是一种伪道德，因为它提倡的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从根本上是违背人的本性，没有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做到。而基督教的道德则可以概括为：客观为别人，主观为自己（好象很多年以前国内有个关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也提过同样的口号），在利己的动机下，表现出一种看似无私的行为。当人们行事的时候，面对的不只是社会，更要面对自己与神明，从而使人的道德达到较高的水准，也使得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得以

维系。当然，基督教还使具有真正信仰的人解决其人生的终极问题，这个很玄妙，也与道德无关，就不多说了。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缺乏的也许并不是道德，而是信仰，或者也可以说缺乏的是有信仰支持的道德。在坑蒙拐骗的背后，普遍缺乏良知与良心，整个社会都急需建立新的信仰。湘君个人认为，当代基督教信仰或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能有人说我们可以恢复我们自己的传统美德，可是传统已经过于古老，缺乏对现代社会的吸引力，而且若缺乏信仰的支持，恢复道德传统也不是件容易事。再者基督教的道德与中国的传统道德并不矛盾，许多的观念都是想通的，两者可以并行不悖。

因此，湘君很赞赏远志明和其他基督教传道人在中国所做的工作，在目前的中国，拯救世道人心也许比单纯的政治改革更为重要。

二00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鲁迅如何误人子弟？

云儿

曾经看到这样一道给中学生读的趣味逻辑题目。

甲：长寿的人都有良好的饮食习惯。

乙用归谬法来反驳甲：瞎说！莫非早死的人都没有良好的饮食习惯？我就看见有个饮食习惯极好的人被车撞死了！

请问乙犯了什么逻辑错误？

答案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乙错误地运用了归谬法——“长寿的人都有良好的饮食习惯”并不蕴含“早死的人都没有良好的饮食习惯”。它的逆否命题其实应当是“饮食习惯差的人都不长寿”。在逻辑上，这样的命题其实是完全可以质疑和推翻的。比方说，只要乙能够找出一个“饮食习惯差的人也能长寿”的例子来，就算反驳了甲的命题。然而乙不懂得正确的逻辑，他的反驳在逻辑上就完全不能成立，即使他举出一万个“饮食习惯好然而却早死”的例子，也不能撼动甲命题分毫。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甲：空气是人得以生存的基础。在没有空气的真空条件下，人不能存活。

乙反驳甲：从古到今有，许多人死了，我想这总会是不错的。我竟没想到他们的死，乃因为处在真空条件下。莫非你检查过他们死时的所在，怎么就断定那都是真空条件？

这一段，稍有点逻辑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乙先生是在强词夺理，因为他所反驳的话，并不能从甲先生的话里面逻辑地推出来。有些肤浅的人，也许会以为，乙的话里面加了个“许多”作定语，于是就可以合符逻辑了。甲不是说了“在没有空气的真空条件下，人就不能存活”吗？乙先生把甲的话转述成，“许多先前的人死亡，乃因为处于真空”，不是丝毫不违背逻辑吗？——这位先生显然不明白，即使乙的话里面加上了定语“许多”，而非指“全部”，它还是不能合符逻辑地从甲的话里面推出来。事实上，即使以前从没发生过有人死于真空的事件，甲的话依然是可以成立的。

这些逻辑错误是如此明显，如果哪个学生写的议论文，完全建立在这样的逻辑错误之上，我不会让他及格。

如果我告诉你，号称是中国“最深刻”的思想家的代表作，长期被共产党选入中学课本供学子们摹仿学习的议论文典范，也是这种路数，你相信吗？

我不敢相信。只可惜，事实就是如此——鲁迅的议论文代表作《文学与出汗》，盘踞了大陆中学语文课本几达四十年，就是这么一篇逻辑不通而强词夺理的文字。

根据《鲁迅全集》介绍，《文学和出汗》乃是反驳梁实秋的，针对的是他的《文学

批评辩》中这么一段话：

“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

这段的中心意思是说，经得起时代和地域检验的作品，须以普遍人性为基础。它的一个推论就是，长久广泛流传的伟大作品，都描写了普遍人性。它的逆否命题则是，不描写普遍人性的作品，不会长久流传。如果你能找出一个不写普遍人性而长久流传的文学作品，就算彻底反驳了梁实秋的命题。

象前面两个例子一样，梁实秋的这段话，无论如何都不蕴含着“作品失传都是因为描写永久人性”或者“许多作品消灭都是因为描写永久人性”的意思。饮食习惯好的人，可能因为车祸而早死；有足够空气可呼吸的地方，人还可以因为各种疾病而死亡；即使大家都描写普遍人性，还会是有许多作品会因为文学性太差、故事不能吸引人以及战祸天灾等原因而失传。这些跟梁实秋的话没有丝毫矛盾。就算你举出一万个写了普遍人性而失传的作品例子，也不能撼动梁实秋命题分毫。

而且，象梁实秋所谈的那种普遍命题，并不一定要建立在对失传作品的观察上。提出这样的命题，其实不必去看那些没有流传下来的作品都写了些什么。一个人，如果发现他所观察到的那部分长久流传的伟大作品，都描写了普遍人性，就可以提出梁的命题。这在方法论上是完全合法的。自然，这样的命题并不必然正确，它可以被证伪，而且有多种证伪的办法。最有力的反驳之一，便是如前面所言，找出一个不写普遍人性而长久流传的文学作品来。这也不需要去观察已经消失的作品，只须检查一下流传下来的作品是怎样的，即可判明。

除此之外，这个命题也可以从分析上加以批评，比如它所基于的概念是否明确，命题本身有没有意义，等等，完全不必借助于前面例子中那种荒谬逻辑。

鲁迅先生如何反驳梁实秋？很好笑，正是“莫非早死的人都没有良好的饮食习惯”、“许多人死乃因为真空”的荒谬推理。鲁迅先生反问：莫非不流传的作品是因为不写永久人性？更好笑的是他还更进一步要求去检查那些没有流传下来的作品，反问，梁教授如何看得见它们？

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位“最深刻思想家”的深刻逻辑：

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上面第一段里的两句话，头一句离梁实秋的意思的还比较接近，第二句就已经变味。梁实秋不过是引莎士比亚戏剧等作品为例，说明长久流传的作品都描写了普遍人

性。鲁迅却仿佛前面例子中的乙先生，以为这就意味着“其余人的作品都没有描写持久人性”。梁实秋的话到了他笔下，摇身一变就被引申成了，只有“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于是乎，到了下一段，这位号称“最伟大”“最深刻”的“思想家”，就陷入了逻辑谬误里，变成了一团浆糊，开始跟“早死者没有良好饮食习惯”以及“许多人死乃因为真空”缠斗起来。可怜这位深刻思想家，逻辑上都找不着北了，自己造了个风车在那里斗，跟梁实秋命题早已没有半点干系，却自以为得计，说起“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既已消失作品”之类的刻薄俏皮话来。岂不知，既已消灭的作品写了些什么，有没有写永久人性，并不妨害梁实秋命题之成立与否。在明眼人看来，鲁迅写得越刻薄，他露怯也就露得越大。

象这样的文字，如果不看鲁迅论敌的原文，你很可能会认为鲁迅的议论文很深刻，很有力度。这在一个用国家权力逼迫学生读鲁迅作品的环境中，是很容易树立其鲁迅的高大形象的。只不过，把这样逻辑不通的东西当成议论文典范，逼迫中学生学习模仿，实在是误人子弟不浅。

我认识一些大陆语文教学界的人士，早就对这一点深痛恶绝，一直大力呼吁将这篇鲁迅文章撤出中学语文课本。据我所知，几经艰难曲折之后，今年即将启用的新版语文课本，终于把这种文章撤了下来，可惜这已经是在此文误人子弟近四十年后了。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远华案黑幕导读

盛雪

导读假如赖昌星说的是真的
时鉴

不瞒读者诸君说，我刚刚读了这部书稿的前十页，就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所读到的这些话了，这个被中国当局急切要引渡归案的赖昌星，可真敢讲！

难道这么多身份集于他一身不就是天方夜谭？——小学四年级都没念完的福建晋江农民，身家数十亿的远华集团老板，香港永久居民，香港二十世纪杰出青年，福建人大代表，中国国家安全部荣立三等功的处级特工，海峡两岸双面间谍……当然，最后还有北京官方给他的头衔：「中国最大的走私嫌犯」，和他自己拼了命争取的头衔：「加拿大政治难民」。

听听他历数的这些人际交往，究竟有几分可信度呢？

结交的中国党政军警要人不计其数，上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国防部长，下至福建省委书记、公安厅副厅长、厦门海关关长，据其自己统计，有交情的自江泽民、朱熔基、罗干、曾庆红、吴仪等高官以降的秘书就达八十三人，既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的座上宾，又是台湾警备司令陈守山的身旁客，

手眼通天，亲友来北京了？拨一个电话，就能把中共第三代核心的专车开出来让他们兜风过瘾；听说中央有新精神了，打一个招呼，就能让国务院总理的秘书翻箱倒柜找出会议记录，总参二部、三部、总政联络部「三个部长都跟我是好朋友」，

中共政治局委员、邓小平的牌友王汉斌帮他办了中南海的车牌，能进钓鱼台、人民大会堂，这辆车他不在北京时王汉斌坐，他去北京了他坐，王汉斌让司机给他开车，

其他诸如让董文华给罗干递材料，从巩俐的丈夫黄和祥那里进香烟，与澳门赌王何鸿桑合股开赌船，乃至与那些早已众口腾喧的人物的交往，李鹏的父子李小勇啦、笑星姜昆啦、影星业富婆刘晓庆啦……

能相信吗？信口开河，云山雾罩，难道凡是名人，都与赖昌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直接或间接的瓜葛？

信不信，我还是看下去，因为它实在大有可读性了。这毕竟是北京当局最不愿意看到的、千方百计要阻止的事情：赖昌星开了口在境外，通过本书作者，对公众开了口。

北京当局其实不必杞人忧天，担心这个家伙开口。有什么可担心的？让他去侃他的「过五关斩六将」和「走麦城」、官场恶斗真相、军情倾轧秘辛好了，海内海外有谁会傻到这个地步，。真的去相信他大侃特侃的这些「内幕」？还不如去相信好莱坞那些异

相心天开的间谍惊险片呢！他说：江泽民的大秘书贾庭安得知有人举报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便让手下透露给赖昌星，赖便通知李到珠海见面，告诉他「有人要整你」，后来公安部长贾春旺接到一张纸条密报李「在汕头卖官五十万」，李纪周专案组的人也马上密报给了赖，

他说，他为中国国安、军情系统花了一千多万搞情报，每月用自己的钱，给台湾那边十六个地下特工发工资，其中「有个人他父亲是总统府里的」，

他说，他在香港回归前夕，接受中国大陆国安部的任务，派车偷偷将香港入境处的四大箱文件运进大陆，这是国安部「做梦都没有想到能够真地得到」的，

他说，台湾情报官员叶炳南经他牵线来到大陆，国安部人员为了邀功请赏，却违背原来对叶与赖的承诺，将叶抓起来审问，挖出了向台湾密报中共导弹未装弹头的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少将、邵正中中校，处以死刑。——

他说，三十一军副军长的儿子朱牛牛先搞冒牌柯达胶卷厂，后来到澳门豪赌输了几千万，把山东、福建的政府公款拆了东墙补西墙，补不了了就以告状相威胁，勒索赖昌星一亿元，才引发了所谓「达华走私案」，

他说，罗干头天批示海关和中纪委查他，他第二天就知道了，专案班子从哪些部门抽调人员，在北京郊区开一个星期秘密会议如何部署，后来调查受挫又如何改变策略，他都了如指掌，他说，专案组是最腐败的，成员之一、中纪委二室主任李XX到香港去查案，利用职权要「小姐」陪了十几天，「刷卡就刷了四十万港币」，又间接向赖昌星要去五万美金，另一成员、海关总署调查局的张XX去上海「一晚上睡了三个小姐」，海关官员小博则拿了赖昌星三十万，一

他说……

我不用再列举了。随心所欲，天马行空，越侃越离谱跑调，越侃越售儿腔走板！但是读着请着，心里却冒出一个问号：这个朱熔基声称愿以一千六百亿美金外汇储备为后盾，一定要弄回去的走私嫌犯，为什么在命运悬于一线之际，还要花一百来个小时对一个记者说这些大话呢？

我不知道本书作者是如何让赖昌星打开话匣子的，我宁愿相信是如作者所说：「若非为申请难民以保命，他永远不会讲真相」。细读一下，赖昌星对于讲什么、怎么讲，都有精明的算计，看似胸无城府，口无遮拦，其实粗中有细，弦外有音，他的表白虽说漫无边际，其实还是紧扣一根主线的，这就是：否认自己的走私经济犯罪，想方设法地将自己的厄运归于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不，毋宁说是权力拼抢：

在政治局，是朱熔基因手下爱将朱小华被搞得家破人亡而悲愤莫名，便抓住「远华案」想打下贾庆林，向江泽民发难，

在公安部，是部长贾春旺上任后想搞掉前任陶驷驹所信任提拔的副手李纪周，以便换上自己的心腹，苦于无法奏效，就揪住了李纪周与赖昌星的关系作为突破口；

在总参，是副总参谋长、江泽民最信任的熊光楷要整掉不买账的军情部长姬胜德，因为姬坏了江泽民挑战老军头刘华清的大计，才非要把姬与赖拴在一起；

。 ，在中纪委，在海关，在福建……无不有类似的权力争夺？在赖昌星说来，这些

当权者争相将政敌推入「达华走私案」的烂泥潭，为了一推进去就能让他们没顶，就必须把「远华走私案」做成一个罪无可赦的铁案，于是他赖昌星就成了权力斗争的代罪羊、牺牲品。

赖昌星围绕这一总体思路，一方面大谈特谈自己的政治背景、高层的权力斗争，揭发他们大量的腐败犯罪，一方面矢口否认自己走私，为被当局判了死刑的庄如顺、杨前线等人辩、诬，说他们都是「好干部」，统未涉案，外界传言政治局委员贾庆林在福建任职期间与赖昌星有牵扯，贾夫人林幼芳是远华父司挂名董事，拿过赖昌星二一千万，但赖昌星却澄清说绝无此事：「林幼芳不是我X司的董事」，「我跟她三分钱的关系也没有」。

这就是这本书奇特价值的由来！

北京称赖昌星为潜逃至加拿大的走私分子，是经济犯罪，要引渡回国归案，赖口四星则声称北京当局要抓他是绿于政治迫害，无关经济，向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从北京方面说，向加拿大提交各种证据和保证，让加方相信此人是经济犯罪分子，会得到公正审判，是把赖昌星弄回来的唯一办法，而赖昌星留在加拿大的唯一方法，是向加国官方提交各种证词，以证明中共黑幕重重，回国小命难保——就算朱熔基郑重向国际社会承诺不处死他管什么用？他知道的事太多，恨他和怕他的人太多，铁窗、之中弄死个人灭口还不容易？犯人互殴、意外事故…国际社会届时难道还会到中国监狱里去查究个水落石出？

北京官方与赖昌星双方都要向加拿大官方证明自己的说法，如此一角力，我们读者才有了这个一窥黑幕的难得机会：赖昌星在加拿大与本书作者长谈一百小时并允许录音，交给她大量中国当局对在押犯人的审讯记录影印件(都是中国官方为引渡赖昌星而提供给加方的)，以及加拿大官员在北京询问李纪周等服刑要犯的录像，等等。我们才虽不绝后、也算空前地，有了这么丰富、这么完整的第一手材料，去对比验证双方各执一词之后的真相，去推敲判断「远华案」的社会背景和真正起因。

赖昌星对自己的极力洗刷当然是破绽百出，无法令人信服的。他怎么可能洗刷得乾淨！？接受采访一百个小时，他不可能不在牛皮下露出马脚。他砸大钱送大礼，大规模全方位结交高官、秘书，怎么会不要求回报？他给厦门市副市长蓝甫两百万，给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一套别墅、凌士心四〇〇型轿车和虎皮，给李纪周家人好几笔巨款，让贾春旺之子小方来自己赌船赌钱，输了自己给他掏，赢了让他拿走，「三百来万应该有了」……赖昌星再怎么说是规矩生意人，没有进口权不可能走私，但是他与政府公司合作，假手他人走私牟取暴利，蛛丝马迹也是掩盖不了的。

我不敢相信他对自己及这个中国大舞台的记述描绘。

假如赖昌星说的是真的，中国的官场岂不是烂透了，烂穿了，正像红楼梦中柳湘莲所说的：「就是门口一对石头狮子乾淨罢了」？政界、军界、司法界——无处不黑，无人不贪，即或有「两袖清风」，也并非因其「一身正气」，而只因身属「清水衙门」，官场上下不是争权夺利，就是醉生梦死，陷入结构性、制度性、整体性、根本性的腐败，以权揽钱，以钱通权，以权买色，以色换钱，任何一例曝光，在其他国家都足以引发地震，导致内阁换班、总统下台甚至自杀以谢罪天下，而在中国，却从福建到陕西，当事人安之若素，旁观者视若无睹，红道、黄道乃至灰道全搅成一团，比黑道更黑

上百倍千倍！

假如赖昌星说的是真的，岂不是从「太子党」、夫人到七大姑八大姨，乃至秘书、司机，凡跟权力沾边者，天下乌鸦一般黑，「洪洞县中无好人」，无一不暴露出贪婪嘴脸，无一不是中国肌体上的毒瘤？红色贵族肯降尊舒贵跟一个满口方古言、土得掉渣的乡巴佬称兄道弟，不就是因为他有大把大把的美元、港币么，更有甚者，高官们深谋远虑，一边坚守岗位以最后的疯狂捞钱，一边将老婆子女远送海外——公安部副部长的女儿办理投资移民去了美国，总参军事情报部长的老婆孩子都是「美国父民」…：耗子争相离开，不正是船即将沉没的信号？

假如赖昌星说的是真的，中南海对行政体系岂不是丧失了控制力？既然最高层「挂羊头卖狗肉」，下面干嘛不「有奶就是娘」？各单位勾心斗角、邀功争宠，让赖昌星这样的人如鱼得水「四二〇专案组」已经围将上来，中纪委、国安部内部居然还有人随时向他通风报信，

专案组一举一动都在其掌握之中。查一个赖昌星是如此，其它均可类推，当局发出任何号召倡议，颁布任何党纪国法，越堂而皇之，越成为笑柄，只有大开杀戒，才能勉强贯彻政令。当局在「不反腐败失民心，反腐败失官心」的怪圈中无法解脱，基本上丧失了所有维系官员向心力的手段——不让这些官员捞外快，他们干嘛要留在岗位上卖命呢？

假如赖昌星说的是真的，当局连年「反腐败」「搞三讲」之类的准运动，岂不都边际效应递减为零？一阵阵刮风只让那些会看风使舵的官员「好风凭籍力，送我上青云」，更可怕的是否专案造成冤案，反腐败导致腐败：成立「专案组」，搞了一元化领导下的「公检法联合办案」，势必先人为、王认定审杏封象有问题，势必逼供信，捕风捉影，罗织罪名，侵犯人权，草菅人命，所谓「严打」，所谓「从重从快」，只意味着对法治的大破坏，而「专案组」成员自身正义在胸，权力在手，君临一切，有恃无恐，不腐败才怪！

假如赖昌星说的是真的，老百姓岂不是被泯灭了任何希望？舆论被控制得铁桶似的，对远华案的报导须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审稿统一口径，「纪实文学」也只能照官方要求编造，民众既不知道外面讲了些什么，也不知道上面干了些什么。瞒和骗的媒体造就瞒和骗的民众，如果说过去的朝代再腐败也只限于官场，当今腐败已经变成了全民的日常生活方式，渗透到社会每一寸角落。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世道病人膏肓，所有的人都感到了末日将临，才全民一条心，拼了命地预支明天的欢乐——「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这个狡猾的、顽强的、贪婪的赖昌星，假如他所说的是真的，那确实太骇人了，我无论如何不敢相信！

读者敢不敢相信呢？现在就请你自己读一读吧。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家园

武汉蒋品超

一句口號
大過你的歷史
一群鐵鍬
曾挖斷過你今生前世的來去
你滿野魚米的湖圍
在我出世前
已被圍墾成高一塊低一塊的鹽鹼地
紫色的癩頭花
很美
開滿了家園
發散著不結實的馥郁
精壯
在遠古
鄉人
是秋後的癩頭草
在曠野縮捲著脊背
在靜靜的展覽
失水的干枯
富裕
遺忘著水鄉
水鄉的富裕
是祖輩們沿著河道撐船搖櫓
抑制不住的笑音
青石板哦
青石板
那些踏動的殷實腳步
從此

成為無人流傳的掌故
沒有異域
可以代替家園
我的家園
是心靈的異域
在我的心頭
浮著癩頭花的馥郁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曾经的故事

暮雪

曾经的故事在流光中静默，
听风低吟，
演绎岁月的孤寂，
思念执着成恒古的星空，
一幕幕幻化在窗前，
冰封记忆。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流露的真谛

幽灵

流云追逐晚霞
夕阳羞涩彤红
让薄雾流舒幔纱
便有了晨昏的幽寂
从浩瀚的密林深处
传来夜莺的歌声
象天语般朦胧
海涛正构思着潮汐
不就是生命的诗韵
将山峰写来逶迤
当微风告密的时候
那是冰花流露的真谛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夜晚的精灵

克里斯琴

听，那幽婉清扬的歌声
穿过月辉的森林
飘逸在天宇之际
是夜晚的精灵在吟唱
他在吟唱
自由和欢乐
生命与死亡
忧伤和爱
夜晚的精灵在飞翔
穿过森林的河流
穿过山巅和海峡
穿过雪地和坟墓
穿过仰望星空的眼睛
穿过无数的梦乡
飞翔在辰星璀璨
飞翔在夜色黑暗
当第一道晨曦点燃天际
当第一滴露珠升入空中
当一天的你第一次睁开双眼
你可知道
夜晚的精灵
曾静静地
守候在你身旁
将酣睡的你
长久地
凝望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侠女英名万世垂

逸峰

~追悼张纯如女士~

血雨腥风旷古悲，申冤著作岂轻疑。
阐明真相还公道，追究暴行傲顽魑。
秉志纯如司马笔，焚香洁若谷兰芝。
南京屠杀诸天怒，侠女英名万世垂。

2004年11月12日逸庐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剪刀下流淌的诗意 安徒生的剪纸作品

贝苏尼

也许，天才总是要到死后很久才得到承认。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本来是个例外，作为19世纪上半叶丹麦文化艺术“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童话在有生之年就不胫而走，“丑小鸭”、“卖火柴的女孩”、“皇帝的新衣”……不仅是全世界儿童的读物，而且进入各国语言。但是，安徒生的另一种天赋——剪纸——却鲜为人知，即便安学界也认为那不过是他消磨时间的游戏，如果不算怪癖的话。



圖 1: 欧登塞市立博物馆藏

这样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剪剪贴贴和写作旅行一样，是安徒生近乎强迫性的强烈冲动。他随身带着一把剪刀，不管是在哥本哈根、欧登塞、罗马、伦敦，还是巴黎，不管是在家里，作客，还是旅途中，随时用手边的纸张剪起来。报纸、火车票、帐单、广告、邮票、地图……凡是带颜色的纸，不管是单色的还是五彩的，都是他剪贴的材料。他是鞋匠的儿子，当他蜷缩在狭窄的作坊一角，看父亲用笨重的剪刀剪开各种皮革的时候，就形成了对大剪刀的爱好。后来，他剪纸时最让孩子们惊异的是，轻灵精巧的图案怎么会从这样一把笨重的剪刀下流淌出来。随身带着一把大剪刀，多少有些危险。有一次，在他乘马车前往老家欧登塞的路上就不小心坐到剪刀上面，不得不忍着疼清洗、上药和包扎。

其实，像安徒生这样一个充满绮丽幻想的人，不管用笔还是剪刀都能让纸张生动起来。他的剪纸艺术多姿多彩，诗意盎然，充满戏剧性效果，和他的文学作品——童话、小说以及游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安徒生也从剪刀得到很大的乐趣，将神奇的语言艺术视觉化，让诗意想象的灵光在图案、人物和风景中物化。他对深度和对比效果有敏锐的感觉，每一剪刀都是一篇小型童话在时空的不同维度折叠和展开。可惜这样的表现形式太超前，得不到同时代人的欣赏，只有在经历了19世纪末以来艺术中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抽象派、野兽派的洗礼之后，人们才发现了安徒生剪纸的艺术价值。



圖 2: 欧登塞市立博物馆藏

一样从他的鼻孔里流出来。



圖 3: 丹麦皇家图书馆藏

安徒生的剪纸作品现存约1000幅，收藏在丹麦皇家图书馆和欧登塞的安徒生博物馆等地。这些剪纸作品大小不等，有原始风格的人物、精灵鬼怪，也有优雅的舞者、花草树木、宫殿楼阁；有单一场面，也有人物众多的大型作品。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植根于诗人绮丽的想象和童心，也来自那伴随诗人一生的深重忧郁和孤独。剪刀和笔一样，都是他诗性的工具，只要一声令下，欢乐、愤怒、信任、恐惧、仇恨、爱情……都获得了形式和形象。

根据他忠实的小朋友Otto Zinck后来回忆，安徒生在1830年前后为他画了一些素描自画像，一队士兵从嘴里走出来。在另一幅侧面像里则有一些丑陋，离奇的人形，在面部轮廓上跳跃。在安徒生的晚年和晚期作品中可以看到，他怎样发展这种古怪的自画像形式，剪影，人形在鼻子上挂着，在头顶上跳舞，似乎堵住了耳朵和嘴巴，或者像鼻涕

安徒生为孩子剪纸，也呼唤大人的童心。他喜欢先说几句话，调整剪纸的主题或母题和童话的关系，剪着剪着，他停下来，左右端详，改变对称或透视，就像他讲故事和写作时经常修改一样。每一幅剪纸都可以说是一篇小小的童话故事，是童话式幻想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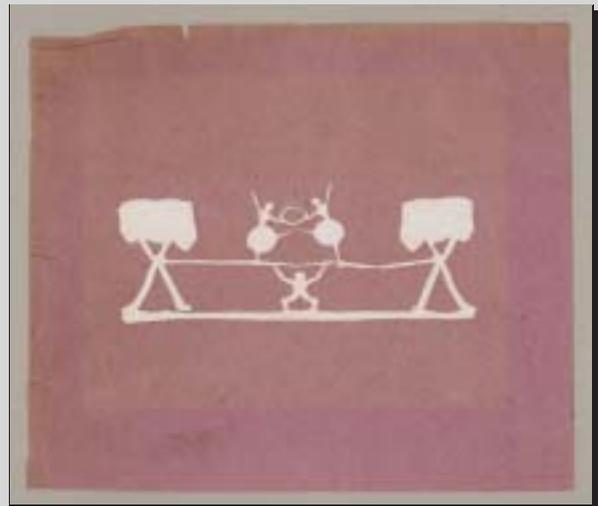


圖 4: 欧登塞市立博物馆藏

当安徒生剪纸的时候也可以说是玩具生产，他制作了许多有趣的人物。例如肚皮上开门的人，既可以用四条胳膊支撑在桌子上，也可以挂在窗户上，如果是铜的，正合适作圣诞树装饰。



圖 6: 欧登塞市立博物馆藏



圖 5: 欧登塞市立博物馆藏

剪纸玩具中还有戏剧场面，有幕布、乐队、后台，当然还有跳舞的人，有童话般的宫殿，尖顶，其中一些有明显的东方风格。当时所谓“汉风”正吹遍欧洲，中国式的建筑、装潢、家具、服饰……风行一时，哥本哈根TIVOLI游乐园的标志就是一座介乎塔和亭子之间的“中国式”建筑，安徒生童话《夜莺》开篇也说，“在中国，皇帝是一个中国人……”，尽管这个故事跟中国一点关系也没有。

丹麦有悠久的剪影传统，照相术发明以前是中等人家制作肖像的最爱。不过，安徒生跟别人不同，他从来不画草图，而是随心所欲地剪，边剪边修改，其结果就是当时非常“另类”，却符合“后现代”趣味的作品。

不过，安徒生也借用剪影手法。例如《树下的舞者》，两个年轻窈窕的女子在狰狞的树冠下翩翩起舞。树冠让人想到邪恶的后母或巫婆，而整个造型又像神秘东方的宫殿或中国的庙宇，内部轮廓则像一艘驶往彼岸的船只，载着两个姑娘，在梦幻中舞蹈着启程。

这些游离于时代主流之外的母题来自童年的记忆。安徒生的父母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他们和非洲内陆或波利尼西亚的不知名艺术家一



圖 7: 欧登塞市立博物馆藏

样熟悉口头文学的传统，有会倾听的耳朵和会看的眼睛。小安徒生缩在制鞋工场的角落里，全神贯注地听祖父母和父母讲故事，不知不觉回到人类辽远的过去，成年后，那神话式的宇宙观就有意无意地通过巫术时代的艺术形式呈现在作品中。



圖 8: 皇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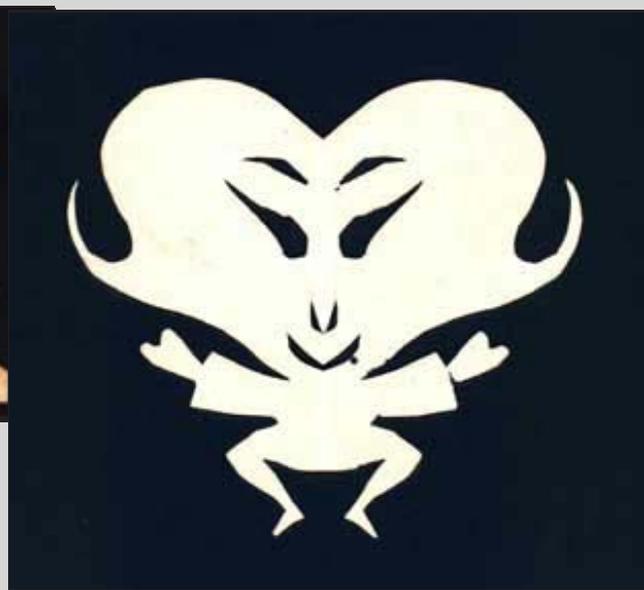


圖 9: 皇家图书馆藏

安徒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运用剪刀来处理不同材料的能力，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心灵深处的迷信。在安徒生的诗作、插图、拼贴，以及剪纸里都可以看到形象美和幽冥世界之间的天然纽带，小精灵、侏儒、巫婆、魔法师、带翅膀的走兽、神秘的飞鸟……一再出现，通过神奇的，超越时代的大自然和神话世界，源源不断地流露出幽默感和对人生的肯定。

走进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那个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世纪，工业化的突飞猛进都变得遥远而陌生。这些或站或坐，悬在空中，跳跃着的童话人物，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不论是写的还是剪的，都穿越时代，微笑着对现代世界发出温和的批评。

【剪纸照片选自丹麦皇家图书馆和欧登塞市立博物馆网页】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圖 10: 丹麦皇家图书馆藏

